HISTORY Stud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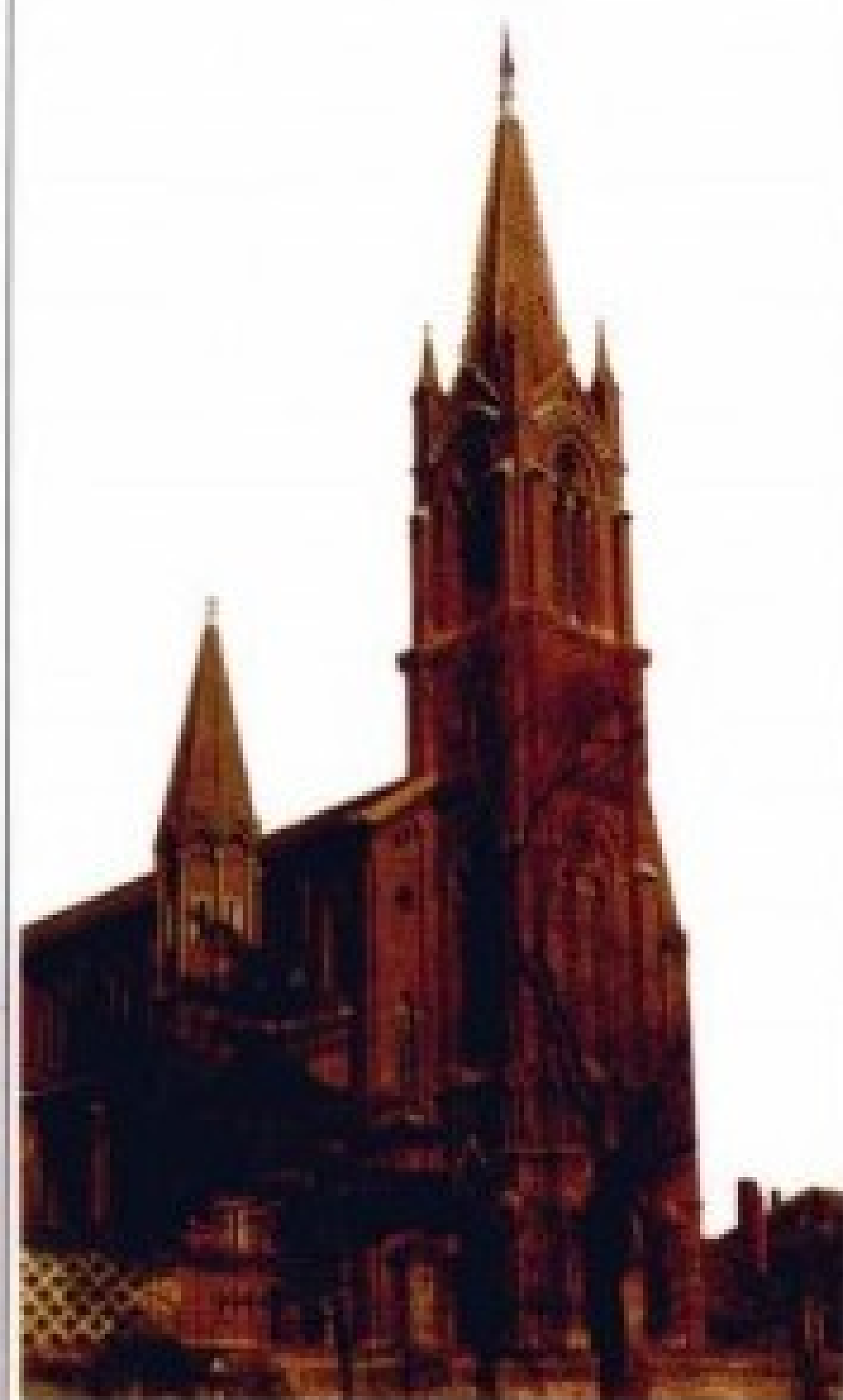
中国读本 

# 晚清史话

夏家餕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史话 / 夏家餕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84-2

Ⅰ. 晚… Ⅱ. 夏… Ⅲ. 中国—近代史—清后期—通俗读物 Ⅳ.K25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23号

**晚清史话**

| | |
|---|---|
| 著　　者 | 夏家餕 |
| 责任编辑 | 凭　林 |
| 版式设计 | 国广设计室 |
| 责任校对 | 徐秀英 |
|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
| 社　　址 |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br>邮编：100866 |
| 网　　址 | www.chirp.com.cn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广内印刷厂 |
| 开　　本 | 640×940　1/16 |
| 字　　数 | 140千字 |
| 印　　张 | 10 |
| 印　　数 | 5000册 |
| 版　　次 | 2009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
| 印　　次 | 200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78-3084-2 / G·1285 |
| 定　　价 | 15.00元 |

#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 目　　录

## 第一章　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



## 第二章　列强宰割下的清朝

# 第一章　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

## 一、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虎门销烟，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资产阶级。狼狈逃回伦敦的大鸦片贩子查顿、颠地和继续待在中国的义律，都极力鼓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也发出战争叫嚣。道光二十年（1840）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了！六月，由义律的堂兄、英国的全权代表懿律率领的四千侵略军，携带了540门大炮，分乘着兵船、轮船、运输船39艘，杀气腾腾地侵入到广州附近的海面，但是，在林则徐率领的广东军民的严密防御和奋勇反击下，侵略者竟一筹莫展。他们在海面东飘西泊，用布、帆兜接雨水，几乎不能救渴，而到小岛汲水，中毒的很多。英军在广东不能得逞，六月底，便大部驶向浙江，7月5日夜，攻陷定海，随即北上，企图威胁清朝朝廷。

朝廷中，以穆彰阿为首的一派人物，始终是反对禁烟的。道光皇帝也并不坚决。早在四月里，当穆彰阿一伙到处传播中伤林则徐的谣言时，道光皇帝就变了态度，说：收缴烟土、烟具，“其弊不可胜言”，宣布此后“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给了坚决禁烟的林则徐等当头一棒。现在，他听说英军北犯，更下令“沿海督抚，遇有洋船投书，即收受驰奏”，“不必遽行开枪开炮”，这就给侵略者的进攻和投降派的投降提供了方便。8月11日，英舰侵入白河口拦江沙外，直隶总督琦善不但不抵抗，反而派军官给侵略者馈送牛、羊，进一步攻击坚持反侵略的林则徐。在侵略者的威胁

和投降派的中伤下，道光皇帝骂林则徐反侵略是“贪功启衅，杀人灭口”、“误国病民”、“糜饷劳师”。10 月 3 日，他下令革了林则徐的职。被命为当钦差大臣的琦善，11 月 29 日，到了广州，当天，就派大鸦片贩子颠地的走狗鲍鹏去叩见义律（此时懿律已因病回国），随即撤裁水师 2/3、遣散壮丁、拆毁防御工事、允许英舰进入内河探测航道。他还想杀掉在林则徐任内抗击侵略有功的将领。

道光二十一年（1841）1 月 7 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口外的沙角、大角炮台，陈连升无援战死；英军进攻虎门，琦善不发援兵，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孤军奋战，全部壮烈牺牲。此时琦善却派鲍鹏到穿鼻洋跟英军讲和。1 月 20 日，居然背着朝廷与英军谈判《穿鼻草约》，英人要求割让香港[①]，琦善赔款六百万元。道光皇帝闻讯，又觉有损天威，于是下令逮捕琦善，派侄儿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又调各省军队去“尽数殄灭”“丑夷”。杨芳是镇压白莲教、天理教起义的大刽子手，但在侵略者的面前却变成了十足的饭桶、酒囊。奕山更每日里花天酒地，还诬蔑百姓都是“汉奸”。被道光皇帝贬为“四品卿衔”的林则徐，无奈于 5 月 3 日离开广州，去浙江军营“协办海防事务”。广东的防务完全瓦解了！

5 月下旬，英军进攻广州城西北的泥城炮台、城东北的四方炮台，总兵长春带头逃遁。26 日，英军炮轰广州城内东南角的贡院，奕山吓得面无人色，连卫兵打喷嚏也以为是炮弹打来，于是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给英军送去银子百万两，第二天又跟侵略者签订了卖国屈辱的《广州和约》。

不战而胜的英军更加不可一世。5 月 29 日，盘踞四方炮台的英军，又到三元里一带抄掠。三元里村北有座北帝庙，庙前有个广

---

① 旧说琦善曾私许割让香港，经史家考证并无其事，乃是英人为 1841 年占领香港所造的伪证。

场，乡民们便齐集广场，推举菜农韦绍光为头领，决定用庙里黑底白边的三星旗当令旗，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当天下午，韦绍光派人联络的各乡代表，又聚会于丘陵起伏的牛栏冈，决议每乡备大旗一面、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还决定在此伏兵，派人前去诱来敌人截杀。

5 月 30 日一大早，几千名手持长矛、大刀和盾牌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渔民等，来到四方炮台下挑战。英国陆军司令卧乌古，吃完早餐，就率领第 26 团、37 团以及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等千余名步、炮官兵杀下山来。乡民们且战且退，与侵略者周旋了两个多小时，将他们诱入了埋伏地。只见三星旗一挥，重重叠叠的丘阜间霎时间便展露出无数面绣有“义兵”二字的大旗。同时，锣声震天，杀声动地，漫山遍野全是手执刀斧、锄矛或鸟枪的乡民。卧乌古忙令发射“火箭”阻击，乡民们仍在潮水般地呼啸前进。

正午的骄阳，曝晒得英军汗流浃背；乡民们的刀光剑影，更使侵略者头晕目眩。卧乌古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中。而下午一点多钟，忽又狂风大作、浓云密布，使他们看不见几尺之外；随后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使他们的弹药全被浇湿，枪炮也打不响了。加之，田埂不是被雨淹没，就是变得泥泞不堪，脚蹬皮鞋的英军，一个个东倒西歪、寸步难行，不少人扑通通摔倒在稻田里。乡民们乘着这天赐的良机，一枪就扎倒了英军第 26 团的压阵者，英军少校毕霞，也被唐夏乡民颜浩长的三叉矛结果了性命。卧乌古于是匆匆领兵回逃，直到下午四点钟，才发现第 37 团第三连失踪。

原来这第三连，在乡民们截杀伊始，便与联队失散。退了不远，后排的一个兵便被乡民用长杆竹扒钩拖出。乡民缴了他的枪，他用刺刀顽抗，乡民们只好将他砍倒在稻田中。37 团有个旗手叫伯克莱的，领了五六个人来救他，也被乡民们杀回。一个乡民拎着缴获的这杆洋枪，迅速转入树丛，点燃自备的火绳，一枪便射中了伯克莱的胳膊；山上乡民们的小炮，也不时击中敌兵。黄昏到来，

饥疲丧胆的敌人，只得列了方阵，钻进树丛瑟索。

第二天天明，团团围住侵略军的乡民更进入林间捕杀。上午十时许，远近103乡的乡民大聚，掀起了捕杀侵略者的第二次高潮。儿童和妇女，也纷纷赶来呐喊助威。义律等侵略军头目，始终躲在四方炮台上，不敢下来援救。

三元里人民的英勇奋战，一共杀死侵略者二百多名，杀伤其数十名，活捉了汉奸十余名。乡民们还缴获洋炮两尊，洋枪、洋刀九百余件。英军中有个叫伯麦的头目，“身体肥健，头大如斗，膂力过人”，也被乡民们斩首，其“黄金宝刺及双响手炮”，当然成了乡民们的战利品。

然而，就在这些侵略者坐而待毙之时，南海县令梁星源、番禺县令张熙宇，还有那个一向畏惧洋人的卖国知府余保纯，却应了义律的请求、奉了奕山的命令，跑来为侵略者求情了。他们软硬兼施，首先吓跑了一些曾经参与斗争的绅士。广大乡民，在他们整日的恫吓、揖劝之下，才“怏怏散去”；残存的敌人，在他们的庇护下才侥幸得以生还。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他们不甘屈服于侵略者的爱国精神，与清朝朝廷的动摇、官吏的怕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二、道光皇帝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

英军撤离广州，奕山于是谎报自己对英军进行了“横杀痛剿”。七月中旬，奕山再报：海风大作，刮翻“夷船”，“夷尸蔽海”。道光皇帝闻报，自称“莫名欣慰”，立即颁发大藏香20炷，叫奕山到庙里去谢菩萨，还批准了奕山奏请提升的几百名官员。而六月里，道光皇帝更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发配伊犁，叫署两江总督裕谦撤兵。

岂知英军撤离广州，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卖国贼琦善私订的《穿鼻草约》传到伦敦，英国内阁还不满意，又派了高级官员璞鼎查来代替义律，叫他用武力进一步扩大侵略。

8月25日，英军攻陷厦门，九月中便进攻定海。定海守将葛云飞深入士卒鼓舞士气，英勇地抗击侵略者。10月1日，英军乘雾袭上晓峰岭，随后攻破竹山门。葛云飞亲手燃炮，并率兵士二百突入敌群，展开了肉搏战。他见一个敌人头目举着绿旗指挥反扑，便挥刀将他砍倒。战刀折了，他抽出腰间的两把佩刀左右劈杀，一口气冲到了竹山门下，向竹山门的守敌发起仰攻。一个敌人居高临下，一刀劈掉了他半边脸，他也毫不退缩。他击杀了这个顽敌，又登上山去追杀其他敌人。他身受40多处创伤，仍奋战不已。直到最后，躲在他背后的敌人，开炮洞穿了他的背、胸，他才两手握刀、直立山崖停止了呼吸！

英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二次攻陷定海之后，10月10日又进攻镇海了。提督余步云不听裕谦指挥，贪生怕死，首先竖起白旗，不许士兵还击，随即又逃之夭夭。裕谦奋战力竭，投水自杀。① 英军侵占了镇海后，随即又攻陷宁波。

镇海之败，责任在余步云身上，道光皇帝却偏听诬言以为裕谦不战，赏了余步云。宁波失陷，道光皇帝不起用良将，却任命自己另一侄儿奕经为扬威将军领兵趋浙。奕经素不谙兵，有个宿迁人叫臧纡青的，建议他采用分兵伏击，并利用乡勇的配合、“人自为战”的办法对付英军，他根本不听，却偏听了一个迂腐士子的主张，用缎子代替铜、铁做炮身，造了八百门缎身大炮。他还叫人把老虎头骨投入海中，妄图以此“激怒龙王”，达到掀翻“夷船”的目的。更可笑的是：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42年1月25日）夜里，他梦见“夷人”“弃陆出海”，便以为吉兆，第二天就

① 有的书说他跳水后被部下救起，但他愤不欲生，到宁波吞金而死。

进驻绍兴，置酒称庆。他去西湖关帝庙求签，见签上有“虎头人”的箴言，乃坚信寅年寅月寅日寅时（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即1842年3月8日寅时）出兵一定大吉大利。道光皇帝闻报，也高兴地给他打气说：“朕引领东南，敬待捷音”。他于是下令：3月8日早晨四五点钟，将士们一律不带火器，只许带片刀、弓箭、长矛，分三路同时攻打宁波、镇海和定海。结果当然是三路俱败。三月中旬，奕经逃回杭州。

对于奕经这样一个败军之将，道光皇帝竟大加安慰说：“断不可因偶然失利，自隳锐气。”在安慰奕经的同时，道光皇帝一方面宣布“兵勇杀一黑、白夷，即正法”，另一方面又派老投降派耆英、伊里布来浙江，对侵略者实行“羁縻”，准备投降。英军岂肯罢休！他们根本就不想停步！在清朝皇帝的“羁縻”政策下，他们很快攻占了慈谿、乍浦，6月16日开始进攻吴淞口了。

吴淞口守将陈化成，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他守备吴淞两年多来，未尝安寝。他指挥将士筑起了东、西两炮台，安置了大炮253尊。他还自备薪水、不设供帐，在“大雪压帐，竟夕失寐”之后，也总在清晨巡视士卒，有时竟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士卒御寒。他的爱国热忱，极大地激励着士兵们的斗志。

6月16日黎明前，英舰齐集吴淞口外，放炮探风。陈化成令将士们静伏待敌。英军以为防御空虚，大胆近岸。这时，亲临西炮台的陈化成一声令下，众炮齐轰，打得他们手足失措、懵头转向。陈化成又亲掬火药填炮，连连轰敌，击伤大、小敌舰三艘，还将另外两艘轰毁。敌人吃了亏，抵死反扑，陈化成于是解下提督印绶，命千总送呈郡官，以示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而后指挥众炮猛发，打得英军只好调头去攻东炮台了。

事前曾劝陈化成“缓师”的两江总督牛鉴，一见初战胜利，便领了徐州兵、江宁兵三千，藤牌兵八百，排列仪仗，自己坐着轿子，从宝山上大摇大摆前来。英军见了，打了几炮，牛鉴竟吓得弃

了轿子、摘了官帽、脱了靴子，混在军中逃窜。牛鉴的窜逃，给吴淞口的防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英军乘着牛鉴溃逃的混乱，很快攻下了东炮台。

陆、海两面腹背受敌的陈化成，腿部中弹受伤，却仍旧从容挥军奋战。战斗一直坚持到中午，敌人蜂拥而来，他的双手早因亲自发炮而震裂出血，右手也因肋下中弹而活动不灵，但崇高的爱国之心激励着他左手执旗督战、放炮，又给侵略军以很大杀伤。最后，他 18 处受伤，前胸中弹、小腹中弹，肠、胃俱出，腹中还有弹片数十，终于喷血而死，但却竟不瞑目！后来有个诗人何仁山，在《草草草堂诗草》中赞扬他道：

> 男儿事驰驱，许国期马革。
> 忠孝矧双存，更足光史册！

陈化成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献身精神，的确永远光照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他的行动，还使当时东南地区的抗英士气为之一振。当英军溯江而上进犯镇江时，海龄率领的满洲八旗兵，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了英军很大的打击，打死英军 185 人，其海军司令也险些被击毙！城破之后，海龄本部无一人投降，全都壮烈牺牲。真是抗英方殷，民意可用。

然而，鸦片战争一开始就动摇不定的道光皇帝，却在投降派臣僚们的包围下，密谕耆英、伊里布和牛鉴等“俯顺夷情，俾兵萌早戢”了！8 月 6 日，英舰侵抵南京下关江面；13 日，英军扬言要攻城。耆英等连夜致书侵略者，表示“一切惟命”，而且派了伊里布的家人张喜去求饶。英军统帅璞鼎查乘势对这帮卖国贼进行了无情的敲诈。

8 月 29 日上午 11 点，耆英、牛鉴爬上了英舰。随后，有病的伊里布也叫人抬了上来。他们可耻地在英国的国旗下，签订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13 款）。条约强

迫中国赔款2 100万元①，割让香港②，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货物的则例须同英方“议定”。道光二十三年（1843）7月22日和10月8日，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在虎门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英虎门续约》，进一步攫取到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乘机大肆侵略中国之端。道光二十四年（1844）7月3日和10月24日，美国和法国于是也强迫清朝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关税自主权，还攫得了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以及军舰游弋中国港口的特权。“天朝”的大门，被彻底地打开了！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破坏，中国开始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的头上，除了原来压着的封建主义大山，又压上了帝国主义这座大山。

## 三、“斩邪留正解民悬”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加粗了对中国的吸血管。输入中国的鸦片、洋布，与年俱增。战后的第三年，英国输入中国的棉布，即达战前的三倍。白银外流，银价更涨。道光三十年（1850）的银价，比道光二十年（1840）又上涨了40%。而清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进一步加重。土地更加集中，吏治

① 其中包括“军费”1 200万元、“烟价补偿”600万元、“商欠”300万元。这些，加上1841年5月通过《广州和约》勒索的“赎城费”600万元，以及在广州、宁波、镇江、扬州、定海、厦门等地公开勒索和抢劫的85万余元，使英国侵略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共掠得了中国2 785万余元的巨款。

② 实际是英军先强行占领，后写入条约。

更加腐败。"文官既爱钱又惜死，武官既惜死又爱钱"，"官以贿得，刑以钱免"。一切官绅，两眼只盯着一个"钱"字。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多达七千万元左右的战费和赔款等，更使清政府进一步勒紧了套在人民脖上的绞索。这一切，都使全国人民越发活不下去。因此，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到道光三十年（1850），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即达百余次之多。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革命时，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便汇成了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

洪秀全，本名仁坤，字火秀，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1814 年 1 月 1 日）诞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洪秀全降生不久，家就迁到官禄㘵村了。七岁开始，洪秀全念了九年私塾。16 岁以后，他一边种地、教书，一边也指望通过科举寻找出路。但一连四次赶考，他都名落孙山。世事的不平、朝廷的腐朽，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终于激起了他的革命之思。他曾病倒 40 多天，据说病梦中见到了"独一真神"的上帝。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着黑龙袍，满口金须飘落到腹上，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①，并赐给他金玺和宝剑。他于是病中高喊"斩妖"，还吟出了"手握乾坤东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诗句。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洪秀全第四次赴广州赶考不中，归途中，他立在船上，看着滚滚的浪花，更抒发了"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的彻底推翻清朝、重整乾坤的壮志。他弃绝了科举，而且根据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中一些教义，结合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


洪秀全塑像

① 为避天帝"耶火（和）华"的名讳，他因此改名为"秀全"。

提出的“均平”、“平等”口号，创立了农民革命的宗教组织——拜上帝会。他的表哥李敬芳、同乡同学冯云山等首先入会。道光二十五年（1845）后，洪秀全又陆续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还制定了《十款天条》，作为会员的守则。而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洪秀全、冯云山更各两次去广西，在贵县赐谷村、桂平紫荆山区发动群众。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时，以紫荆山为中心，东至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汉、僮、瑶、客家等族人民中，许多烧炭工、矿工、农民、挑夫等，都已成了拜上帝会的会员，杨秀清、肖朝贵等还成了独当一面的骨干。

道光三十年（1850）7月，风云聚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远近各地的会员，遵照洪秀全的命令，纷纷赶到桂平县的金田村来“团营”——整编。这时，道光皇帝已经死了将近半年，继位的是他的四儿子奕詝（即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闻讯，于10月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来镇压。11月，林病死于赴任途中；咸丰皇帝又命李星沅当钦差大臣，督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湖北六省清军“会剿”。清军疯狂进攻花洲等地，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则直奔金田，还叫人挑了24担绳索，准备捆绑群众，妄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拜上帝会的成员，打败了清军，并在金田附近的蔡村江木桥设伏，一举歼灭了伊克坦布部，伊克坦布本人也被打下马来杀死。

木桥之战后的第十天，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的38周岁诞辰。拜上帝会团营的群众大集金田，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队称“太平军”。将士们用红布[1]包头、蓄发改服，迅速占领了有战略价值的江口墟，附近的

① 后来将校也有用黄绸包头的。

天地会群众也闻讯前来会合，革命声威大震。3 月，起义军大败广西提督向荣率领的各省清兵，在武宣的东乡共推洪秀全为“天王”。这时，李星沅病死[①]，继任钦差大臣赛尚阿也一筹莫展。9 月 25 日，起义军再败向荣率领的万余清兵，攻克广西重镇永安州（今蒙安县）。在这里，洪秀全颁布了天历、制订了制度，下诏封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东、西、南、北、翼王，基本建成了太平天国这一农民革命政权。次年四月，起义军冒雨突出永安州，并在平冲、旱冲、崩冲伏歼了清朝追兵四五千人，击毙其总兵四员，广州副都统乌兰泰还坠涧摔了个半死。随后，起义军一路披靡，连续北进，攻下全州，湖南的道州（今道县）、江华（今沱江）、永明（今江永）、嘉乐、蓝山、桂阳、郴州（今郴县），围攻长沙不下，转而攻克宁乡、益阳、岳州。只在进攻全州、长沙时，冯云山、肖朝贵负伤逝世，而攻下益阳、岳州后，却得到许多船户的拥护，建立了浩荡的“水营”。起义军进入湖南、围攻长沙，吓坏了咸丰皇帝，他立即将赛尚阿革职，叫徐广缙接钦差大臣印。而阴历年底，起义军拿下武汉三镇时，徐广缙也被“革职拿问”了。咸丰三年（1853）2 月，几十万[②]起义军（连同家属），接踵连樯、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地沿江而下，一路连克九江、安庆、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今当涂）、和州，并于 3 月 19 日攻破南京外城，杀了钦差大臣陆建瀛，第二天即将南京内城也全部占领。3 月 29 日，洪秀全进入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天京为太平天国的首都。

太平天国定都后，钦差大臣向荣、琦善分别在孝陵卫和扬州建立了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此前，咸丰皇帝还谕令全国十省 43 名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大办地主武装，镇压革命。在湖南湘乡居母丧的清朝礼部左侍郎曾国藩，在大办团练中最卖力

---

① 一说自杀。

② 一说 20 万，一说 50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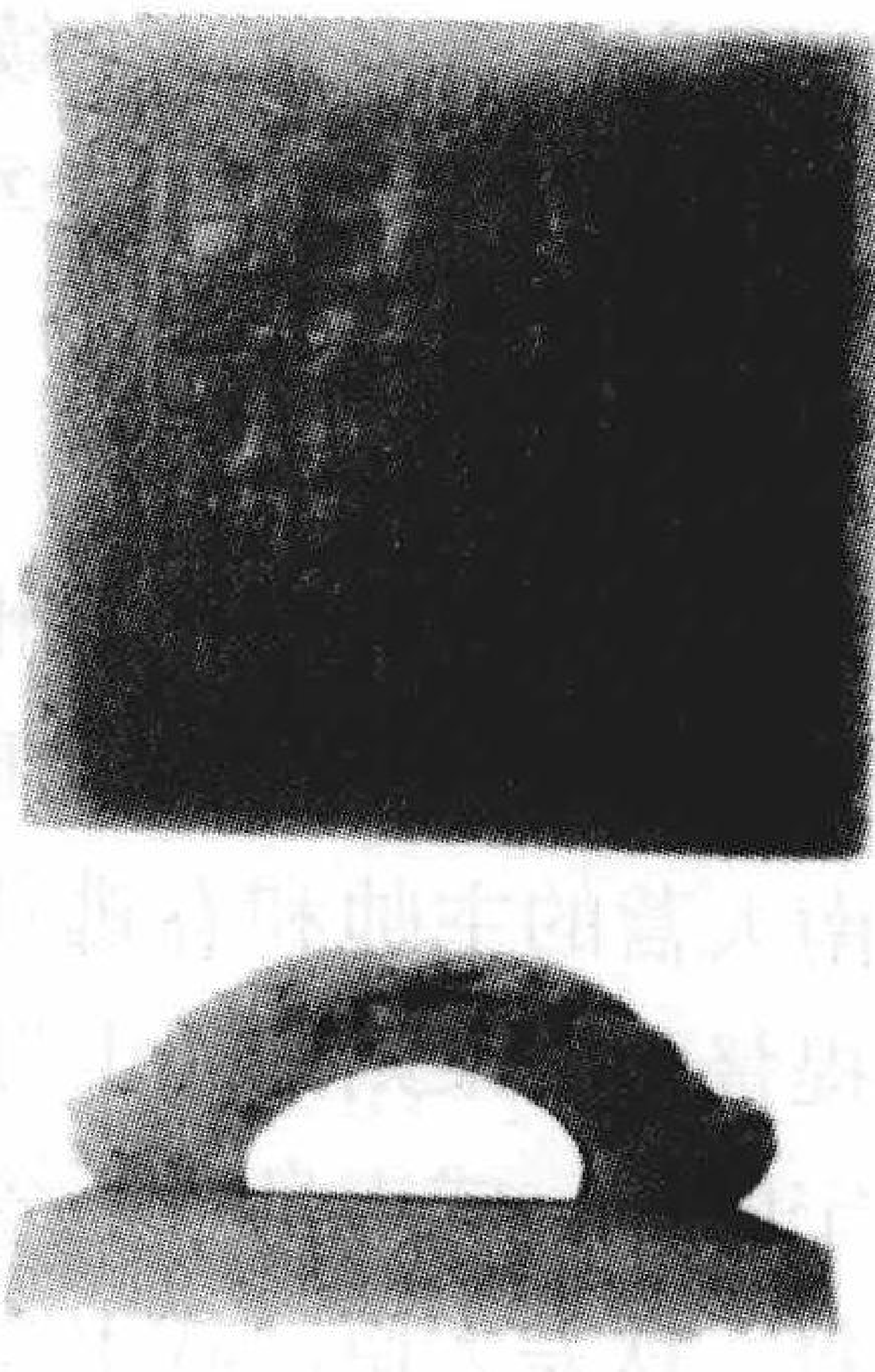
气。这个心黑手狠、外号“曾剃头”的家伙，曾是穆彰阿的门生，又跟大学士中的老顽固倭仁学过程朱理学。他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以罗泽南、彭玉麟等为骨干，以封建宗法关系为纽带，很快就练成了一支由同学、同乡、师生、亲友组成的反动武装，在水、陆两方面与太平军作对。为了彻底推翻清朝同时粉碎敌人的进攻，太平天国定都后不久即派兵进行了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二万多人，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于5月初从扬州出发，很快就攻入安徽、河南、山西，再由山西转到河南而攻入直隶。在临洺关大败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率领的清军后，连破沙河、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到天津附近的杨柳青。北伐军的胜利，把咸丰皇帝吓得要逃往热河，京中官绅逃走的达三万多户。咸丰召开大臣会议时，只见大臣们一个个“涕泪丧胆”，眼眶肿得像樱桃。北伐军长驱北疆，纵横万里，在一无援军、二无粮饷与寒衣的情况下，一直苦斗到咸丰五年（1855）5月才最后失败。

在北伐的同时，洪秀全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军西征。西征军很快拿下安庆、九江、汉口、汉阳。次年初攻打庐州（今合肥）、黄州时，安徽巡抚江忠源、湖广总督莫文镕均因兵败而投水自杀。不久，西征军再次拿下汉口、汉阳、武昌，并攻下岳州、湘潭。5月，大败湘军于靖港，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气得曾国藩投水自杀，被幕客章寿麟救起才没死，后又领了湘军反扑，攻陷湘潭、岳州、武汉，并进攻九江，叫嚣“肃清江面，直捣金陵（南京）”。在这关键时刻（1855年1月），洪秀全、杨秀清派石达开、罗大纲率军西援。石达开等随即在鄱阳湖口将湘军水师分割为二（大船堵在外江，小船隔在内湖），并猛攻江上大船，烧其百余艘，夺得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又气得投水要死。湖口之战后，西征军再次夺回武汉三镇，署按察使多山点炮不燃，慌忙跪拜重点，燃而不响，气得自刎而亡。西征军乘胜南下，直捣曾国藩盘踞的江西。咸丰六年（1856）春，江西13府中的七府一州50余县，全被西征军控制。

躲在南昌的曾国藩，吓得睡则“梦魂屡惊”，起则“寸心欲碎”、“绕屋彷徨”。西征军的胜利，控制了长江中游，拱卫了天京，并为击破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创造了条件。

咸丰六年（1856）6月，石达开、陈玉成等一举击破了江北、江南两大营，扫清了天京外围，向荣逃到丹阳上吊而死。①然而，在这大好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内讧。9月上旬，野心家韦昌辉利用了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袭杀了杨秀清及其家属、部将等二万余人；下旬，石达开的家属也被他杀害。十一月上旬②，洪秀全将韦昌辉斩首，召回石达开“提理政务”，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但又不信任他，且封自己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仁达为福王以相“押制”。天王的疑忌，终使负气的石达开在次年夏天领了大批人马离开天京，走上了分裂主义道路。石达开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长时期地转战后，于同治二年（1863）6月，在四川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被清军围困，上当受骗，部将二千余人被杀，自己也被押往成都凌迟处死。



天王印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曾经哀叹“殊堪忧患”的咸丰皇帝，于是叫喊“次第削平”了。他命钦差大臣德兴阿、和春等重建了江北、江南两大营，又命清军重占了武汉、九江。天京重又处在敌人钳制中，太平军的两个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乃于咸丰八年（1858）9月共破江北大营。10月，湘军主力在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

① 一说病死。

② 一说中旬。

率领下直逼庐州，屯兵西南50里的三河。陈玉成、庐州守将吴如孝、李秀成三军将湘军钳住。11月15日，又将李续宾引入伏击圈，然后乘雾伏击，一举歼敌六千，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等四百多名军官全部丧命，李续宾走投无路，上吊自杀[①]。三河一战，使湘军"元气大伤"、"全军皆寒"。

咸丰九年（1859）6月和9月，陈玉成、李秀成分别被晋封为英王和忠王。次年6月，二人再次合作，以围魏救赵之法，再破江南大营；李率军直捣杭州，清兵往援，李却急挥军返回天京附近，与天京城中的太平军冒雨夹击，大败清军，扫平其营盘三百余座，江南大营的主帅和春逃往常州，吞了鸦片呕血而死，帮办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则溺死于丹阳南门。李秀成乘胜直下苏、常等60余城和宁国府。咸丰皇帝下令将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叫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咸丰十年（1860）9月，太平军又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打得湖北巡抚胡林翼直吐血，曾国藩也"日在惊涛骇浪中"。

咸丰十一年（1861）9月，曾国藩攻陷了安庆，陈玉成退守庐州。次年5月，陈玉成从庐州突围前往寿州，不幸中了反动分子苗沛霖的奸计被俘，6月4日在河南延津不屈而死，年仅26岁。此刻，李秀成则在江浙广大地区与李鸿章率领的淮军[②]和英、法侵略者帮凶军拼搏，并在上海附近打败了英、法、俄侵略军和美国流氓华尔率领的"常胜军"，英国海军司令何伯被打伤、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被打死。不久，李秀成又在青浦之战中俘虏了"常胜军"的副统领法尔思德，在慈谿之战中将华尔打死。宁波方面的太平军，也与英、法陆战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法国舰队司令耿尼受了重伤，随后毙命。同治二年（1863）春，太平军在绍兴也大败"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其统领勒伯勒东和继任统领塔提夫均被打死。次年春，太平军还在金坛重伤了"常胜军"继任头

---

① 一说被太平军阵斩。

② 1861年冬，李在曾国藩保荐下，到淮南开始编练成的地主团练武装，次年2月与湘军一部合并。淮军与侵略军紧密勾结，成为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一个死敌。

目戈登。但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愈来愈紧密勾结，因而，太平军终究未能扭转被动局面。3月，湘军头目左宗棠与“常捷军”攻陷杭州；5月，李鸿章与“常胜军”攻陷常州；而始终围攻天京的曾国藩则更加紧了对天京的围困。李秀成劝洪秀全突围，洪不许。5月，洪秀全病倒；6月3日，洪秀全逝世。6月6日，李秀成等奉洪秀全的长子洪福瑱继位。7月19日，天京陷落，秀成拥福瑱出走，太平军将士英勇巷战。清军放火、屠城，秦淮河中尸首如麻，天京城中大火连天。“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天王被掘坟戮尸。李秀成为福瑱换乘疾走，自己则很快被俘。但被俘后却写下了对敌人抱有幻想的《书供》，给自己光辉的一生留下了一个可耻的污点，8月7日被害，年仅40。刽子手王三清，当夜被村民杀死扔在水中，可见人民对杀害秀成的痛愤。走出南京地区的洪福瑱，10月在江西广昌石城被俘，11月遇害于南昌。至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才算基本告一段落，但其余波却仍在荡漾中。

太平天国革命坚持了14年，震荡了18省，是清朝后期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反封建的纲领。它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田分九等，好丑搭配，无论男女，16岁以上者得一份，16岁以下者得半份）；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坚持互助原则（中央以下设省、郡、县三级守土官，县以下设乡官，以25家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单位，实行圣库制度，保证平均供给）；重视文化教育，提倡男女平等（每25家成立一个“礼拜堂”；婚姻不论财，妇女不缠足，还可当兵、做官、读书科考）。通过这个《制度》，太平天国宣布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这虽反映了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当时实现，但却为灾难深重的人民描绘出了一幅值得憧憬的蓝图，激励出他们踊跃参战、长期斗争的热忱。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动摇了清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标志了农民革命

的新阶段，并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太平天国革命还使满洲贵族到了离开汉族军阀就不能维持其统治的地步。

## 四、汉族军阀的兴起

太平天国革命初起之时，满人大学士文庆，曾经密请咸丰皇帝破除满、汉藩篱，说："要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还有个叫肃顺的满族臣子，也大声疾呼道："满官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这说明：一些"聪明"的满洲贵族，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腐败无能。



曾国藩像

清朝统治的腐朽，首先最明显地表现在八旗兵的腐败上。这种腐败情形，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乾隆用兵金川时即已暴露出来。嘉庆皇帝南巡杭州，连旗兵表演骑射，也居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

鉴于这一切情形，咸丰皇帝只好学着嘉庆皇帝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样子，下令各地的汉族地主官绅大办乡勇团练了。各地的汉族地主，也更加为清朝统治者卖命。

前述那个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平时他领着国潢、国华、国荃、国葆这四个弟弟，在乡里就无恶不作。他们动不动就诬指乡民为会党，送到县里杀掉。有个姓熊的县长也看出太过分，但也不敢违抗他们，只得替他们杀人。过去祭码头用猪，可是，曾家五虎有一次竟杀了16个人来祭！曾国藩这样凶残，表面上却致力于理学，主张"静坐"、"谨言"、"养气"、"保身"，提倡"礼"字，说："自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米盐，无不条而理之。"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考中了举，当了进士，点了翰林，受到穆彰阿的

密保，做了礼部的侍郎。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家中为他的母亲守丧。这时候，朝廷命他办团练，他的好友郭嵩焘和四弟曾国荃，也积极怂恿他出头。他便组织了一帮同乡、师生和亲友，搞起了极其反动的地主私人武装——湘军。他命令部下要"心坚如铁"、"临难不苟"。他说，这是为了改变"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因此，即使得了"残忍严酷之名"，他也"所不敢辞"。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恨得咬牙切齿。在他的《讨"粤匪"檄》中，恶狠狠地骂洪秀全和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说：这连孔子、孟子也"痛哭于九泉"，因此，一切"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他又给部下较之绿营兵为多的粮饷，叫他们更痛快地为清朝卖命。他更把自己的湘军编成营、哨、队，队分劈山炮、抬枪、小枪、刀矛等专业，设置正勇、什长、伙勇诸名目，营以上又设统领等官，编制得非常严密，决心和太平军对抗到底。

咸丰三年（1853）5月，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围攻南昌，曾国藩领了湘军去援救。结果，被打得大败。但誓与太平军对抗到底的他，并不甘心。10月，他又开始造船，到第二年2月，一共造得240只，还装备了辎重炮120门，后编出水兵十个营（每营380多人或500人不等）。这时，他又领着17 000名水、陆兵去攻打岳州，也被西征军击败了。但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湘军刚一成立、尚未与太平军正规部队交手时，即大肆捕杀各地响应太平军的乡民，旬月中，便捕斩了二百余人。在与太平军交手后，则只要抓到起义战士，就统统剜目凌迟，有时还强迫部下生吞人肉。由于他杀人如麻，才得了那个绰号"曾剃头"。8月，曾剃头终于攻陷岳州；10月，又攻陷武汉。靖港、湖口大败之后，曾国藩曾两次投水要死，第二次被捞起，逃到罗泽南营中后还写了遗书，想一死了事。但经罗苦劝，他又更加冥顽地活下来打太平军。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和石达开的负气分裂，使湘军有了反

攻的机会。咸丰六年（1856）底，他的湘军夺回了武汉，随后又进围九江；咸丰八年（1858）5月，他攻陷了九江，又进窥安庆；咸丰十年（1860）5月，和春败死之际，他已比较牢固地控制了天京上游广大地区。他率领的湘军，和不堪一击的旗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8月，朝廷便不得不授予他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职衔；咸丰十年（1860）9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9月，太平军第二次西征之际，他竟分兵三路加紧围攻天京的西大门——安庆，终于1861年9月轰塌安庆城墙，将安庆攻陷了。11月，他于是又被朝廷任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俱听他的节制了。他所领导的许多汉族地主武装头目，也都成了掌握一方军权、政权的要员。

为了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曾国藩不时地牒府县、托朋友、招幕宾（后来，他的幕宾竟多达95人），并极力保荐他们掌管地方军政。官僚兼地主的李鸿章，咸丰三年（1853）在安徽老家办团练，没办成，咸丰八年（1858）跑到江西来投他，他便收为自己的幕僚。咸丰十一年（1861）11月，他更向朝廷保荐李回老家庐州一带去招编队伍建立淮军，随后还拨给他一部分湘军作为骨干加强淮军。同治元年（1862）夏，曾再次保荐他当上了署江苏巡抚，不久又使他得以实授。那个左宗棠，也是被曾国藩培养与扶植起来的汉族地主武装大头目。这个湘阴人，被曾延为幕宾后不久，即被任命帮办军务、招募兵源（号为“楚军”）、领兵打仗。咸丰十年（1860），曾保荐他以四品京堂襄办皖省事务；同治元年（1862），曾又荐举他当上了浙江巡抚；次年5月，左因此更升为闽浙总督。

咸丰皇帝眼见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不大中用，故在大力号召汉族地主兴办团练转危“靖难”之际，诏行“厘金”制度。咸丰三年（1853）先在扬州实行，次年广泛推行。允许各地在加重原有捐税的基础上，加收货物通过税、坐商交易税（税率为“值百抽一”，事实上并不限于此数）。一切清军控制的城乡要口、水陆码头，都设有专抽这种额外捐税的局卡。有个英国人叫呤唎的，曾去

仙女庙（在扬州）贩米。他说，从仙女庙到瓜州，就有20个“厘卡”，所征厘金比法定之额即增加数倍。朝廷就用这些厘金来给汉族地主组成的武装充饷。这样，就使得曾国藩等人，不但有了军权、一部分地主政权，而且有了独立的财权，逐渐如虎添翼、成了后来割据一方的军阀的老祖宗。

汉族地主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朝最高统治者也自然更加扶植和依赖他们。咸丰十一年（1861）8月22日，31岁的咸丰皇帝，咯疾复发、外加暑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一命呜呼，同治皇帝上台，朝廷也没有改变这种政策。在太平天国天京失陷以后，曾国藩更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开了清朝文臣封侯之始。李鸿章也被封为一等肃毅伯。第二年，李鸿章被命为署两江总督，左宗棠也被授以节制赣、粤、闽三省清军的大权。在清朝腐朽贫瘠的土壤上，一批汉族军阀逐渐兴起了。

## 五、“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

### ——咸丰皇帝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正当太平天国与清朝在长江中游和天京外围苦斗之际，英、法两国在俄、美两国的支持下，乘机又一次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从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侵略权益。它们根据《虎门条约》第八款中“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律均沾”的字样，歪曲《黄埔条约》第五十三款、《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中“各口情形不一”、“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原则，从咸丰四年（1854）起，就一直奢求增加通商口岸、在长江任意航行、减免关税、公使驻京等。咸丰六年（1856）3月，英、法与俄国间

所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一结束，它们便进一步寻找借口通过武力达到各自的企图了。

10月8日晨，广州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兵登上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码头的亚罗号船，逮捕了曾在兴宁县上川岛上行劫的豁牙齿匪首李明太等，英国的厦门领事兼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却赶来制止，胡说由中国人苏亚成制造、方亚明买得的亚罗号船是“英国船”、“挂有英国国旗”，中国官兵在中国船上逮捕中国罪犯是侵犯了“英国主权”。英国驻香港总督、首席商务监督、驻华全权公使包令，就派舰队攻打广州，点燃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法国也借口非法窜扰中国内地的神父马赖于2月被广西西林县地方官处死一事，明目张胆地和英国共同行动。



咸丰皇帝像

侵略者的战争和骚扰，使广州人民义愤填膺。咸丰七年（1857）1月，愤怒的人民一把火烧毁了广州城外的英、法、美商行。英、法政府更决定大打出手了。在美、俄两国的积极支持和撺掇下，12月，英、法舰队再次攻临广州城下。

驻在广州城里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对侵略者始终不敢反抗。加之咸丰皇帝又叫他“设法驾驭”、“操纵得宜”和“斩断藤葛”，所以，包令攻打广州那次，他只顾东藏西躲；这次英、法再攻，他又像人民说的那样：“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他的父亲叶志诜，素好占卜之术，叶名琛对此亦迷信不置。他父亲扶乩道：“过十五日即无事”，他也就更不在乎。结果，12月29日，侵略军攻陷广州，广州将军、满员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蒙员柏贵扯了白旗投降；次年1月5日，他终于在左都统衙署的八角亭被搜了出来，2月22日被囚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咸丰八年（1858）4月9

日，这个竟在囚笼中为英国殖民者作画而又自诩为“海上苏武”的昏聩总督就死在那里。

英、法攻占广州后，四国公使联名致书朝廷要求扩大侵略特权。咸丰皇帝命大学士裕诚答复：英、法、美三国之事与两广总督洽谈，俄国有事与黑龙江将军洽商。侵略者未能实现初衷，决定北犯。咸丰皇帝还以为它们是为了伸“冤”乞恩、交城还叶哩！直隶总督谭廷襄，也是个反应迟钝的废物。咸丰八年（1858）4月，英、法舰队闯到大沽口外，他只是幻想谈判退兵；5月，英、法武装进攻的企图已很明显，他的随身布政使钱炘和，竟对大沽守将、提督张殿元说：“你还欲真打仗？不过摆列军器以威吓之耳!”结果，英、法侵略军于5月下旬攻占大沽炮台，随即进犯天津，并于6月强迫清朝签订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迫使清朝谈判代表答应：各国公使驻京；增开牛庄[①]、登州[②]、台南、淡水、潮州[③]、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十处为通商口岸；各国人自由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修改税则，取消常关税，减收内地子口税；赔款等等。各国想捞到的种种特权，都记入这个条约，只候各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了。

《天津条约》是一个比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更不平等的条约，其中，公使驻京、赔款等项，尤其使咸丰皇帝感到有损龙颜。他于是又决定在大沽口秘密备战，以对付外国武装的再次入侵并“聚而歼之”。为此，他下令垫拨银款、购置木桩、添兵调船，派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赶修大沽炮台，严阵以待。但对和平换约，则表示“决不食言”，允许使节从北塘上岸进京，并派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迎接他们，还下令在京城预备下七八十间房间为换约使节下榻。

然而，赴华换约的各国公使，一开始就企图以武力要挟。咸丰

---

① 后改营口。
② 后改烟台。
③ 后改汕头。

九年（1859）6月6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抵达上海，英国海军上将何伯就率舰队欢迎和尾进，并鸣“礼炮”十五响，在中国大摆其殖民主义者的威风。中旬，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等也各率一支舰队同时到达大沽口外，并断然拒绝从北塘上岸进京。25日上午[①]，何伯更下令炸断白河拦河铁链、拔掉河上的铁戗，下午两点半钟又猛轰大沽炮台。僧格林沁只得指挥清军还击，将士们一顿大炮小炮，立时打得英军头舰动弹不得，其余舰只也都搁了浅。何伯连换三艘军舰指挥，还是欲进不能。几小时后，英、法侵略军决定上岸，但刚下小船，就陷进没膝的软泥，成了清军鸟枪抬枪的活靶子。黄昏时，60名侵略军虽然“伏地抢进”到炮台下，却因孤立无援、死伤不已也退回舰上。到26日天明，英舰被清军击沉五艘、俘获二艘，其余六艘也丧失了战斗力。[②] 英军伤亡464人[③]，法军伤亡14人，何伯被打伤了股骨，其副手竟重伤毙命，法军头目也受了伤。在清军英勇反击英、法侵略军时，美国海军头目达底纳高喊着“血比水浓”（意为同种人比异种人亲）的口号乘快船助攻，结果舵手中炮，快船被炸碎。大沽口守军奋战一昼夜，彻底挫败了各国侵略者，伸张了中国人民的正气，也洗刷了清朝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郁愤。有个道光时期的举人叫黄燮清的就写诗说：“四海愤郁二十载，一朝吐气须臾间。”

侵略者亏了血本，当然不肯甘休。咸丰十年（1860）春，英、法组成新的侵华远征军，派出舰只200余艘，英军18 000余名、法军7 000名，由额尔金和葛罗领着，大举进犯中国。而咸丰皇帝却仍陶醉于大沽一役的胜利之中，不仅宣布“《天津条约》各款概作罢论”，而且全然撤了北塘的防，一心期待着侵略者从北塘“进贡”。编修郭嵩焘、御史陈鸿翊苦谏撤防不可，他和僧格林沁都听不进去。7月底，侵略军闯到大沽口外，咸丰皇帝还饬令大沽守军“不可专

---

① 一说24日晚。

② 一说被击沉四艘、打伤八艘。

③ 一说伤亡434人。

意用兵"，"务以抚局为要。"8 月 1 日黄昏，五千侵略军由俄国人引了进占北塘，12 日，从大沽背后攻下新河、军粮城；大沽海面的侵略军也登岸佯退，待清军骑兵追赶已近，"火枪骤发"，齐击清军。大沽守军腹背受敌，咸丰皇帝既不增兵，又给僧格林沁发来硃批"特旨"，叫他"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给他"离营"逃命的许可。2 月 1 日，侵略军猛攻大沽炮台，炸中弹药库。烟火中，守军与侵略军展开了肉搏；敌人攻入炮台后，守军又在房屋附近、草棚之中射击。十点半钟，仅存的一名守军，挺立在同伴的尸首中点燃了最后一炮，也壮烈地牺牲了。大沽失陷后的第三天，侵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到天津。咸丰皇帝不下令组织京、津一带数倍于敌的劲旅反击，却再次派人谈判。俄使伊格那提耶夫催促英、法进犯北京，英、法乃由河西务直犯通州。咸丰皇帝改派怡亲王载垣去通州谈判。昏聩媚外的载垣，竟以拘押英、法谈判代表为阻挡侵略的手段。9 月 21 日，英、法联军进攻驻守通州八里桥的清军，僧格林沁却"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9 月 22 日，曾放虚声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的咸丰皇帝，指令六弟奕䜣处理善后，自己匆匆忙忙率领嫔妃从圆明园逃向热河，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

10 月 6 日，英、法侵略军进攻圆明园。次日，侵略军洗劫圆明园的罪恶活动开始。每个士兵的袋囊里都装有价值几万至百万法郎的奇珍，军官们抢到的还要多得多。法军一个团指挥官抢到的，光珍珠和金刚石就值 80 多万法郎。英国军官赫里斯抢到的东西，找了七个士兵帮忙才运回营房：其中有一座七英尺高的金塔、一个镂金花盆（金镂间有用白珊瑚琢成的文字，盆中是一株高一英尺的金树，树上挂着红玉为核的蓝宝石果）。一批迟到的参谋，拆了一座草房顶，也得了纯金九千镑。坐在本国的英国女王，得了两个大珐琅瓶，她和法皇拿破仑三世还各得了一个金玉制成的朝笏。17 日，联军司令部更下令自由抢劫，金银、珠宝、字画、古玩，一切能运走的统统运走，不能运走的丝绸、珍宝则通通被撕碎、砸碎。

参加了这次抢劫的戈登说："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18日，侵略者更放了火，大火延续了两天两夜，将这座"万园之园"变成了一片废墟。"王朝神籞[1]翼皇州，纵火连霄烛九幽。法物尽随群盗去，仙山真见万灵愁！"光绪年间成了进士的诗人李慈铭，是这样描绘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义愤的。

然而，侵略者还不满足。10月24、25两日，额尔金、葛罗强迫奕䜣分别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文本，并订立了《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不仅使《天津条约》合法化，而且取得了增开天津为商埠、可以拐卖华工出洋当苦力、割让九龙司一部分给英国、允许法国传教士买田造屋，以及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等侵略权益，加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

约后，豫亲王义道奏劾奕䜣卖国，咸丰皇帝竟袒护说："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君臣如此卖国，侵略者岂能不"各取所需"！

## 六、沙俄趁火打劫、坐收渔利

咸丰皇帝告诫群臣时说："俄夷与中国和好多年，自宜先行接晤，待以宾礼。"更是一席糊涂话。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俄国就又开始了攫取我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的活动了。这一年，俄国政府派遣了科学院的院士米登道夫窜入我黑龙江地区"考察"。第二年，俄国政府又向这里派出了以海军少将普提雅廷为头目的"勘察队"。道光二十七年（1847），沙皇更选中了穆拉维约夫来指挥侵略黑龙江地区。这个穆拉维约夫，父亲是沙皇的御前大臣、枢密官。他本人，则毕业于

---

[1] 神籞（yù），即池籞，古代皇帝的禁苑。

士官学校，攻打过土耳其，镇压过波兰人民起义，侵略有功，当上了少将。因此，沙皇便叫他当了东西伯利亚的总督。沙皇对他的赏识提拔，使他更热心于实现历代沙皇攫取黑龙江地区的幻梦，他因而常以哈巴罗夫的继承人自称。

就在穆拉维约夫当了东西伯利亚总督的第二年（1848），他就派出了以阿赫杰为首的"陆上考察队"和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水上侦察队，窜入黑龙江地区绘制军用地图。道光三十年（1850）七八月间，他所派出的又一批侵略者，居然在我黑龙江口附近建立了第一个侵略据点——彼得冬营，并上溯至离奴儿干都司衙门不远的地方活动，还在庙街建立了所谓"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居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扯起了俄国国旗。咸丰元年（1851），侵略者上窜到恒滚河一带，第二年，侵占了库页岛。

咸丰四年（1854）夏，穆拉维约夫乘清朝政府忙于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机，亲自领了70多只船、1 000名哥萨克兵，顺黑龙江而下，6月24日，竟在下游的阔吞屯（马林斯克）筑起了寨堡，派兵驻扎。第二年5月中旬，又出动哥萨克兵3 000、哥萨克"移民"481名和一些特务"考察队"以及商人，在黑龙江下游分驻。咸丰六年（1856）5月，穆拉维约夫又派出第三批武装入侵者1 660人，到黑龙江中游北岸强筑了呼玛哨所、结雅哨所、兴安哨所和松花江哨所①。

咸丰皇帝对于穆拉维约夫的率兵侵占黑龙江是知道的，但他却要求臣子们"待以宾礼"。与此同时，他又不断下令从瑷珲和呼伦贝尔等地抽调驻防兵丁去镇压太平天国。咸丰三年到六年（1853—1856）间，就抽走了七千多人，造成了"各路无防"的局面。吉林将军景淳请求撤回部分军队来防守，奕訢竟答："从来抚谕外邦，唯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更为荒唐的是，咸丰五年（1855），还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私割香港、投

① 它们分别在呼玛河口对岸、海兰泡地方、俄罗斯帕什科夫北面和松花江口对岸。

降之后而又撒谎吹牛的大卖国贼奕山，从伊犁调来当黑龙江将军。

这样，咸丰七年（1857）五六月间，穆拉维约夫又亲率大军进驻海兰泡，悍然宣布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属于俄国。为了轻而易举地把这块中国领土弄到手，沙皇派出的公使普提雅廷，11月赶到香港煽动英、法、美国攻打中国。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普提雅廷积极策划了吓唬清朝的“四国声明”，又唆使英、法北上攻打白河口。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普提雅廷一面怂恿英法赶快向通州进兵，一面又向清朝许愿：只要朝廷同意割让黑龙江北，并允许俄国享有与英法同等的特权，俄国就愿意“调停”，并提供枪械帮助清朝抵御外国和平定内乱。与此同时，他还将清朝授权黑龙江将军处理中俄问题之事报告了俄国。这样，咸丰八年（1858）5月26日，穆拉维约夫就穿了将军服、披了绶带、挂了勋章，带着随从和卫队，跟奕山“谈判”了。奕山以割让领土疏请朝廷，朝廷不许。夜里，穆拉维约夫就下令在江北不断打炮示威，迫使奕山第二天答应了无理要求，第三天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割给俄国，只是江东64屯地区仍归我国，俄国“不得侵犯”；我国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为中俄“共管”，等等。

6月13日，普提雅廷又抢在美、英、法之前五天开始和清政府的代表谈判，最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增开七个通商口岸，陆路通商不限制，俄国在中国驻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边界重勘。

英、法联军，帮助俄国取得了南、北大丰收。不过，奕山的卖国行为，引起了朝野舆论的广泛抨击，咸丰九年（1859）6月，奕䜣还将奕山革职留任，不久，又将他调回北京，自然，他所签订的《瑷珲条约》也就宣告“无效”。然而，一向只要捞到好处便决不撒手的俄国，自然继续在扩大自己的侵略活动。它一面叫穆拉维约夫驻军乌苏里江以东的图勒密地方，溯乌苏里江活动，一面又派外交老练的少将伊格纳切夫为驻华公使进一步利用英法美各国的军事

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准备再次攻打大沽的前夕，穆拉维约夫占领了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拆除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哨所；伊格纳切夫也匆匆赶到上海，勾结美国以“调停人”身份出现。伊格纳切夫煽动英法快快动手，并告诉他们：北塘没有设防。联军进入天津后，他又鼓动进攻通州，并将北京平面图和北塘至北京的路线图给法军司令看。联军打到通州后，伊格纳切夫更将图复制了送给联军司令，并报告他：北京北城防御最薄弱。联军进到安定门后，伊格纳切夫以“调停人”的身份，继续向奕䜣施加压力，奕䜣不敢出面，他更亲当向导。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一签订，这个外交油条便叫清朝“酬谢”他的“斡旋”，并吓唬道：否则，他就叫英法重开战。咸丰皇帝说：“事势至此，不得不委曲将就，免致（俄、英、法）狼狈为奸。”这样，中英、中法签约半个多月，俄国又背着英、法，秘密地强迫清朝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事实上认可了自己一向拒绝的《中俄瑷珲条约》，且将该约规定的乌苏里江以东之共管地也割让给了俄国，还把西边的中国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湖（伊塞克湖）等处指为中俄“界湖”，为俄国进一步掠夺我国西部地区领土找到了根据，此外，俄国还取得了在库伦和喀什噶尔设领事、广泛进行陆路“通商”等特权。

## 七、那拉氏上台和“同治中兴”

咸丰十一年（1861）8月22日黎明时分，咸丰帝在承德死了，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奉遗旨立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改明年为祺祥元年，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载淳的生母、懿贵妃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1]。那拉氏出身门第不高（父亲惠征死时才是安徽道台），咸丰二年

---

① 10月4日又被分别上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

(1852）入宫，这时才27岁，但却颇有点野心，也懂得点权术。她看到儿子年幼，肃顺又专横（反对垂帘听政，在廷纷争时，竟把载淳的尿都吓出来了），于是，便把八大臣之外的恭亲王奕䜣召来承德，密谋除掉肃顺等人，以便垂帘听政。奕䜣9月5日到的承德，11日就赶回了北京，联络京中军政头目，部署行动。10月26日，那拉氏叫肃顺护着咸丰皇帝的灵柩从大道回京，自己则跟载垣、端华等人走小路，于11月1日抢先回到北京。11月2日，那拉氏下令逮捕载垣、端华等人（肃顺刚走到密云，也被逮捕）。11月8日，她又下令将肃顺杀死，叫载垣、端华自尽，其他五人也分别革职和充军。11月11日，在太和殿举行了载淳的登基大典，改“祺祥”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12月2日，那拉氏和钮祜禄氏宣布“垂帘听政”。从此，那拉氏开始把大权抓到自己手里。



慈禧太后像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那拉氏在朝廷依靠奕䜣、桂良、文祥等主张中外合作的满族大员，在地方则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借助洋兵镇压人民起义的汉族军阀，开始建立一些近代军火工业，企图“以夷制夷”、巩固对内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①

---

① 即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也称之为“同光新政”）。同治年间主要以“求强”（建立近代军火工业）为主，光绪年间除继续“求强”外，还“求富”（兴办近代民用工业）。许多史学家认为，它除了首先旨在镇压人民革命之外，也为了对付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的主权。有的史学家又认为这种活动，算不得什么“运动”，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小修补。本书介绍的，偏重于其实质。从实质上看，清朝“运动”的结果，除了镇压人民方面外，在对外的反抗中，一切“洋务”发挥的作用都很有限，而办理洋务的主要代表人物，越办越靠外国，越办越怕外国，越办越对侵略者投降，越办越以自己手头的一点可怜的洋务作为自己聚敛财富、实行割据或维持权势的资本。结果，朝廷不但没有“中兴”，反而越来越加衰微。所谓“求富”，也不过是求的地主买办阶级之富罢了。

"同治中兴"，虽然后来也使中国出现了一些近代民用工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客观上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但从总的方面看，这种活动只不过是在原有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的某些部门，竟逐渐变成了外国的办事机构；许多朝廷官吏和将领，也渐次成为了外国人操纵的傀儡。



恭亲王奕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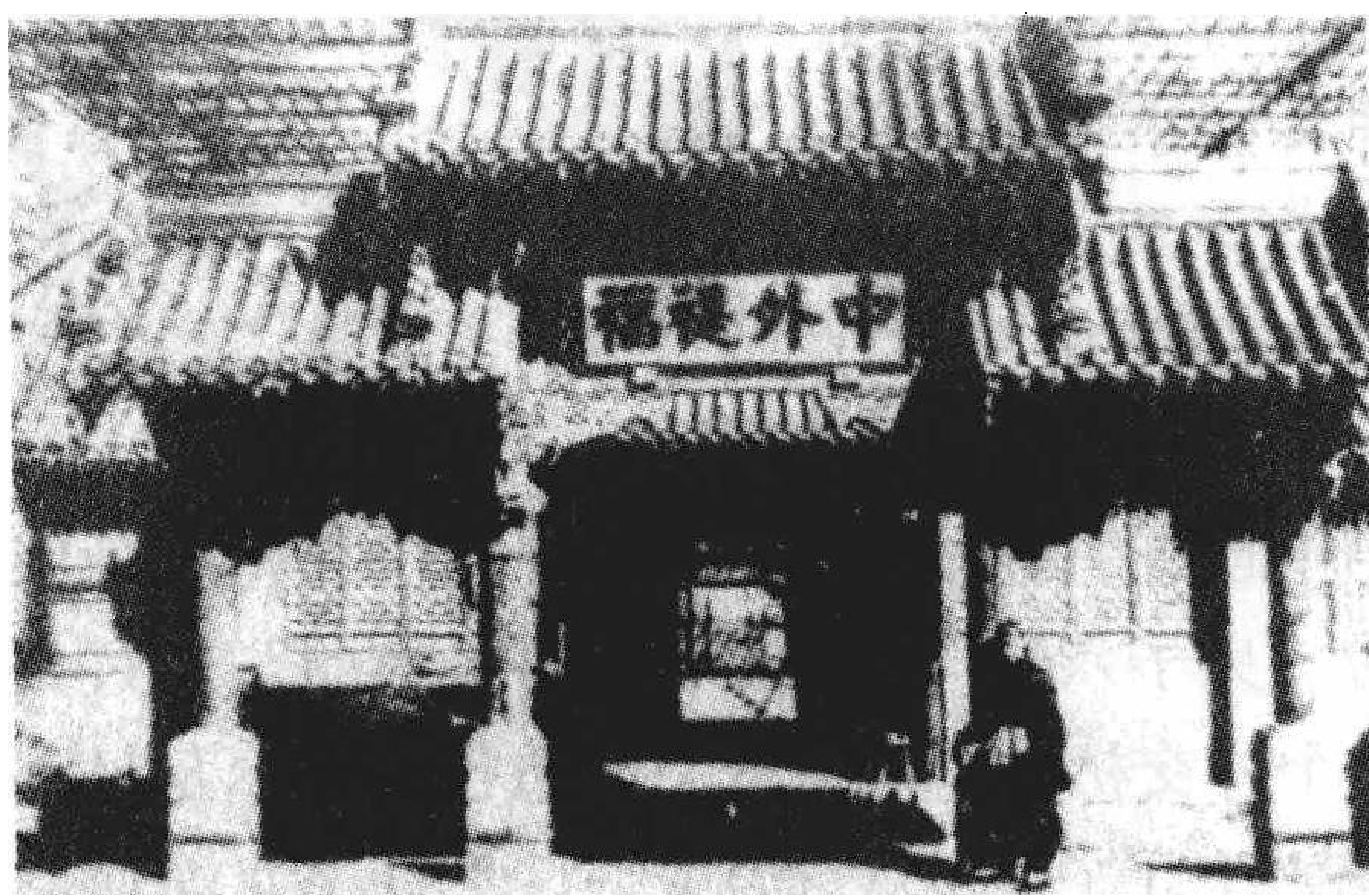
奕䜣因为支持垂帘听政有功，于是以议政王名义掌握军机，兼领咸丰十年(1860)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的卖国活动中，曾博得英、法等国侵略者的好感。在庆祝签约的宴会上，奕䜣被洋人恭上"绝座"，叫王公们跪迎，因此，京城一带曾谣传他将继承咸丰为帝，人民更称他为"鬼子六"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过是个外交机关，可是，这个外交机关竟由这样一个重臣兼理，足见外事部门已在原来的六部之上了。这个"衙门"下设的"北洋通商大臣"② 和"南洋通商大臣"③，则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这又说明：地方的某些机构，实际上也开始成了外国的办事部门。中央和地方的这些大臣、这些"衙门"，不但有权管理通商、遣使、议和、勘界、借外债等事，而且还有权管理海防、学堂、电线、铁路、矿业等事，通通不过是看"夷"人的脸色办事。同治二年(1863)，奕䜣在"总衙"附设"同文馆"，选八旗十三四岁的幼童入学外语，用高薪聘请英人包尔腾任教，培养外交官；同年，汉族军阀李鸿章在上海，次年，两广总督端麟在广州，也分别

① 他行六，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弟。

② 初名"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管牛庄、天津、登州商务。

③ 大臣驻南京，管长江流域和山东以南各海口的通商事务。

开办“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来培养跟洋人对话的翻译。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做监督、美国人丁韪良当总教习，管理大臣只不过是摆摆样子！因此，一些守旧官僚都不愿意参与其事。后来，奕䜣在同文馆中附设“天文算学馆”，大学士倭仁就痛加指斥，奕䜣任命他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他故意在赴任途中，从马上跌下，说是得了“痰厥症”，拒不上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总税务司，首任负责人是英人李泰国。同治七年（1868）2月，清朝派赴欧美的使团，竟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以英国人柏卓安为左协理，以法国人德善为右协理，作为成员的只有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中兴”的同治外交，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比起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的顽固派的禁锢政策，倒也算是有了变化。



总理衙门

顽固派的主要代表是醇亲王奕譞、大学士倭仁和协办大学士李鸿琛。他们的主张集中地表现在同治六年（1867）3月倭仁的一个奏折上，折上讲：“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学外国的先进技艺，只能造就一些“术数之士”，请外国人教书更是丢人的勾当。倭仁的这种迂腐主张，当即受到了奕䜣的讽刺挖苦和驳斥。奕䜣、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派分子的主张，则集中地表现在李鸿章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书》中讲：“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能御之！”这又道出了他们“自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镇压人民革命。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在安庆首先建立了一个洋式工厂——安庆军械所，造了一条150尺长的轮船——“黄鹄号”。同年，李鸿章也在上海设厂造开花炮弹。奕䜣也主张京中八旗营兵学用洋枪洋炮，而且想禁止汉族兵丁学用，“以免别滋流弊”。不过，满族旗兵已经腐朽，学用确无成效。英国有个驻华参赞叫米特福的，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这些旗兵学用洋枪的情况：

只看到半打的射击手，在城外打着20码远的靶子，那种样子，好像18岁的姑娘一样，这真叫我们国内的射击俱乐部会员都羞于看见。……



江南制造局

这样，“中兴”派的“自强”运动，也就主要地落到了汉族军阀的肩上。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花了四万两银子，

买了外国人开设在上海虹口的机器铁工厂（能修造轮船、洋枪），将苏州制造局的一些机器搬来，还花了五十多万两银子到美国买了些机器，留雇了铁工厂里的洋匠，办起了“江南制造局”，局下又附设了“译馆”。两年后，厂址迁到高昌庙镇，进行了扩建，内有机器厂、汽炉厂、洋枪厂、火箭厂，同治七年（1868）竟造出了第一艘大轮船，初名“恬吉”，后改名“惠吉”号，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附设的译馆，也翻译了外国科技书98种。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把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主持的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的雨花台附近，改名“金陵机器局”，这是一座洋炮制造厂。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由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法军官德克碑主持，还任用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同治五年至十三年（1866—1874）间，一共造了大船10艘、小船5艘。光绪二年（1876），还附设了福州船政学堂。

同治六年（1867），满族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机器局”，叫美国驻天津的领事——英国人密妥士[1]总管，建厂花了20多万两，每年又拨给税银20—25万两，可是，直到同治九年（1870）还是没造出火药来，只好交给新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着办。

此外，光绪年间，汉族军阀、官僚们在各省还办了一些近代工厂。如左宗棠的兰州制造局、丁宝桢的山东机器局等。它们都出自镇压人民的目的，有的军阀虽然也喊着要跟外国“平”起“平”坐，无奈机器、技术、管理等等都离不开并非全是精于制造的洋人，自己人又总离不开“贪污”二字，因此，同治的“中兴”，实在“兴”得可怜。江南制造局，只有干船坞一座，兵船坏了仍不免要到英国办的上海耶稣船坞去修理；它所造的云炮，一小时只能

---

① 一说是丹麦领事。

打七八发炮弹，因此，有人说这些炮“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这个局，成本54万两，每年还要花销30—60万两，钱是不断地流向官僚的腰包去了。这种以办局来贪污的行为，在李伯元的小说《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都有生动的揭露。金陵机器局造的大炮，质量也很低劣，经常“自我爆炸”。光绪元年（1875），在大沽炮台，两门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爆炸，炸死士兵七人。福州船政局，只能买到法国的旧机器和边角废料，所造战船落后而不堪一击。

然而，最不堪一击的还是“中兴”时期每况愈下的政治。“中兴”将帅各分畛域，互不服气。湘、淮各军私属性极强。湘军内部，也各立门户，各怀“自辟乾坤之志”，“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甚至只知其顶头上司而不知其最高统帅。淮军也有各种名目（以头目名号名其军，如“盛”、“庆”、“鼎”、“铭”等），曾国藩拨给李鸿章一些湘军后，也允许李无论进止、分合、保参等，都可“径自主持”。而在李鸿章镇压了捻军起义之后，淮军更只在李一人的“脚跟下盘旋”。同治九年（1870），李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掌握政府内政、外交、军事多方面大权后，其私人、部下，纷纷被他徇情转引、盘踞要津。军阀、政客各以喜怒为曲直、以爱憎为生死、以辖区为封土、用贪酷来发财。同年，京城武备院炮库的大铜炮、小铜炮和炮车也被盗，可算“中兴”政治的奇闻。

朝廷中，名义上是两宫[①]共同听政，东宫主大诛赏、大举劾，西宫主判阅奏章、裁决庶政、召对臣下、谘访利弊。实际上，东宫的钮祜禄氏因为限于文化水平，又缺乏政治头脑，故权力渐移西宫那拉氏手中。西宫权大，使同治皇帝也很恼火，他特别痛恨那些趋附西宫、监视自己并拨弄是非的太监们。同治皇帝尤其恨西宫走

① 钮祜禄氏住在宫东所的绥履殿，故称东宫、东太后；那拉氏住在宫西所的平安室，故称西宫、西太后。

狗、太监安德海，于是做了个模拟泥人来砍。同治八年（1869）九月，安德海去广东给西太后“织龙衣”，同治皇帝就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替他把安除掉。丁宝桢叫东安府程绳武下手，程尾随三日不敢动；丁复派总兵王正起将安从泰安捕回济南，而要斩安前，泰安知县何毓福又长跪力谏。这些情况，都说明那拉氏权势之重。国事方殷，库藏日竭，西太后却想重修圆明园。同治七年（1868）未遂，同治十一年（1872），复修之议到底取胜。这一年，广东无赖市民李光昭奏请“报效木植”，以便重修圆明园供太后“燕憩”。西太后立即给他赏了个道员的头衔，任命他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叫他到各省去采办木料。群臣谏阻，西太后还是一意孤行。而李光昭，也就得以遍游楚、川、江、浙林区，大肆勒索肥己，还打着“奉旨采办”、“圆明园监督”的条旗吓人。只因后来买法国商人的洋木发生纠纷，同治十三年（1874）法领事照会天津海关道，将李光昭和木料一并扣押，李鸿章才报告朝廷加以惩治。事实上，李光昭跟朝廷的内务府前后任大臣崇伦、明善、春佑、贵宝等人，一直是合伙贪污。只在这时，李光昭才被革职，圆明园的复修工程才被迫宣布停止。

“同治中兴”，就是这种情况。

## 八、“自强”不强，“求富”不富

——同治、光绪时期的洋务运动

同治皇帝即位时很小，西太后抓住了朝廷大权；同治皇帝18岁那年（同治十二年即1873），西太后导演了一场皇帝亲政的把戏，但仍旧把朝政死死地抓在自己手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载淳死在养心殿。

载淳下午五六点钟死，西太后当晚即召诸大臣入养心殿西暖阁“议要政”。大臣们问帝病，西太后笑答“无恙”，沉默片刻后便问

大臣们："圣躬颇虚弱，脱有不测，宗室中谁可承大统者？"内务府大臣文锡说："请择'溥'字辈之贤者立之。"东太后则请立奕䜣之子载澂，奕䜣又请立溥伦。这些人选年岁已大，自然都不符合西太后立幼儿作傀儡的心思，所以一概不被采纳。后来，她索性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说出来："醇亲王奕譞[①]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然后才厉声宣布："皇帝已经驾崩了！"诸大臣正在哭泣，她就把自己胞妹之子、四岁的载湉，派兵接进宫来，抱上了皇位，定明年为光绪元年，她也得以再次"垂帘听政"。载淳死后不满百日，她逼得阿鲁特氏吞金死去；光绪七年（1881）4月，她又毒死了东太后[②]。从此以后，她更一手遮天了。



同治帝朝服像

慈禧太后原先对"夷"人并无好感[③]，但无论同治时期还是光绪时期，她所掌握下的朝廷，却不能不实行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政策。政治上，不仅英、俄、法、美等大国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而且，一些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普鲁士、荷兰、意大利、奥匈帝国、丹麦、西班牙）也来享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经济上，英、美控制了沿海和长江中游以下的航运；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俄国人控制了两湖的茶价。……文化上，外国教会勾结官府、包揽词讼、强夺田产、豢养土棍流氓杀害中国人民，还大办附设学堂培植买办洋奴（到光绪二年，即1876年，光美国教会所办学堂即达294

① 咸丰皇帝奕詝的七弟，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

② 一说她是病死的，死时才45岁。

③ 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她曾怂恿咸丰皇帝下诏杀掉在通州被扣押的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以示不屈。

所）。因此，六七十年代，湖南、江西、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台湾、四川、贵州、湖北等省，尤其是天津（同治九年，即1870年），都发生了反对外国传教士暴行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被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清朝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慈禧太后的思想是比较守旧的。不过，在镇压各次人民斗争和起义的过程中，她却也看到了洋枪、洋炮、洋船的用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她虽然也和顽固派唱着同一调子，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她还能同意兴办新式军火工业，搞一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一般工业，用她手下一些买办臣僚的话说，就是“自强”、“求富”，其实，不过是在军事上、经济上更加离不开外国。结果自不免是“自强”不强，“求富”不富了！

以建立海军为例。同治一、二年（1862、1863）间，朝廷拨款107万两，叫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代表清朝到英国去买兵船。李泰国买了兵船七只（中号的三只、小号的四只），但却聘请了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本思当司令，还雇了英国军官、水兵六百多人，更把这支舰队命名为“中英舰队”。只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坚决反对，才没有接受下来，又花了375 000两银子将船退了，将司令和水兵们辞了。光绪元年（1875），朝廷又拨款四百万两建立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水师，结果，还是得向外国买船。外商们为使李鸿章买自己国家的次船，不惜贿赂李的幕宾甚至厨师、理发师。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买的英国“蚊子船”，没用两年就大都坏了。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的22艘军舰，大都是英国和德国货，“教习”也是英国人和德国人。而海军衙门[①]成立后，就再没买过一艘军舰。每年拨下的四百万两海军经费，根本不用于扩大海军的装备，绝大部分被挪用去修造颐和园了。到光绪二十年（1894），修颐和园挪用的海军军费就达2 000万两（此外，还挪用了修筑铁路的经费1 600万两）。这种情况，又怎能达到“自强”

① 成立于光绪十一年（1885），奕譞为总理大臣。

的目的！

在镇压人民起义、建立新式军事工业以及支付外国赔款的过程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感到财政的不足，于是，也想像外国一样，“由工商致富”。这样，从同治后期开始，也着手兴办一些采煤、冶炼、交通、纺织等方面的新式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设）、开平矿务局（光绪四年，即1878年设）、漠河金矿局（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即1880年设）、汉阳铁工厂（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动工）等。外国商人的排挤掠夺，顽固派的阻挠非难，办事官僚的贪污和慈禧太后的挥霍浪费，使这些工业大多变成了赔本的买卖。上海轮船招商局受到英商太古、美商旗昌等轮船公司的排挤，两次将码头和轮船押、售给外商；开滦煤矿光绪七年（1881）出煤，光绪二十六年（1900）连矿也被英国商人夺去；汉阳铁工厂，建厂于汉阳，煤从江西萍乡运，铁从大冶运，设备和技师（40多人）都是德国的，从动工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年间，就花出了580万两。咸丰十年（1860），黑龙江漠河地区的鄂伦春人发现当地产金块，黑龙江将军竟毫无知晓，结果，俄国人便蝗聚蜎集而来盗采。同治二年（1863），俄竟设立“漠河金矿”，大肆招募俄国工人、逃犯、商人、退休官吏，公开开采起来。到光绪十年（1884），他们已造屋七百多间、立窑五百多所，招工已上万人，还居然设立“政厅”、“法庭”、“警察”、“祈祷堂”、“刑场”和赌场、妓院等等，僭称“极尔吐加共和国”！他们盗采和公开开采的金子，仅光绪八、九年（1882、1883）两年间，即达219 000多两！俄人之外，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一些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美国人和犹太人。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黑龙江将军才发现外国人偷矿，报告朝廷，派兵收回，筹资开采！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俄国又出兵将它捣毁。

外国侵略者就是这样叫清朝“求富”的！而清朝对于上述企业，也不断按比例（10%、30%）抽军饷、办喜事（慈禧太后的

生日“报效”，一次各在几万两），因此，上述企业的命运更可想而知。至于铁路修建的笑话，那就更多：同治四年（1865），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里多长的铁路，被朝廷视为怪异，勒令拆除；光绪二年（1876），英商在上海修了吴淞铁路，朝廷花了28万两银子赎回拆掉；光绪六、七年（1880、1881）间，开平矿务局为了运煤，修了唐山和胥各庄之间11公里的铁路，但朝廷竟怕火车震惊皇陵，下令只许用骡马拉曳，把火车变成马车！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清朝“自强”、“求富”，非但没强没富，反而更弱更穷：别的不说，光说外债，咸丰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1861—1894）间，就借了4 500多万两！有个外国传教士叫林乐知的说：外国希望中国“非强不可”，不“强”外国就没法来做“生意”（怕中国人民起来不让）；外国还希望中国“非富不可”，不“富”就买不起“西国之物”。这话说得很露骨，不过，却从侧面揭示出到底是谁强谁富了！“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马而我骑驴。”（左宗棠语）当然还是得被动挨打了！

# 第二章　列强宰割下的清朝

## 一、慈禧太后与中法战争

不强不富的清朝，使侵略者的胃口愈来愈大了。它们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内地，而且对中国沿边进行侵略，以便以这些地区为根据地向更广阔的中国腹地伸展。同治三年（1864），俄国强迫清朝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吞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同（治）光（绪）之际，又利用阿古柏[①]入侵新疆之机，“代管”了伊犁河流域一些地区。光绪二年（1876），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获得了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路”的权利。同治十三年（1874），美、日联合武装侵扰台湾；光绪五年（1879），日本侵占琉球，把琉球改为“冲绳县”。光绪二年（1876），日本强迫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光绪十一年（1885），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意其有权派兵到朝鲜，一贯支持日本侵略朝鲜的美国当然也在朝鲜取得了许多的特权。

位于中国西南的邻国安南，因为嘉庆七年（1802）阮福映被颙琰册封为“越南王”，改称越南。越南上层集团一贯内斗不已，造成了“官‘民’委惰”、腐败贫穷的局势，因此，一直遭到法国

① 中亚浩罕国的高级军官。同治四年（1865）与新疆封建主金相印相勾结，率军入侵，攻占天山南路诸城，后自称汗。光绪三年（1877）被清军击败，服毒身死。

的侵略。同治元年（1862），越法第一次《西贡[1]条约》，法国割占其外三省；同治十三年（1874），越法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又割让了内三省。随后，法国还派兵攻占了河内。光绪二年（1876）、光绪六年（1880），越南曾两次向清朝求援，清朝没有出兵，只有太平天国起义将领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在越南帮助反抗侵略。光绪九年（1883），越南国王阮福膺（只有 12 岁）再次向清朝呼救，因为法军已将战火烧到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所以，慈禧太后才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做点姿态，4 月里，派直隶总督李鸿章去广东督办越南事宜。

李鸿章“窥见皇太后有不欲复仇之心”，因此，不但不去广东，而且以出兵越南会影响关税收入，越南“地本最瘠，万山丛杂”、“道路崎岖，水毒风恶，烟瘴终年不解”为由，说“不值干预以承越人之弊，尤不可挑衅以失法人之欢”，因此，只跟法国公使宝海秘谈。驻法大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报告：法国将派兵 2 000人长驻越南。李鸿章则说：法国并不想全吞越南，还反驳：“西人夸诞之言，奚足深信！”有人报告：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战胜了法军。李鸿章又说：黑旗军未必能长久不败，法国的海军更是厉害得很！

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像侍读学士周德润、两江总督刘坤一、云贵总督唐景崧等，纷纷上疏慈禧太后，说是唇亡必寒齿，西南一开则中原难免等等，慈禧太后竟批驳他们是“不悉原委，措词失当！”工科有个给事中叫秦钟简的，上疏说李鸿章是吓唬朝廷、为谋私利、想保自己的淮军，因而，应该罢斥他。慈禧太后当然更不理睬，只在秋季派兵部尚书、湘军将领彭玉麟去广东节制。

朝廷决心不大，诸军在越不力，全被法军打败，彭玉麟又派湖南巡抚潘鼎新改任广西巡抚，进驻谅山，派云南总督岑毓英出镇南关督师，进驻保胜。前线将士已在观音桥接战取胜。而慈禧太后却

① 以前叫“嘉定”。

紧催李鸿章等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等抓紧谈判，谈判到底，千万不要"迁延观望，坐失事机"，千万不要"以人言（主战派的议论）为转移"，"当思倚任之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还撤换了曾纪泽，叫淮系僚属李凤苞接任驻法大使。同时，下令在观音桥打败法军的部队，撤回镇南关里。

法军陆路没有得手，转向海路。7月侵犯台北，被守将刘铭传击败于基隆岸上，又被孙开华击败于沪尾（淡水）岸上，法国海军的旗帜也被缴获。8月，法军又转向福州的海口。法军司令孤拔亲率大小船只14艘[①]闯入马尾军港。海防事宜大臣张佩纶请求先发制人，福州将军穆图善也不想叫法军进入海口，但是，李鸿章给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打密电说：和谈"大有进步"，因此，闽浙总督何璟等便下令：先发者斩。法舰得在英、美舰只的掩护下长驱直入。法舰进入海口后，各船管驾向指挥官张成建议将舰只散开，张成也不听，还叫原地抛锚不动。8月23日下午1点56分，孤拔下令林克斯号法舰首先开炮轰击中国舰队，其他法舰也同时一齐开炮轰击，打了个猝不及防。但是，中国舰队仍进行了英勇的还击：振威号管驾许寿山当即砍断锚链，在两艘敌舰的夹击下，舰受重伤，还装上炮弹决心撞击敌德士达号，在敌维拉耳号侧击，舰只已经下沉时，还最后向敌射出一炮。飞云号督带高腾云，也亲自放炮，击中敌人三艘军舰。福星号管驾陈英，见法舰以英美军舰为掩护，于是令开左右两侧诸炮，冲入敌舰群中猛射，从上游冲到下游，再装弹药后又从下游冲到上游，与孤拔座船伏耳达号接火。陈英中弹牺牲后，王涟自动指挥，击伤孤拔的座船（硝库中弹起火，当场炸死七人）。然而，终因应战仓促，船又废旧（11艘中还有9艘[②]木舰），结果，全被击毁。但法舰也有六艘受伤。法舰随即将马尾造船厂轰毁。

---

① 一说十艘：战舰八艘，水雷艇两艘。

② 一说九艘：七艘兵舰，两艘商船。

慈禧太后闻报，不处分李鸿章，只把何如璋、张佩纶交部议处！①

光绪十年底（1885年初），孤拔率舰又攻镇海口（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湘系）据招宝山炮台反击，沉其一舰，孤拔也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岛上。

马尾战后，慈禧太后下令对法宣战，但又指示李鸿章：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议和！

在慈禧太后的动摇反复下，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85年2月13日），谅山守将潘鼎新连夜北逃，逃进镇南关后还不抵止，一直到了海村，方才停脚，夜里还躲在船上睡觉。法军乘虚直北，打到了离镇南关只有十里远的关前隘，多亏老将冯子材的出马，才扭转了战局。

冯子材，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弹劾过李鸿章在广西的代理人（提督徐延旭），光绪八年（1882）告老回家，后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为提督。冯子材见军心不稳，下令：退者斩；又率三路兵马进屯关前隘五里处的“品”字形的三座小山（俗称“小南关”）上，并在山前筑了长墙、挖了壕沟。3月23日，法军大至，乘大雾爬上长墙。年近七旬的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鞵，持矛大呼跃出”，反击法军。他的两个儿子（冯相华、冯相荣）从其左右而上，顿时军心大振，带伤的游击宁裕明也率兵夹击，法军顿溃。因为法军足登革履，所以，不少人滑倒在春草湿地之上，哀鸣之声不绝，没倒的，投降举枪、脱帽施礼、以手捂颈，狼狈不堪。冯子材乘胜麾军，连下文渊州、谅山、谷松、威坡、长庆、船头，八昼夜挺进好几百里！法军统帅尼格理负了重伤，法国茹费理内阁也于3月31日倒台。中法之战，中国是打胜了。

然而，李鸿章等却主张赶快缔结和约，“否则又兵连祸结”；慈禧太后也立即下令停战、撤军！有个外国人叫麦克讷尔的说：

① 事后有人揭发，炮声响后张佩纶与何如璋皆率先逃跑。

她（根本）不管她的英勇的部队在帝国边境上所获得的胜利，而只是想起给她带到家里来的不愉快的庞大的战争消费，只是想起那些使她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因此，她从来就没有想到要撤回条约，而是比过去更急迫地要立刻签订和批准这个条约。

因此，她除了派英人、海关职员金登干赴巴黎外，又派李鸿章与法使加紧和谈于天津。

条约还没签成，慈禧太后的宠臣李鸿章就电告张之洞：

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惟该督是问！

4 月 7 日至 6 月初，慈禧太后连下九道谕旨叫抗法援越的部队（包括刘永福的黑旗军）撤回国内。时人把此事与南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下金牌招岳飞回师相比。有人写诗说："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铜柱合铭交趾国，金牌突召岳家军。"兵部尚书彭玉麟也写诗道：

曰南荒徼阵云开，喜得将军破敌来。
扫荡妖氛摧败叶，惊寒逆胆夺屯梅。
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
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

6 月 9 日，慈禧叫李鸿章跟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条约共十款，主要是：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办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则较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等等。法国战败，竟享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

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因此，有人评论这次战争是："法国非胜而胜，中国非败而败。"

在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这种投降卖国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不但进一步丧失了"藩属国"，就连大块的本土也进一步保不住了。

## 二、后党专权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之际，光绪皇帝载湉尚未成年，作为姨和婶娘的慈禧太后是大权独揽着。光绪十二年（1886），载湉已经 16 岁，他的老师翁同龢等又极反对太后干政，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明年正月"归政"于君，自己只是"训政"。但是，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载湉"亲政"之后，朝野大事也还得慈禧太后这个"老佛爷"做主。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朝廷，对外忍让，对内镇压、盘剥，不仅使一般人民生活更加痛苦，而且使许多近代民用工业同样遭到摧残。同治十一年（1872）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商办企业 54 个，一共才有资金五百多万两。广东华侨陈启源，在家乡南海县，以蒸汽为动力，用机器来缫丝，建起"继昌隆缫丝厂"，被视为"异端"，勒令停办；李福明在北京办起面粉厂，也被扣上"不安本分"（因李是被革武举）的帽子，强迫停工。大批的钱财，都化为了慈禧太后等人的奢侈费。慈禧太后一顿"正餐"，要摆一百个菜，金银餐具重 15 800 多两。光绪二十年（1894）11 月 7 日，是慈禧太后 60 岁的生日，满朝亲信从年初就集中全力大修颐和园，筹办"万寿点景"（从城内经西直门到颐和园，五步一景）；定做太后之衣 135 套，即花银 38 000 多两！因此，慈禧太后掌权以来，中国好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而与慈禧太后掌权几乎同时，日本却大大地有了发展。同治六年（1867）12 月，明治天皇下诏维新，从那以后，废藩置县、统一货币、统一关卡、结束割据局面，奖励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开始

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开始向外侵略了。同治十年（1871），中日签订《天津修好条约》（18 条）、《通商章程》（33 款），中国未许日本通商内地并享受最惠国待遇，日本当然不满足。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三千人进攻台湾；光绪五年（1879），日本侵吞琉球。慈禧太后此时"奖用直言"，群臣议论一气，太后毫无主见、无所适从，琉球丧失。而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更批准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条约》，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把明初以来五百来年的"藩属"朝鲜交给日本共管。朝鲜人民在中日两国统治阶级和国王的压迫剥削下，"终年勤作，不剩盐价"，恰如诗人崔时亨写诗说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光绪十九年十二月（1894 年 1 月），全罗道古阜郡的农民，借着郡守赵秉甲强征民工修建贮水池的机会，提出"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等口号，发动了起义，波及到朝鲜全国。朝鲜国王请求清朝派兵镇压，日本政府也乘机出兵。起义被压平后，日本不但不撤兵，而且占据汉城，继续增兵。直隶提督叶志超退驻牙山，请求增援，李鸿章则以"万寿庆典，华必忍让"为由，迟不派兵援救。驻朝商务总理袁世凯见事不妙，托病离朝回国。7 月 23 日，日军闯进朝鲜王宫，解除朝鲜军队武装，还扯下了中国使馆的国旗。

消息传来，帝党分子翁同龢主张"大张挞伐"，翰林院侍读文廷式主张"有争无让"，礼部侍郎志锐说如果"一误再误，则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修撰张謇也力主"进兵"。但是，光绪皇帝问慈禧太后是否增兵，太后只是说"不准示弱"，后党分子李鸿章迟迟不肯派兵，一味幻想列强干预，电示叶志超"静守勿动"。等到日军已增至万人，封锁了海岸，李鸿章才雇用了英国商船，装了二千兵增援牙山孤军，结果，被事先埋伏的日舰歼灭在牙山口外的丰岛。7 月 28 日，日军进攻牙山，叶志超狂奔北逃。

8 月 1 日，清朝对日宣战。帝党分子纷纷上疏，请停颐和园修

建工程，增加军费。慈禧太后大怒，威胁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毫不把战争当一回事。匆匆开赴平壤的各路陆军，各持派别畛域，互不服气，有的一路奸淫掳掠，有的置酒高会，有的互相开炮轰击。而败军之将叶志超溃到平壤，假报捷音，李鸿章竟赏他白银二万两，任他做各路军的总统。

9月14日，日军前锋进犯平壤近郊，叶志超又想逃走，被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回族人）拦住。15日，日军大至，左宝贵亲在北山指挥抗击，打死日军无数；提督马玉昆等的骑兵，也在大同江东岸，杀死日军颇多。但日军集中轰击左宝贵军，左宝贵中榴霰弹牺牲于玄武门楼。叶志超于是命令遍插白旗、弃城逃跑，一气逃到鸭绿江北的九连城、凤凰城一带。陆上的“平壤之战”，清军以失败告终。

9月17日，北洋海军的十艘军舰，在运兵返回黄海海面时，突然遭到了日本12艘军舰的偷袭。中国军舰在匆忙中排成了半月形的不利阵势，而海军提督丁汝昌和英国顾问泰莱又在战斗未正式展开时摔成重伤，中国水师还是进行了英勇的还击。致远号受了重伤，弹药殆尽，管带邓世昌便大呼一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随即亲操轮舵，开足马力撞击敌主力舰吉野号，不幸中途中了鱼雷，锅炉爆炸，战舰下沉，自己也坠入海中。他的义仆刘忠给他救生圈，他拒而不受；他的爱犬来衔他的胳膊，也被他打开。爱犬又游来叼他的头发，但愤不欲生的他，竟望海浩叹，扼犬而逝。全舰250人（包括邓世昌的堂弟邓世坤），全部壮烈牺牲。经远号也是战斗伊始即被敌人切割在外，管带林永升同样是机智沉着、独立应战，全舰将士狠击敌舰。敌舰逃时，林永升指挥追击，不幸也中鱼雷，全舰270人英勇殉国。五六个小时的激战，日本水师提督伊东祐亨乘坐的旗舰松岛号受了重伤，赤城号舰长坂元八太郎被击毙，日本官兵死154名，负伤的有26名军官、381名士兵，还有40人不知下落。这一仗，中日损失大抵相当。而日本全国才有军舰二十几艘五万多吨，中国全国则有八十来艘（八万来吨）。战斗尚可打

下去。但是，慈禧太后和待在家里的老卖国贼奕䜣却有意于议和了，李鸿章也从此不许北洋舰队再出威海卫。

10月26日，日本陆军攻占九连城和安东。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叫翁同龢来传旨李鸿章请俄国干涉、议和。11月1日，公开起用奕䜣；3日，奕䜣就哀请各国干预。日军，则向旅、大方向猛扑过来。总兵徐邦道闻知，主动迎击于金州（金县），但大连守将赵怀益，不但派兵运军粮到烟台贩卖，拒不援助徐邦道，而且亲赴码头督运什物，于11月6日把大连驻军全部撤光，使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于七日进占了大连。而七日，慈禧太后照样大庆诞辰，还宣布演戏三天，真是"一人庆有，万寿疆无"①！

11月18日，日军攻打旅顺。旅顺统帅、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逃往烟台。22日，日军攻陷旅顺，辽东半岛基本沦陷。侵占辽东半岛的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充分表现了其豺狼本性。他们在怀仁、宽甸一带"亟肆焚抢"，在金州、复州、岫岩、凤凰城、海城、盖平、熊岳一带也"掠掳妇女，抢夺财物"。牛庄的日军官，派工兵炸毁民房、执剑四处杀人；田庄台的日军，竟放火将一切"全归乌有"！攻陷旅顺后，日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更下令屠城四天，使全城只剩下36人（为埋死尸而留）！有个英国人叫阿伦的，曾经描述过屠城的惨状：

"（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总结，他就慢慢地把做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所过街道，死尸堆积得几尺高。……在一个钱铺里，看见地板上铺满了一地死尸。……亦有开膛破肚的……亦有斩做两段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签着无数的人头……柜台旁边还有一个大

① 慈禧生日贺词中有"一人有庆，万寿无疆"之词，人们后来改成上面的句子，表达了对她卖国行为的气愤。

钉子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孩。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而清朝从光绪六年（1880）起，十几年来，花了几千万两民脂民膏，苦心经营起来的旅大军港，连同那二百多门新式大炮、二百多万发炮弹、无数的枪支军粮等等，也尽归日军所有了！不久，辽东半岛全部沦陷。

清朝当时还有几十万军队（日本全国一共才12万多陆军），慈禧太后、奕䜣、李鸿章等不思抗战，却于11月下旬，赏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林头品顶戴，任命他为代表赴日求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嫌他权力不大，拒不接见，只叫侄子跟他打了个照面，把他刷了回来。12月底，慈禧太后又命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求和。伊藤还嫌他们没有全权，又拒绝了他们。同时，日本乘机加紧攻占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威海卫。

日军进攻旅顺时，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奏请率舰出援，李鸿章当即斥道："守住你的几只船舰别损失就得了，其余的不是你应该管的事！"李鸿章不准北洋舰队从威海卫出来，给日本造成了聚歼北洋舰队的有利形势。光绪二十年（1895）1月20日，日本陆、海军开始攻击威海卫，到2月12日，20多天里，北洋舰队始终没有奉命还击，守将们不是逃走，就是在美国人浩威的煽动下投降。丁汝昌命令突围，将领们不听；命令沉船，将领们又怕投降没有资本。丁汝昌不肯投降，在11日服毒自杀。12日，浩威替降将们起草了降书，把11艘幸存的军舰交给了日本。李鸿章惨淡经营的北洋舰队彻底覆灭，而修建了十年的威海卫军港也拱手送给了敌人。

北洋舰队覆灭，后党更有理求和了。2月13日，慈禧太后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第二天，又命李的嗣子李经方①、美

① 李早年无子，将兄之子过继而来，曾任驻日使臣。

国人科士达[1]随行。李鸿章等3月20日起，与日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等，开始在马关的春帆楼谈判。24日，第三次会谈结束，李鸿章从春帆楼返回行馆途中，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行刺，伤了左颊（左眼下），伤势不重，但流血颇多，以至于当场晕倒。但是，30日，他半面包着绷带，用绷带外的一只眼，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4月17日与伊藤等签订了卖国辱权的《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共十一款，内容主要是：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在各埠间航行，日商可在各埠设立工厂；日军暂驻威海卫，等等。

李鸿章回国后，躲在天津，用15万元的酬金叫科士达到北京，胁迫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个卖国条约，5月8日在烟台同日本互换了文本。俄国为了独占东北，对日本霸占辽东半岛不满，联合德、法出面干涉，不久，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迫使日本同意中国以三千万两银子将辽东半岛赎回。不过，日本的割占中国台湾省[2]，不仅使台湾人民蒙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而且开了各列强国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中国对日的巨额赔款和赎金，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日本在通商口岸的设立工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等，也使中国人民进一步遭到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而以干涉还辽“有功”的俄、德、法三国，当然要首先掀起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大大地加速了！

## 三、“百日维新”与帝党的彻底失败

光绪皇帝在批准《马关条约》时，曾作砾谕说：“嗣后我君臣

① 以25 000美金聘来，一月底曾代表清朝去广岛，被斥回。

② 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改成行省。

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究，亟求兴革，毋生懈怠，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以收自强之效。……”光绪皇帝这些话，无疑来自幼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潮的感染。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已出现了早期的改良思想。中法战争之后，这种改良主义思想，便形成了一种思潮。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渐渐发展，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渐渐形成，主张变法自强的人也越来越多。甲午战争前后，“触景伤时”、力主变法的人，便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运动。这种人，在朝廷中以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在朝廷之外，活动得最欢的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祖父做过学博（县学教官），父亲做过知县。11 岁时，父亲死了，他就到连州县跟祖父康赞修学习理学。他学得虔诚而用功，开口闭口总是“圣人云”，因此，人们把康有为称作“圣人为”。不过，在往来乡试的途中，这个“圣人为”却不断地了解世界、攻读译书，思想并不守旧。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在应顺天乡试时，即首次上书主张变法，随后又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宣传变法的主张，还在广州长兴里主办“万木草堂”学馆，培养变法志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京应试时，组织了 1 300 多名①举人联名上书，主张处分签订《马关条约》的臣僚，拒绝批准这条约，迁都西安，“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光绪帝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3 月、

① 一说 1 200 余人。

7月，德、俄、法等国，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分别强占了胶州湾、旅大港和广州湾，英国也乘机强占了威海卫和九龙，民情大愤。12月，康有为于是第五次上书，呼吁变法，并指出光绪皇帝亲定大政才是上策。

但是，光绪皇帝面临的，却并非上下都“坚苦一心”、“亟求兴革”。甲午战后，朝廷内的两党（帝党、后党），阵营更加分明，连一般臣工也知道存在着“老母班”和“孩子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老母班，一心投靠俄国。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跑到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向俄国出卖了路权、矿权、军港和驻兵权，回国后还吹嘘：“我可以担保二十年以内不发生什么事情。”帝党分子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便奏称他们是结党营私、贩卖西学，慈禧太后就强迫光绪皇帝下令封闭和查禁，后来更罢了文廷式的官。现在，光绪皇帝看了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想召见他，后党另一头目奕䜣便出来阻拦，说：“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①，皇上有所询问，可命大臣传语。”

光绪二十四年（1898）1月24日下午3点来钟，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兵部尚书）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西花厅，召见康有为。荣禄首先发难，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立即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固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当斟酌情形逐步地改，这样，新政才能推行。”至于政治、经济措施方面的问题，康有为更是答得头头是道，直谈到天黑以后才结束。

翁同龢再次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说：“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而康有为，则在被大臣召见后的第五天，又写出了第六次

---

① 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进士，只任工部主事，不及四品。

的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折中再次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且请皇帝率大臣宣誓变法，设上书所揽才考政，设制度局（下包法律、度支、工商、教育、陆军、海军等十二局）议政实行，还建议改革科举、设立学堂、翻译西书。不久，又第七次上书，鼓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夏天，御史杨深秀等也上书请求“明定国是”。慈禧太后则假惺惺地表示：“皇上要办的事情，太后决不阻当（挡）。”于是，光绪皇帝便在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有名的“百日维新”活动开始了。

16日，光绪皇帝破例召见了康有为，跟他谈了两小时。光绪皇帝说：“你定的条理章则很详备。”康有为问：“那么皇上为何不厉行呢?”光绪皇帝看看帘子外面，停了一会儿，感慨道：“我受到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呵!”于是，康有为建议：“皇上可以就权力所能做到的先做”；“只要用京卿、御史两官分别担任内外各种差事，事情就可以办起来”；“下谕旨很重要”，“请皇上多下谕旨……他们（守旧大臣们）就无从驳议了”。……光绪皇帝听了很高兴，宣布康有为做总理衙门章京行走，专管奏折之事。不久，又召见康的学生梁启超，赐他六品衔，主持办大学堂和译书，还召见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赐给他们四品卿衔，做军机处章京（人们称这四人为“军机四卿”），批阅奏折、拟写谕稿。这样，康有为和“军机四卿”，借助光绪皇帝的“上谕”，把变法运动推向了高潮。



康有为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103天里，“上谕”一共下了110多道。主要内容是：

文化、教育和思想方面，宣布：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秀才考策论，不凭楷法（字的好坏）取士，开设经济特科（考拔科

技人才)；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各省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兼授的学堂，并在各地筹办铁路、矿务、农务、医科等专门学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派人出国游学、游历考察；奖励发明创造和科技著作，鼓励办报，禁止官吏阻挡言路。光绪皇帝本人，每天从早到晚批阅奏章。奏章格式也不讲究，有的甚至写成一张二尺长条，跟普通信札一样。有个举人，在奏章上骂光绪皇帝“变乱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有人看了，主张法办，光绪皇帝则说：“我正在广开言路，如果把他办了，还有人敢上书言事吗?”这可看出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不小。

财政、经济方面，宣布：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保护、奖励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修铁路、开矿产（在北京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办邮局、撤驿站（在北京和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各省、府、州县也办邮政，旧有驿站逐渐撤销)。

军事、政治方面，宣布：精练陆、海军，采用新法，八旗满、蒙、汉军，也一律改习洋枪、洋机抬枪，“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认真操演”，枪弹、炮弹也统一规格，各省还要增加水师学堂招生名额。改订规章制度，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裁撤皇室家务管理机关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掌管内外章奏的通政司等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鄂、滇、粤三省的巡抚；并要求各督抚“将现有各局所有冗员，一律裁撤尽净，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盐道、水利方面的闲官，也在“裁汰”之列。对于那些坐吃山空的旗人，“上谕”说得很巧妙：过去“格于定例，不得在外经商贸易……现……驰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士农工商）之业，以资生计”，实际上是叫他们从今而后自食其力。

这一切，不但违背了墨守成法的后党的利益，而且，遭到了一切守旧势力的不满。湖南有个举人叫做曾廉的，马上上书请求处死康、梁；内务府大臣立三，也领着满员到慈禧太后居住的颐和园告

状；庆亲王奕劻还和太监“皮硝李”[1] 一道，同时跪在慈禧太后脚下请求太后重新“训政”。

至于慈禧太后本人，那就闹得更凶。早在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她就逼着光绪皇帝下了三道朱谕：撤翁同龢户部尚书之职，说他“揽权狂悖”（实际上因他在甲午战时拒绝给颐和园修建工程拨款，荐举康有为、主张变法，并知道了她想用阅兵方式废掉光绪皇帝）；新授二品以上大员，必须到太后那里谢恩（批准）；任兵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便亲自抓住京津一带的军权）。慈禧太后就这样假光绪皇帝之手，首先孤立了他，控制了人权、军权，并与荣禄约好：秋天乘她和光绪皇帝去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废掉光绪皇帝。

荣禄到天津抓军权去了，慈禧太后就命四川总督裕禄做礼部左侍郎入军机处，侦察帝党动静，还叫自己的亲信做负责正阳、崇文、宣武等九门警务的步军统领，对宪兵队“健锐营”和颐和园警务官，也派自己的亲信掌握。

9 月初，光绪皇帝罢免了阻挡言路的后党分子、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名堂官，慈禧太后便劝在颐和园陪她的怀塔布的妻子暂时忍耐。光绪皇帝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后，慈禧太后就叫裕禄在衙门行走。后党分子得到慈禧太后做靠山，也更放肆攻击帝党和皇帝，他们四处造谣，说光绪皇帝要谋害慈禧太后。于是，慈禧太后也就加紧发动政变了。14 日，荣禄把聂士成率领的武毅军（比较能打）调到天津（以防小站袁世凯的新军有变），又调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郊区的长辛店（以切断小站和京城间的通道，并支持北京城内的卫队）。光绪皇帝受到威压，给杨锐下密诏说：太后不愿将法尽变，老谬昏庸大臣难以罢免，“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朕位且不能保”，“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设法营救”。17 日，又亲自写了一道密诏叫林旭带出给康有为，

---

[1] 即李莲英，因为他曾贩硝、补皮鞋。

叫他“迅速出外，不可延迟”，以便“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谭、林、康等人捧诏相商，谭想去求袁世凯，林旭不赞成，写诗说：“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引用东汉末袁本初（绍）与何进想召董卓诛宦官，最后董卓竟废汉少帝刘辩而立汉献帝刘协，把持朝政的故事，劝谭不要轻向袁谈。但大家又想不出更好的主意，18日夜里，谭嗣同只好到法华寺求袁世凯了。谭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说：“旷代圣主”。谭于是说：“现在可以救我圣主的，只有你；你愿意救他就救他”，说着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继续道：“如果你不欲救皇上，向颐和园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袁世凯当即答道：“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要担当的”，随后又说：“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的营里，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谈话一直到三更。第二天，康有为去求英、日公使干预，也未奏效。第三天，袁世凯被召见，向光绪皇帝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他把自己打扮成忠臣，又把“泄密”的责任推给别人。而当天傍晚，他却只带一个卫兵，匆匆赶赴天津，向荣禄告密，还胡说帝党叫他率兵冲进颐和园，“在乱兵中结果太后的生命”。荣禄连夜赶到颐和园报告慈禧，慈禧立命“皮硝李”备了銮舆，亲自率兵回宫政变。

9月21日清晨，光绪第三次得到太监王商报告后，便在外殿石坪上跪迎慈禧。慈禧“满面怒容，颜色泛白，白中透青”，光绪请安，她听若未闻，由“皮硝李”搀着，直冲光绪的寝殿，问：“子杀父母，该何罪?!”光绪皇帝本来骨头就很软，又深受封建孝道的教育，加之手头更无任何实力，因此，不得不屈从于“亲爸爸”慈禧的权威。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宣布皇帝有病，由她“临朝听政”。从此，光绪每晨只是坐在慈禧的右边受朝而不能发言，朝罢即被押往瀛台，成了坐关和尚和不带枷锁的囚犯（他的

爱妃珍妃却被囚禁在御花园东北角的小屋里)。慈禧又同时下令废除新政(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捕杀变法分子，至此，“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谭嗣同像

28日下午四时许，“军机四卿”(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和康广仁(有为之弟)、杨深秀(政变后还上疏质问为何囚禁皇帝和训政)，被杀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史称此六人为“六君子”。康有为事前逃到天津，搭了英商太古公司“重庆”轮到上海，在“十一死而未死”的情况下，由英国兵舰护送到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逃往日本。人们劝谭嗣同逃跑，这个湖南浏阳的革新派战将却说：“各国变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不成功，现在让我开个头吧!”还有个叫王正谊的大侠，愿意做保镖跟他同逃，他也拒绝了。被捕后，他毫不屈服，挥笔题诗牢壁道：

>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①
>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②③。

其他五君子，临刑也表现得很慷慨。

然而，参与变法、行法的“帝党分子”，彻底被击败了，翁同

---

① 张俭、杜根都是东汉人，前者因弹劾宦官被诬，士兵不敢下手捉，熟人纷纷破门袒藏他；后者反对邓太后临朝，被百般拷打、几至身亡而不悔，后逃为酒家保。张俭、杜根都指康有为。

② “两昆仑”指康有为和王正谊(大刀王五)。谭嗣同把重整旗鼓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③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引《南社诗话》说：有个老狱卒叫刘一鸣的，曾看守谭嗣同六人。刘讲：谭在狱中，意气自若，整天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在墙上写字，问他写什么，他笑说“做诗耳”。可惜刘不识字，不能笔录。因此，流传下来的只此“一绝而已”。

稣在家乡被管制，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其他 40 多人，也通通被革职。而荣禄则升任“军机大臣上行走”，裕禄也当了直隶总督，袁世凯更是从直隶按察使升为护理直隶总督。李鸿章也被重新起用为商务大臣、两广总督，他在广东，把梁启超的 90 岁的祖母逼死在狱中，又挖了梁家的祖坟。那个梳头房的太监“皮硝李”，政变后更是“青云得步树”，死的时候，庆典如同元勋，存有的现银竟达三百余万两！

“百日维新”的失败，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还很幼弱，它的知识分子不相信人民，想依靠一个软弱的封建皇帝自上而下的发布诏书，甚至想用袁世凯这个军阀来为新政卖命，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只不过是与虎谋皮，纯属幻想，在顽固的封建势力的镇压下必然要遭到失败。在后党投降卖国路线的统治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于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更加沉重而残酷了。

## 四、借刀杀人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运动

慈禧太后和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并不满足于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所以，政变后，便放出风来，一会儿说皇帝有病，病重，一会儿又说康有为已用蜡丸把皇帝害死。总之是想在一阵舆论之后，把光绪皇帝废掉。无奈一些洋务派的臣子不甚赞同，英、法驻京公使，为了本国在华的利益，希望维持老局面，因而也向她发出警告，法国公使还派医生多德福入宫看光绪皇帝死没死。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计划落空了。荣禄就向慈禧太后献密计：立端郡王载漪（咸丰皇帝的次子）之子溥儁为同治皇帝的嗣子作为皇太子，然后再废掉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觉得是个办法，便宣布立储庆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1 月 24 日举行。不料各国公使又不入贺。最使

慈禧恼恨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康有为送走，又帮助经元善逃到了澳门。这个经元善，是个候补知府，和康有为不错，曾捐资办过女学堂，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还上疏请求保护光绪皇帝，因此，也在通缉之列。

鉴于这一切，慈禧太后便与洋人发生了尖锐矛盾。载漪为了让儿子赶快登基，也恨洋人，慈禧太后于是叫他做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首班，取代了奕劻的地位；庆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也成了一时的红人。还有个80岁的老顽固大学士徐桐，不仅是太后亲信倭仁的学生，而且一贯盲目排外，每见洋人，都以扇掩面，这回又积极讨好溥儁，因此，慈禧太后便任命他做溥儁的老师。此外，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也都是紧跟慈禧太后的亲信。这一伙人为了争权夺利，甚至下令组织保甲团练，以便对付洋人。没想到，保甲团练没办起来，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却兴起了！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一种反清的秘密结社。嘉庆十三年（1808）以前就有过反清活动，曾被朝廷明令禁止。它用设厂练拳的形式组织群众斗争。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俄国把东北、英国把长江流域、德国把山东、日本把福建、法国把两广和云南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强夺矿权、路权，大搞土地掠夺和宗教侵略，加上清朝官绅的压迫、剥削，迫得农民、手工业者、运河苦力、市民小贩等各行各业的很多人活不下去，他们便纷纷加入义和团。义和团的活动，以山东为最激烈。原因是：甲午战后，日本和英国相继占了威海卫，德国占了胶州湾，德国修铁路、开矿山，任意强占民地、强拆民房，英国围圈文登、荣成二县土地，都使农民深受其害；外货的倾销，也使本省商业萧条；加上各国教堂（计一千多所）也圈占土地、干涉词讼、包容无赖欺压人民，各国主教位同督抚，可谒皇帝，大司铎准见司道官，其余司铎也准见府、县等官，官、教勾结，民不聊生。于是，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1896—1899），曹县、单县、巨野、寿

张、济宁、菏泽、成武、沂州、平原、肥城等地，便纷纷发生了“灭洋人、杀赃官”的斗争。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又取得男女老少一切人民的广泛支持[①]，因此，运动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山东巡抚张汝梅“剿”扑不力，慈禧太后换任毓贤。毓贤原是曹州知府，一年内就杀了“大刀会”（义和团的支派）员两千多人，到北京谒见，慈禧太后还亲赐过“福”字。毓贤升任后，大肆追捕、屠杀义和团成员。



义和团民

光绪二十五年（1899）10月9日，毓贤派兵进“剿”泗水人朱红灯[②]率至平原县岗子一带的一支义和团队伍，在森罗殿被打得落花流水。但不久，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居然用诱骗的办法，杀害了朱红灯。毓贤又对外国侵略者百依百顺。德国人强占民地修胶济路，老百姓拔去路桩，被德人枪杀20多名，他不但毫不过问，反而给德人赔款3 400多两；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杀，他不但杀了两名中国人、判了三人徒刑、一人关死狱中，而且赔款9 500两。毓贤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平度州、曹州、莒州等地的义和团群众奋起拆毁教堂、打击官军，莒州官兵们哀求饶命，烟台的传教士也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公使康格说毓贤是义和团主犯，

① 义和团“坛”下有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下设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哨队，战时十人一班（设班长）、十班一大队（设百长）。青年妇女编入“红灯照”，中年妇女编入“蓝灯照”，老年妇女编入“黑灯照”，寡妇则编入“青灯照”，等等。

② 也有书说是茌平人。

叫朝廷撤他的职。于是，12 月 26 日，慈禧太后又改派袁世凯前去镇压。袁世凯领了七千“新军”，又招募了两万人马，杀了不少的人，还是不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义和团成员们，编了歌谣说：“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又在抚署照墙上画了一个红顶花翎的大王八伏在洋人臀后的画来讽刺他，吓得他卧室外也安上密密层层的铁丝网。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山东的义和团进入直隶，由景州、故城分两路向京津进展。向北京的一路进展神速，很快地发展到北京附近的高碑店，5 月里，还在涞水的石亭粉碎了直隶总督裕禄派去的副将杨福同的进攻，杀了杨福同，攻下了涿州，打败了聂士成从天津派来的军队，进到了丰台，焚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龙车”。北京城里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传单），温泉山的石碑上也刻着“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成群”等文字，斥责朝廷和官吏的卖国行为，声言要“剪草”“除根”。6 月中旬，义和团进入北京，设坛八百多所，围守监视王宅、衙门，把守城门、路口。

义和团的浩大声势和战斗威力，迫使慈禧太后不得不暂时停止“剿杀”。6 月 6 日，她叫刚毅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实力，16、17 两天，又连续在中南海的仪銮殿召开御前会商量：是否利用义和团来防止外国人支持光绪皇帝。载漪为了使儿子溥儁早日登基，便叫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了一份各国的假照会，叫太后归政给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一见这份照会，立时勃然大怒道：与其拱手而亡，不如一战为好！立即派徐用仪通知各国公使“下旗归国”。18 日，再谕：各国使节，24 小时之内，必须出京。还宣布：杀一洋人者，赏银 50 两；杀一洋妇者，赏银 40 两；杀一洋孩者，赏银 30 两。董福祥的甘军里，有一人杀了一个洋人，她竟赏银 500 两！并说：“迫我归政，不得不以此报之！”载漪等也指使人杀了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20 日，刚毅从涿州返抵北京，说义和团是大可为用、“刀枪不入”的神兵。慈禧太后便宣谕和外国开战，叫义和团攻打各国

使馆，谕文中说：

> 慈圣中兴，宇宙恩惠所被，……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故）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然而，24日，慈禧太后就任命载勋、刚毅做义和团的总指挥，借以钳制义和团的行动。25日，又谕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老卖国贼李鸿章说：此次对义和团的支持，实因“剿抚两难”："剿之则祸起肘腋"，因此，“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29日，更电各国使馆：

> 此次中外开衅，……均非意计所及，……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

同日，给使馆送去蔬菜、水果等慰问品，以及呈递了王公大臣的名片，把义和团彻底出卖了！

义和团的群众，却仍在浴血奋战。他们攻打使馆56天，攻打西什库教堂63天。荣禄不许借炮，载勋等不准施放枪炮，他们便用火箭、药罐进攻。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法国主教樊国栋吓得“魂不附体”，躲在使馆中的强盗们一听到义和团战士的冲锋号角声，血液也“凝而不流”。教堂里的鬼子断了粮杀驴充饥，驴吃光了杀骡子吃；使馆里的鬼子派人去天津乞援，刚出永定门也被义和团众拿获。有个诗人叫胡思敬的，在《驴背集》中描绘他们的狼狈相道：“蜡书迢递阻滦河，日淅矛头夜枕戈。空散黄金募死士，一城鼠雀苦无多。”义和团众还曾一度攻入奥、法使馆，打死、打伤法、德、日兵117人！那些平日以屠杀中国人为快事的侵略者，这时尝到了中国人民的厉害！

6月10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领了两千“联军”，乘火车离

津赴京，没想到铁路早被义和团众拆毁。他们一边修路，一边前行。11 日，当他们正在落垡修路时，突然遭到了义和团众的袭击。他留下一部分侵略军守落垡，率一部到廊房，不料 14 日晨在廊房又遭袭击。18 日，义和团众和部分清军猛攻廊房，西摩尔只好连夜撤回天津去，23 日才撤到天津郊区的西沽，25 日复又龟缩到租界之中，前后损兵 1/3。

6 月 17 日，日、法、俄、美、英、德、意、奥等八国的联军猛攻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战死①。7 月 9 日，联军攻至天津城外的八里台。聂士成两腿中炮，仍持刀督战。不久，侵略军的枪炮，又洞穿了他的左、右腮，他的项侧和脑门也负了伤，脐下寸许中炮肠出，牺牲于八里桥。7 月 12 日，俄军 2 600 人、日军 2 400 人，伙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开始大肆攻打天津城，但未得手。13 日半夜，俄军又猛攻河东，14 日中午才跟法军一起攻到天津城下。当天早晨三点，英、日等国侵略军猛攻河西，死伤也很惨重。黎明时分，日军架桥偷渡炸开西南城门后，义和团众和清军东营士兵，又进行了 12 个小时的巷战，给了侵略军很大杀伤。等到侵略军攻下天津时，仅日、法、俄、美、英五国，即付出了 900 人伤、亡的代价。而且，直到 27 日，天津义和团众的抵抗才算结束。

天津陷落，慈禧太后忙求日、英、德三国公使“排难解纷”，还派人到使馆表示愿意“道歉、赔款、惩凶”。然而，8 月 2 日，侵略军四万，兵分两路（日、英、美沿运河左岸，俄、法、德、奥、意沿运河右岸）直向北京杀来。4 日、8 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士兵，在北仓、杨村又重创侵略者；8 月 14 日，俄军在东便门，日军在齐化门也遭到了义和团众和部分清军士兵的反击。同日下午 2 时，英军侵入广渠门；15 日夜里，日军攻占皇宫。“联军”在北京共伤亡四百多人。北京陷落后，义和团在太平庄、海淀、怀柔、西山、良乡、雄县等地，仍进行过英勇的反帝爱国斗争。

---

① 一说退回天津，天津失陷服毒自杀。

在义和团进入京、津前后，河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福建、广西、陕西、甘肃以及内蒙等地的人民，也纷纷揭竿而起，严惩了“洋人”和赃官。内蒙古西部的萨拉齐地方，人民捉了主教韩默理，在托克托进行了公审，给他背上插了“老洋魔”的旗子，叫他游街示众。辽宁人民把北至开原、南至海城的所有铁路、桥房全部拆毁，把盛京（沈阳）的洋教堂和俄国铁路公司也“拆毁殆尽”。吉林人民造了拦江大锁拦住了依兰附近的松花江，并袭击了俄船“齐必斯”号，当场击毙其船长维尼科夫。吉林、黑龙江人民，还将三千多俄军围困在哈尔滨，并击毙其 150 余名，一度攻入市区。江西一共捣毁教堂 39 处。……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给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无比沉重的打击。它虽然由于慈禧太后的叛卖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了，但却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法国有个议员也讲：“瓜分之说，不啻梦呓。”

## 五、“暂行巡幸太原”

### ——慈禧太后的逃跑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和义和团的英勇斗争相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则表现为屈膝投降、可耻叛卖。8 月 2 日，俄、日、德、法、英、美、意、奥八国联军四万余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攻，在北仓、杨村虽然遭到义和团民和部分清军的抗击，但团民、清军既无后援，又没有奉到朝旨。慈禧太后给李鸿章的命令，只是求联军

帮助“剿不乱民”、停战和谈。联军既已早知慈禧一伙的态度，当然也就不捞到更多的好处决不罢休，决定不拿下北京决不甘心。

8月6日，清军统帅裕禄逃进杨村一家棺材铺，怕不保险，终于用手枪自杀。8月12日，联军直抵通州。通州守军不战而溃，临溃前还大肆抄掠。慈禧太后当天八次召见荣禄、五次召见载漪，毫无办法；叫李鸿章再次求和，联军不许。13日，联军进抵北京郊区。俄军统帅奉告其他国家统帅说：清军主力必将决战，奉劝众军暂且休息。但是，当晚，俄军却独自潜行，于14日午占领了东便门。日军料定俄军必先走，也于14日进占朝阳门。而清朝的神机营、神虎营[①]，早在联军离北京30里时，已经争相逃走了，董福祥率领的甘军，临逃前更大肆抢劫。

15日晨3时，慈禧太后扮作乡间农妇，穿着蓝夏布衫、梳着汉式便髻，令光绪皇帝穿了蓝布衣裤，准备逃跑。光绪皇帝的珍妃请求留帝于京以镇人心，慈禧太后竟叫她自尽。李莲英的“儿”、太监崔玉贵，便将珍妃绑了手[②]，推入宁寿宫外的大井中，还推下三四块大石头，真是惨透凄绝了！慈禧太后一行，沿途“豆粥难求”，逃到傍晚才到贯市，3天之后达到怀来，又过了4天才逃到宣化府。为了掩饰自己逃跑的可耻，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表《罪己诏》说是“暂行巡幸太原”。过雁门关时，又命暂停车马，以赏观风景，对光绪皇帝说：“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颇乐也！”不久，逃到西安，更日夕观看演戏为乐。沿途，随行官兵，则一路抢掠。



光绪之珍妃

① 顽固派认为洋人为“鬼”，洋人为“羊”，“神”可伏鬼、“虎”则吃羊，故称“神虎营”。

② 一说将珍妃用毡毯裹了。

慈禧太后临逃之时，叫荣禄、徐桐、崇绮（同治皇帝的岳父）留京应付，荣禄和崇绮都不敢待，逃到保定以后，荣禄又逃奔山西、崇绮则因听说家属死在北京而自缢。徐桐儿子承煜被联军抓走，本人也已自缢。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下令公开抢劫3天（8月15至8月18日）。颐和园的珍宝古玩，联军用骆驼队运了几个月，强运到天津的租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抢剩的《永乐大典》700多册，这次又被联军抢走307册；联军还抢走其他珍本图书40 000多册！俄军还专门抢劫了中南海的仪銮殿，能搬动的宝物，他们全搬走，搬不动的则全部砸毁。一个俄国军官回国时，带走中国的宝物竟有十大箱之多。传教士们也乘机大发横财。有个法国主教叫樊国梁的，闯进慈禧太后的亲信、户部尚书立山（本人已被载漪杀掉）家，一次就抢走了价值一万两白银的财物。有个美国传教士叫丁韪良的，也在沙滩粮店抢得两万多斤粮食。

联军在北京，还到处杀人。法军把老百姓撵进死胡同，用机关枪扫射15分钟。至于大街之上，更是"尸骸枕藉"。他们只要见着一个情形稍有些可疑的，便指是义和团，也不问究竟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杀。



旅行传道的西方牧师

躲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连连电令老卖国贼李鸿章和奕劻加紧与帝国主义谈判投降，并电令：和谈"可成不可败"。12月24日，俄、日、德、法、英、美、意、奥、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十一国提出了一个苛刻无比的"议和大纲"，宣布"无可更改"。慈禧太后闻讯，又电令李、奕"应即照允"，后更主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7日，李鸿章、奕劻便代表清政府和上述十一

国签订了卖国、屈辱的《辛丑条约》(共十二款；正约之外，还有十九个附件)。主要规定：

一、赔款400 005 000万两，39年付清，加上每年摊还的利息，共计982 238 150万两(索款最多的是俄国，130 371 120两；其次是德国，9 000多万两。法国得了7 000多万两，英国得了5 000多万两，日本和美国各得了3 000多万两，意大利得了2 000多万两，比利时得了800多万两，奥地利得了400多万两，荷兰和西班牙也得了122万余两)。此外，各省还要赔款2 000万两以上。慈禧太后一伙，就是这样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慷慨地交给帝国主义吮吸的！以至于贪得无厌的沙俄外交官拉姆斯道夫也得意忘形地说："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贫穷的中国，从此更加贫穷了！

二、削平大沽及京、沽间一切炮台；天津城外20里以内，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和驻扎；北京和山海关之间12处要地(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和山海关)，外国派兵驻扎。至此，中国被置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监督之下。

三、北京设立特殊的使馆区，占地120亩，华人不准居住在内；各国使馆可以自设军队(多至400名，少则100名)。

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任何反帝爱国团体和从事任何反帝爱国活动；惩办"赞助"义和团的官吏；惩治和禁止各地反帝社团；停止山西(22城)、直隶(12城)、东北(6城)、河南(2城)、湖南(1城)、陕西(1城)和浙江(1城)共45城的文、武官科考；禁止中国从外国购进军火两年；废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为外务部，班列于户、吏等六部之上。

《辛丑条约》不仅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军事上监视中国，而且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把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俄国得到了比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多

得多的非法利益。它不仅派出军队参加联军侵略、屠杀于京、津一带，而且单独出兵东北，霸占了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将这一地区的6 000多名中国人，屠杀得仅存200余人，随后又侵占了整个东北地区，屠杀了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光绪二十六年（1900）11月11日，俄国侵略军用刺刀胁迫清朝的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无理地规定俄国在奉天（沈阳）设置“总管”，监督清朝管理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俄国政府还在彼得堡暗中炮制了一个所谓“俄国监理满洲”的《原则》，妄图叫中国放弃东北的军权，以便侵吞中国这块辽阔的领土！只是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清朝政府宣布增祺“革职”，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又拒不签字，俄国的阴谋才没能实现。

《辛丑条约》签订后的29天，慈禧太后带着3 000辆车，离开西安，回銮北京。沿途大修行宫（仅洛阳一处，即花修缮费3万两）、大修跸路（沿路民房，统统拆除；百姓走近此路，还要罚以巨款），一路所花行李费更达1 000多万两！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902年1月7日），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初回乍返，她还能泣涕引咎，没过多久，又渐奢恣复旧，大修颐和园，穷极富丽、日费巨金，歌舞无休日。和此前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对洋人变得更加驯顺：她不仅撤帘召见各国公使、慰问公使夫人，而且花了500多万两的巨款，在仪鸾殿的旧址，建筑起“海晏堂”（西式），备做西餐，动辄卑礼盛筵，活像一条摇尾乞怜的走狗。

# 第三章　清朝的苟延残喘和灭亡

## 一、“慈禧新政”

——清朝的进一步买办化、独裁化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 年 1 月），逃居西安的慈禧太后，一面电示李鸿章、奕劻、荣禄加紧卖国求和，一面又宣布“变法”以掩人耳目。她要求各官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等方面，“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已见”，在两个月之内“条奏以闻”。从此，慈禧太后这个老顽固，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这些骗人的“新政”，归纳起来，不外三个方面：

第一是禁、废方面：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布，从明年起，废除八股和武举考试，乡试只考策论，设立经济特科；光绪二十八年（1902），诏除满、汉通婚之禁，三十三年（1907），谕除满、汉之见。光绪二十八年（1902），谕妇女“放脚”，禁妇女缠足。三十二年（1906），谕禁烟（鸦片烟），三十四年（1908），命恭亲王溥伟等为禁烟大臣。八股与小脚，康熙初年已被废禁[①]，不过未几而罢，后来，就连旗人也有缠足的了。嘉庆九年（1804），镶黄旗选了 19 个秀女入宫，竟没有一个不是小脚！嘉庆皇帝很生气，

---

① 康熙二年（1663）停八股取士，八年（1669）恢复。禁缠小脚是在康熙元年（1662）到三年（1664）间。

严禁旗人缠足，但汉族妇女仍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小脚徧（遍）邑，眼泪四溢。”慈禧太后的废八股和谕放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还算有点进步意义。至于禁烟，则限期十年，同时宣布：不能戒的只要陈明了原因，就和五六十岁以上的病者一样，从宽免罪。还和英国议定：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英国每年才减运一成鸦片，十年后才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因此，禁烟之令，仍是形同虚文。

第二是经济、文化方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学部”（把国子监也并入部内），监管各大学堂。不过，学部大员，办学方针不过只是“崇洋”二字。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辞了教士丁韪良的职，叫桐城派的古文家吴汝纶为总教习，吴汝纶一上任，就耗费巨资出国“考察”。至于下面的北洋大学（由买办盛宣怀办的“天津学堂”改名）、南洋大学（由上海“南洋公学”改成）和山西太原大学，则分别由美国传教士坦来、福开森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做校长！学部的另一任务，是大量派遣留学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日学生，竟增至8 000余人，学习期限最多不过三年，一般是三个月或六个月，不少是两年半。如此短暂的时间，实际上不过是镀镀金而已。就连当时的驻日公使杨枢，也不得不万分感慨地承认：“此两年半内，仅习日本语文，犹虑不足，其他学科往往有名无实。”



1872年官派第一批留学的幼童

经济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将原工部并入），并订立“奖励工商章程”，规定办1 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男爵，办2 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子爵，得利者当然是拥有巨

资的官僚买办。但即使是官僚买办，也并不能畅所欲为，因为帝国主义早已侵占了中国的工商大权。唐廷枢等官僚倡办的开平煤矿，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时，已被俄国人占据，不久，英国人又花了100万英镑从俄国人手中买去。天津的官僚、买办、商人后来想办滦州矿，无奈资本少，于是，只得跟英人合办开滦矿务公司。而英、美、日等国，则根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清朝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取得了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沈阳、大东沟等地作为通商口岸，有在这些口岸办厂、收税的特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三十一年（1905）间，英、法还取得了云南七府的矿权，英国取得了安徽铜官山的矿权，法国取得了四川巴、万和福建建宁等三府的矿权；美国和比利时在上海设立了花旗银行、华比银行；俄国修筑了郑太路、英国修筑了沪宁路、比利时修筑了汴洛路。中国的财权、矿权、路权，已经被外国控制住了。慈禧的“新政”，只不过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捡食一点残渣而已！

第三是政治方面：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慈禧太后在西安设立督办政务处，宣布进行法律、兵制和官制方面的改革。

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太后诏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沈曾做过按察使，熟悉旧律；伍则曾留学英国、当过律师，熟悉西律。但是，他俩率领一班人马，搞了三年，只建议废除凌迟、枭首、戮尸三种酷刑，而仍以斩首为极刑！以后的民事、刑事诉讼法，竟多用日人为顾问编纂；东三省、直隶、江苏设立审判厅，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的事。

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下诏成立练兵处，命奕劻为管理大臣，要在全国练新兵。规定分全国为36镇，镇有步队两协（后改旅）、马队炮队各一标（后改团）、工程辎重队各一营、军乐队一队，协有步兵二标，标分三营，营分四队，队有三排，排有三棚，每棚十四人，一镇合计万余人。又规定：新兵练成之后，旧有营兵，改为警察和巡防队（统率的将领仍称提督）。慈禧太后又诏

令地方成立督练公所。她的目的是为了收缴各省的兵权，并收敛各省的财政，没想到全国的练兵收效甚微，袁世凯却乘机练得六镇的兵，实力扩充了将近十倍，李鸿章死后袁又参与了政务处，荣禄死后，袁更升任为直隶总督兼督办商务大臣，成了最大的实力派，连奕劻也不得不一切听从他的摆布了。

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改革所谓的官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命政务处筹办"立宪大纲"，旋设"考察政治馆"粉饰观听，并派五大臣[①]出国考察。三十二年（1906）8月，宣布预备立宪，只决定改革先从官制入手，谕道：

> "……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必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尊崇秩序，保守和平。……"

于是，在镇国公载泽、庆亲王奕劻的合伙炮制下，在十月里颁布了一套"官制"：内阁、军机处、吏部、学部原封不动；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改户部为度支部（财政处、税务处并入），改刑部为法部，改兵部为陆军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改理藩院为理藩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另设邮传部，还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除外务部外，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尚书还是满人居多[②]。第二年，又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三省又各设巡抚取代原有将军。

---

① 五大臣原为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因临行被吴樾扔炸弹所炸而未成行，后改为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和李盛铎。

② 外务部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禨（不久被奕劻挤走）；度支部尚书溥颋，礼部尚书溥良，陆军部尚书铁良，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学部尚书荣庆、理藩院尚书寿耆（满人七名）。法部尚书戴鸿慈，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吏部尚书鹿传霖（除瞿鸿禨外，汉人才四名）。

衙门名称改了一些，旧有的"秩序"仍被"尊崇"着。慈禧太后宣布"变法"之后，四川总督奎俊就说"新政"不过是"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而已，奎俊还算有点见识，知道这"新政"并不会触动慈禧太后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事实上，"变法"后的整个官僚体系，也丝毫没有什么进步可言。李鸿章、荣禄、刘坤一死了，载漪、载勋、赵舒翘、毓贤及皇太子溥儁，早因联军的命令革职或废掉、圈禁或充军了，徐桐等被迫自杀了，刚毅也因联军"请求"正法而吓得呕血死了。但是，慈禧太后的手下，还有奕劻、袁世凯、端方等人控制着实权。奕劻由外务部总理大臣兼任了军机大臣，女儿在宫中侍候着慈禧太后，儿子载振又身居要职。他们替慈禧太后维持着大权，慈禧太后也为他们清除着一个又一个的反对派。有个御史叫蒋式瑆的，弹劾奕劻有120万两的巨款，从日、俄银行转存于英国汇丰银行；还有个御史赵启霖，上告奕劻之子载振受了道员段芝贵的贿（接受了段花12 000两银子买赠的歌妓杨翠喜等），结果，上告的二人通通遭到落职的处分。御史陆宝忠气不公，奏言：一有弹劾，即遭处分，将"使赣直者寒心，庸懦者结舌"。奕劻便诬蔑他有烟瘾而开了他的"缺"。慈禧太后逃跑时，拥兵接驾的岑春煊，颇得太后的垂青，由布政使升任总督、邮传部长，但因不服奕劻，被奕劻、袁世凯挤出朝廷，去广东当总督，岑依赖太后的宠信，不去广东，而在上海养"病"，奕劻的死党、两江总督端方便伪造了岑与梁启超的合影，慈禧太后一见大怒，也将他开缺而去！在慈禧太后看来，不管什么人，只要一触犯她的利益，都要撤职罢官，"新政"不过如此！

光绪三十四年（1908）9月，慈禧太后一伙颁布了"宪法大纲"。这"大纲"更规定：清朝皇帝统治中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清朝皇帝，永远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钦定法律（否则不得见诸施行），设官制禄及黜陟百

司，统率军队，综理外交，宣布戒严，掌握财政、爵赏以及恩赦，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等。慈禧太后就这样地挂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之类的羊头，来贩卖其绝对独裁的狗肉。清朝的政治，已经走上了不可挽救的绝路！

## 二、“恢复中华”

——孙中山等的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11月15日，38岁的光绪皇帝死在瀛台的涵元殿。光绪皇帝死前的两天，慈禧太后召集奕劻、载沣、袁世凯、张之洞等议选嗣君。奕劻、袁世凯请立溥伦或奕䜣的孙子溥伟，慈禧太后说立载沣之子溥仪。袁世凯说溥伦年长当立，慈禧太后怒斥之后，即命拟旨宣溥仪入宫。溥仪时年三岁，自然慈禧太后便于下达懿旨，不料光绪皇帝死后的第二天，即16日，这个“老佛爷”也一命归了天。[①] 于是，载沣奉诏摄政，以明年为“宣统”元年。



两岁的溥仪在醇亲王府

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时年27岁，十五六岁时只作宫廷侍卫扈役，又生长于贵族环境之中，本无所谓才华、经验可谈，但是，20岁那年（1901）做专使到德国“谢罪”（因德国公使被杀）时，德皇威廉·亨利曾对他说：德国皇权之所以巩固，是因为皇帝首先揽有兵权。载沣又是荣禄

① 关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说法不一：有人说太后先死，秘不发丧，袁世凯、李莲英、奕劻合谋害死光绪帝；有人说袁见太后病危，叫李毒死光绪帝；也有人说太后自知不起，迫帝服毒。

的女婿，所以很懂得兵权的重要。于是，首先想将掌有兵权的袁世凯正法，无奈张之洞说不可，只好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1909年1月2日）叫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随后，另编了禁卫军亲自统领，并代理全国陆、海军的大元帅。他又叫一个弟弟（载洵）为海军部大臣，另一个弟弟（载涛）为军谘大臣（总参谋长）。其余朝政大权，也完全落在皇亲国戚手中。

载沣的所做所为，就在朝廷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宣统二年（1910），御史江春霖、赵炳麟和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纷纷弹劾奕劻父子，被斥为"莠言乱政"、"信口雌黄"，罢了官。宣统元年（1909），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古、黑16省，每省代表三人，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三次请愿，朝廷勉强成立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但宣统三年（1911）4月，载沣颁布的内阁中，汉臣只有四个，皇族大臣竟占六员，被官员称之为"贵族内阁"。



载沣像

载沣一伙，为了粉饰"新政"，处处要钱，人人以敛殖私财为事，大借外债，大卖主权。宣统三年（1911）的春夏之际，外债竟骤增至二万万元之多，租税、捐纳层出，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更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清斗争，就更加汹涌澎湃起来。

孙中山（1866—1925）[①]，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人。父亲达成务农，还学过裁缝、当过鞋匠。家境不裕，迫得中山的哥

① 孙中山，原名孙文，号日新，幼名德明，字帝象，又字载之，在香港学医时改号逸仙，光绪二十四年（1898）避居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称之。

哥孙眉到檀香山去垦荒。孙中山本人，十二三岁也只得到哥哥那里去念书。在檀香山，他的见识广阔了，加之，幼时耳闻过太平天国的故事、目睹过帝国主义的压迫，渐渐立下了改造中国的大志。19 岁时，孙中山到香港求学，中法战争暴露出的清朝腐朽卖国情况，使他开始定下了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决心。不过，他仍寄一线希望于朝臣。光绪十九年（1894），29 岁的他，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回到翠亨村，写了一份《上李鸿章书》，到上海拿了王韬的信去天津，想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见李，劝李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想到李鸿章根本不接见他。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于是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宣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甲午战后，孙中山到香港，在士丹利街十三号建立了兴中会总部，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战斗口号，并于10月（1895）举行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去日本、英国、美国，进一步联络海外志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10 月 11 日，在伦



1896 年易服断发、
投身革命的孙中山



1905 年剪去辫子的华兴华会成员在日本合影
前排左一黄兴，左三胡瑛，
左四宋教仁，后排右一刘揆一

敦，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派人绑架并囚禁了他，还租了船、钉了木箱（笼）阴谋将他押运回国领赏，孙中山靠了使馆清洁工人、英人柯尔的送信，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得知，多方搭救，才使他脱险。历难后的孙中山，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奔走于德、法、比（利时）、美、加（拿大）等国，光绪二十三年（1897）东达日本。第二年底，粉碎了清朝驻日公使李盛铎的劝降阴谋，光绪二十六年（1900）7月，发动和领导了惠州起义。

孙中山的斗争并不孤立，他的活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903—1905）间，国内外的革命团体、革命报刊，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出来。1903年，国内外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立宪理论也受到了广大国人的抨击。章炳麟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然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18岁的邹容在《革命军》这本小册子中也大声疾呼"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还有个28岁的湖南新化人陈天华，在他的《警世钟》、《猛回头》的书中，不仅高喊出推翻清朝的口号，而且满怀信心地描绘出革命后的美好景象：


邹容像

>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生。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光绪三十年（1904），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在江、浙一带组织了光复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湖南组织了华兴会；

后来，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湖北组织了科学补习所[1]。光复会的口号是“黄河溯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华兴会更计划在十月发动长沙起义。



蔡元培像

光绪三十一年（1905）8月20日，在廖仲恺夫妇、吴玉章等同志的推动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的协助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组成了！它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十月里《民报》的创刊号上，孙中山先生更将它发挥为三民主义：推翻清朝，并不排斥满人——民族；打倒君主政体，建立民主政体——民权；解决社会（土地）问题——民生。

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康、梁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已经没有读者而被迫停刊；而全国人民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已达二百余次了！由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影响较大的，有萍乡、浏阳、醴陵，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廉州，镇南关，云南河口，广州（新军）等起义。1907年7月，秋瑾与徐锡麟密谋在浙、皖起义，事败牺牲。秋瑾被捕后坚贞不屈，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7月15日凌晨，这个年仅32岁的女同盟会员，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秋瑾不但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巾帼英雄，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女诗人。12月的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亲自率领群众，与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人相持了七天七夜！

宣统二年（1910），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集会议，决定由黄兴到广州、谭人凤到武汉准备再次起义。会后，又在香港设立

---

① 1904年底长沙起义失败后，被查封。1905年冬，刘静庵等为了唤起革命，在武昌，利用美国基督教武昌圣公会所设的阅报室陈列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党人，尤其注重在新军和青年学生中活动，成为“群治学社”（后改名为“文学社”），也是“日知会”的前身。

了统筹部（由黄兴负总责），下分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随后，黄兴又在广州建立了30多个机关，决定于宣统三年（1911）4月14日，由选锋队（敢死队）八百人（原定五百人）分十路进攻督署、水师行台、督练公所、旗界、警署等，尚有四队（每队五十人）分攻他处。不料清朝的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已有知晓，戒严、封锁。不给新军（已受革命党影响）军械，几经犹豫，黄兴才于27日下午五时半仓促发动，只有四路响应。黄兴率领百人直扑督署，张鸣岐凿墙而逃至水师行台，黄率部进攻他所，到双门底，遇上温带雄率领前来响应的防营军数百。起义军相约：戴白臂章。而温部只想先赴水师行台提张、李，之后再戴臂章。黄部不知，误以为敌，方声洞举枪击毙温，两部互相射击，黄兴伤折三指，敌人得以无恙，而起义宣告失败，同志牺牲颇多（黄花岗72烈士只是其中的主要骨干），黄兴化装逃往香港。


黄兴像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了，但它恰如孙中山所说："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恰好，4月11日，清朝又宣布铁路"国有"，22日，大买办、邮传部长盛宣怀更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出卖川汉、粤汉路权的借款合同，原来投股经营的商民于是沸腾起来，川、粤、湘、鄂商、民，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请愿、抗议。四川代表刘声元跑到北京求见载沣，不准入门，跪在地安门拦舆，又被抓进步军统领衙门，释放后想见奕劻，被解回原籍。京中商、民大哗，四川商、民也于7月1日罢市。朝廷命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率兵镇压，端方带走了湖北最受革命党人影响的大部新军开赴四川"格杀勿论"，这就不仅给革命人民的革命情绪火上加了油，而且，也给湖北的革命党人造成了革命的可乘之机，一场最后推翻清

朝的大起义终于爆发开来！

## 三、武昌起义

在浩瀚奔腾的长江中游，坐落着武汉三镇。

宣统三年八月十八日（1911 年 10 月 9 日）下午，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三十三号的屋里，共进会、文学社[①]的负责人孙武，正为武装起义赶制炸弹。刘敦重走进屋来，吸起香烟，火星掉进配药面盆，炸药爆炸，孙武面部受伤，屋内硝烟滚滚。俄国领事、巡捕闻讯赶来，搜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印、九星旗、告示、函件和起义骨干名册，又将前来办事的数人捕了，连夜交洋务局转送江汉关道，旋送设在武昌城的清朝湖北总督衙署。

总督瑞澂，早就听说革命党人要起事，饬统制张彪等严加防范。这天下午三时，张彪就派人在小朝街和十五协西营门外抓了 20 多人，连杂货店老板杨玉山也没放过。现在，俄国领士又送来这些人证、物证，瑞、张等就更凶相毕露了。

10 月 10 日天一亮，瑞澂便下令将彭楚藩等三人，推出制台衙门“斩首”，其余被捕者一律收监严讯。他还下令关了武昌城门，按所获名册逐个逮捕革命党人。

形势十分危急。革命党人只好约定再不拖延，当夜坚决起义，攻打总督衙门，推翻清朝专制政府。

总督衙门在城西南角，与配有机枪六挺的八镇司令部只隔一条马路，周围还有旗兵三营、巡防数营、教导队（宪兵）一营拱卫。革命党人只在新军中有大影响，但新军不是调到四川镇压起义，就是派到外地和城外驻防，在关了城门的武昌城中，新军很少，且无弹药。为了防止新军得到弹药，瑞澂等早就加强了对设在城东南角

① 共进会、文学社实为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共进会成立于 1906 年；文学社成立于 1908 年，初名群治学社，后改名振武学社，1911 年改名文学社。共进会、文学社都为推翻清朝而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势力。

楚王台的军械所的看守。

夜幕降临了，当夜在军械所值班的，是工程营左队队长吴兆麟。吴兆麟是日知会[1]的干事，他手下的士兵，晚七时开始擦枪装弹。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是个反动家伙，见此情景，喝令“左右与我绑之”，话音来了，被击身亡，八镇八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听得动静，立率40余人奋起，正式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者和守军战士们一起，涌入军械所，打死了反动军官阮荣发，抢走了所有子弹，选吴兆麟为总指挥，汇聚到楚王台西南的凹地中，派同志四处联络发动、割断敌人电话线、催促城外炮队响应。

驻扎在武胜门外的21混成协的工程队、辎重队，也行动起来、拖炮入城了。他们击退了追兵，由中和门直入楚王台。这时，新军中其他一些有志者也纷纷赶到，吴兆麟在群情激昂中讲话：

> 今晚首义，虽属瑞澂激战，实为清罪贯盈……自此以后，即与满清势不两立。……同志今日，与武王伐纣同。……我辈只求成功，不要权利。……

同时宣布了各项革命纪律，下令炮击督署。起义军的炮弹，划破夜空，尖锐地呼啸着，从中和门城楼飞向督署一带。

总督瑞澂，被大炮吓得心惊胆落、不能自主。他身边有个统领叫陈得龙的，安慰他道：“卑职保护大帅。”他却说道：“炮弹厉害得很，假使落一颗下来，可不得了！”不一会儿，一颗炮弹果然落到衙署，瑞问：“往哪里避?”陈答：“往城外船上去。”就这样，二人急忙动身，不敢走前门，只从后围墙穿了个洞，钻了出去，由文昌门往外，躲进了楚豫兵船，随后又躲到德国租界去了。

统制张彪，也不比瑞澂强多少。他命令司令部反抗，没想到机

---

① 1906年2月在武昌建立，也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之一，积极反清，鼓吹革命，会员以军界最多。

枪全成了哑巴（零件早被革命党人林楚翘卸走），他只好跟马弁和四姨夫人躲在文昌门公馆里，连自己司令部来见他的职员也不敢接见。

夜12时，天下起了小雨，四周更是漆黑一团。起义军战士从王府口摸到督署后侧，浇了几桶煤油，给炮兵点起了示意的火光，楚王台和蛇山的大炮，就将大批炮弹准确地倾泻到督署中。

11日天将晓时，起义军占领了督署。张彪见大势已去，打发了家眷之后，领着残兵逃出了城。

起义军奋战一宿又一晨，终于拿下了武昌城。城墙上，遍插了白布做成的旗帜，有的大旗上，还写着“兴汉灭满（指清朝政府）”的大字。

晨九时，各营都到楚王台下听编。大家公推吴兆麟为首领，吴兆麟为了扩大号召力，还是一心争取黎元洪来挂帅。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卒业，甲午战后受张之洞器重，为清朝服务于广东、湖北，训练过新军，访问过日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委任为21混成协统领，并兼管马、炮、工程、辎重各队事。宣统二年（1910），曾镇压过江陵饥民暴动，撤过倾向革命的队官潘康时的职，开除过大批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爆发之夜，他曾下令追击起义炮兵、亲自坐镇41标3营，亲手砍杀了吴兆麟派来劝他支持起义的人。只在蛇山上也响起炮声的时候，他才逃到黄土陂的刘文吉家，向刘文吉交代了家产后事。吴兆麟之所以要争取这样一个人，不光是因为他们曾是参谋学堂的校友，主要是因黎地位较高，是块有用的招牌。


黎元洪

起义军去找黎，黎刚好派挑伕挑了三个皮箱要逃。起义军把他

接到楚王台，吴兆麟下令全体官兵向他举枪致敬。但是，这个早就换上了灰呢长袍、外套黑呢马褂的协统军官，却劝吴道："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请你快叫大众各回各营。"在场的起义军官马荣一听大怒，拔刀要砍黎，吴喝止，又劝黎："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黎还是默不作答。

下午1时40分，吴兆麟召集各界代表到谘议局开会，极力荐举黎元洪为起义军统领兼湖北都督。黎再三要求回家一趟。有个叫李翊东的起义军官，把黎训斥了一顿，而大家也决议：以谘议局为军政府，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下设参谋部、军务部、政务部、外交部，并设招贤馆，正式举起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的大旗。

12日晚，军政府电请孙中山早日回国，电催黄兴、宋教仁速来湖北。

13日，军政府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发了《布告全国电》、《致满清政府电》以及宣布"满洲"罪状的檄文，号召"颠覆恶劣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布告全国电》称：

> 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清政府）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与政权"、曰"格杀勿论"。……是深望于18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同日，起义军炮兵击退了楚豫等清舰的反扑。

14日，清政府派来镇压起义的河南新军也表示"赞成革命"。而黎元洪，待在谘议局前楼东端的房里，竟绝食抗议两天了。黎的表现，激起了革命同志的义愤，陈磊、甘绩熙二人带着手枪对他讲："现在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满清，你就该早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黎元洪这才表示："我

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去辫子，我早就赞成……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割去就是。”不久，他也喊起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口号来。

至于清朝朝廷，11日以前还下诏嘉奖瑞澂“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命就擒获之人严鞫，并缉逃亡”哩，11日忽闻武昌失守，要员们才齐集庆亲王奕劻府中商讨对策，除了派陆军、水师前去镇压之外，还宣布京中各王府加岗守卫、禁止夜间演戏，连旅店娼寮也要严加盘查。15日起，大臣王公们更纷纷挤入“大清银行”提取所存现银，转存入外国银行了。有个亲贵更买了20万元的金块准备逃亡。市面扰乱了，米价也涨到11两一石了。到16、17日，“大清银行”竟被兑出现洋十万、现银90余万两之多。朝臣们对清政府失去信心，已达到了这种程度！

清朝后期的腐朽统治，给全国布满了干柴。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马上燃成了推翻清朝的燎原之势。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之间，湖南、陕西、江西、山西、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等省，都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

清朝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行将寿终正寝了！

## 四、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和清帝的逊位

武昌事起，国内外反动派马上便想起大刽子手袁世凯来。英国公使朱尔典多次拜访奕劻，叫他重新起用袁世凯。

10月14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奕劻还派人拿了自己的亲笔信去请他出山。

袁世凯一月里以“足疾”被免职后，虽然曾穿了蓑衣、戴了斗笠，持篙立于船尾，叫人给拍照，并将照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表示自己不再过问政治，但他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耳目四置，观听动静，又频繁交结，暗示自己并不甘于寂

寰。他还写诗道：

昨夜听风雨，披蓑踏翠苔。
人来花已谢，借问为谁开？
楼小岂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底！

从这两首诗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志并不在小。

如今，刚满52岁三天[①]的他，见奕劻一伙只叫他作为湖广总督前去武汉，他当然不干。他于是诡称自己“足疾”未好，又“头眩心悸”、“痰喘作烧”，请求缓行。直到27日，朝廷因警报迭至，只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兵马，并于30日下了“罪己诏”，承认以前“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发誓愿意“实行宪政”之后，他才于30日动身南下。



袁世凯

11月1日，袁世凯拿下汉口。原想带着溥仪逃往承德的隆裕太后，立即批准奕劻等“贵族内阁”的辞呈，诏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认为时机已到，13日回到北京，16日就公布了由自己的党羽、老朋友组成的新内阁的名单，罢了载涛军谘大臣之职，夺了载沣禁卫军权，把溥仪、隆裕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11月16日，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23人在上海开会，决议民国定都武汉，以黎元洪为大元帅。27日，又在汉口租界开会，颁

① 10月11日，袁世凯满52周岁。

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三章（21 条），规定大总统有统率军队、决定外交、任命部长之权。12 月 2 日，革命军彻底击败南京江防营统制、顽固派张勋，张率残部渡江退至浦口，革命军占领南京，临时政府也决定迁都南京。

袁世凯深知武力难于镇压革命，清朝又不得人心，于是便一方面恫吓清朝，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要挟欺骗革命党，从和谈中捞取个人好处，攫取革命果实。

组阁之前，袁世凯即派道员刘承恩去劝黎元洪罢兵，黎不许；组阁之后，袁世凯又派刘承恩与张春霆去俄租界，求俄国驻汉口领事敖康夫当“中间人”，劝黎罢兵，又遭黎的拒绝；11 月 26 日，袁世凯又跟英使朱尔典策划，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促黎和谈。27 日，冯国璋攻下汉阳，袁世凯于 30 日电令停止攻击，调冯返京，留段祺瑞督军，派其子袁克定监督，还是想法和谈。12 月 2 日，革命军攻占南京，袁世凯通过隆裕太后逼迫摄政王载沣辞职，完全将大权抓在自己手中。他又把汪精卫从监狱里放出来[①]，叫儿子袁克定跟他结为兄弟，派他南归促使和谈。

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瓦解革命，稳定地继续侵略中国，在朱尔典劝朝廷和谈之后，日、美、德、俄、法等国公使，也深表赞成。袁世凯于是乘机密奏道：如不和谈，“万一挫败，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隆裕太后在外人和袁世凯的劝说和恫吓下，终于 12 月 8 日同意派唐绍仪作为代表，去上海和革命党的代表伍廷芳谈判了。唐绍仪是广东香山（中山）县唐家湾人，父亲巨川是上海茶叶出口商，叔叔廷枢曾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本人曾留美。甲午战前就跟袁世凯是老搭档，袁世凯从朝鲜逃回时即指派他代替自己的职务，后来又跟着袁世凯到山东一块儿镇压过义和团。12 月 18 日，这位内阁全权

---

① 宣统元年（1909），汪精卫对起义失去信心，到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曾判为“永远监禁”。

代表一到上海，就放出口风说："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同时，一面向朝廷报告：革命军势力很大，倘若开战，北军万难取胜；各国公使都希望和平解决；伍廷芳力言必须实行共和，请朝廷早定大计。唐绍仪代表袁世凯进行的危辞哀诉和恫吓，使个隆裕太后抱了溥仪直哭。只是在唐的属员许鼎霖说革命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易于击破，因而，揭发了唐的恐吓手法之后，亲贵们再次请战之时，袁世凯才被迫撤了唐的代表资格。

不过，袁世凯又对亲贵和太后说：要粗定局势，需要 1 200 万两银子。当时，朝廷每年亏空 5 400 万两，哪得来这 1 200 万两？袁世凯于是胁迫亲贵们交出自己的存款底簿，隆裕太后也只得献出内帑黄金 8 万两。但是，敲诈得到巨款的袁世凯却并不下令打仗，而是通过作为自己私人代表的唐绍仪和活跃在革命党中的汪精卫等，继续为自己争取利益。12 月 29 日，由美国经法国返回祖国的孙中山被公举为临时政府的大总统，1912 年 1 月 1 日（宣统三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宣誓要"扫尽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成国民之志愿"，并提名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等九部部长，宣告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汪精卫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在汪和其他一些人的围攻下，只好不仅同意与袁议和，而且于 2 月 16 日表示：只要清帝逊位，宣布共和，他本人即可以正式辞去总统，让给袁氏。

袁世凯见自己夺权已有把握，就一面公开说进攻实有困难，一面密奏隆裕太后：此次开战，"东西友邦，贸易损失已经不小"，"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列强）干涉"，因此，清帝应该"禅让"以顺民心。隆裕太后乃于 1 月 16 日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溥伦、奕劻主让，溥伟、载沣反对，而宗社党头子良弼则密劝训练皇室亲军发动暴动倒袁。恰好当天，袁世凯在王府井丁字街三义茶店楼下的街上，遭到了北方共和党人杨禹昌等人的炸弹袭击，卫队长袁金镖等十多人当场炸死，袁世凯从覆车中爬出乘马逃脱，从此称

病不露面。但为防备良弼，他却密召亲兵入卫，待机而动。

有个四川籍的同盟会员叫彭家珍的，对顽固派良弼恨之入骨，决心刺杀他。1 月 26 日，彭穿了整齐的军服、佩戴了漂亮的腰刀，冒充良弼的好友——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乘了马车到西城红罗厂良弼的寓所去谒见。良弼不在家，彭到夜间才返回。不意在归途中碰上了良弼的马车。彭高喊“赉臣（良弼的号）”，调转马车就跟了回来。良弼到了家门口，下车就上台阶要往里走，彭匆匆下车投出炸弹，炸断了良弼的左腿，彭也伤了头部当即牺牲。第三天早晨，良弼才苏醒，但中午就死了。良弼身为皇族，又留学过日本，学过军事，组织了宗社党，在皇室中算是少壮派，



彭家珍像

现在，他死了，皇室要员更是没了灵魂。而袁世凯的部下段祺瑞，又联合了 28 员战将，从湖北打来电报，请改共和，并请让袁世凯作为全权代表和南方对话。隆裕太后只得在 2 月 1 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2 月 4 日诏袁世凯与革命党商磋（实际上早已商好）条件。

彭家珍刺杀良弼，加速了清朝皇帝的逊位。袁世凯为了达到自己独揽大权的目的，草拟了优待皇帝、皇族的条件；革命党为了废除君主专制，也同意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的精神是：皇帝尊号不废，待以国君之礼，每年供其新币 400 万元费用，暂住宫中，以后迁居颐和园，宗庙陵寝及其私产，派兵保护；皇族世爵依旧，私产保护，免予当兵，享有一般公民权；满、蒙、回、藏王公的世爵与宗教信仰依旧，满、蒙、回、藏各族与汉族平等。隆裕太后将下旨，又一次召集御前会，并叫宣统



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像

皇帝溥仪降御座以感谢“袁大臣”的优待皇室、皇族的努力，袁世凯竟又装成一副忠臣义士的样子，“惶恐顿首辞谢，伏地泣不能仰视”了！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12年即民国元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皇帝，正式公布“逊位”诏书，诏书中说：

> “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外观大势，内省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

民军的起事（武昌起义）和全国的响应，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斗争，终于埋葬了统治全国267年的清朝，并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不久，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利益的总代表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依然继续其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迫使人民又从事着新的斗争。

# 第四章　清朝衰亡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 一、封禁政策的破产和边疆地区的开发

同治以前，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秩序、照顾某些贵族（如满、蒙贵族）的特权、独占某些地区（如东北地区）的特产、保持内地田赋的稳定，对一些边疆地区（如东北、蒙古等地区），一直实行着严格的封禁政策，不许内地的汉族流民长期定居边疆。出入关、塞，必须先到衙门领取有数的满文或汉文“印票”，或到指定的关卡记档查验、缴纳票税，才予放行；“边墙”（如柳条边）不得逾越，设有封堆（仅吉林伯都讷围场，就有封堆410个）、台卡的山、河、围场（全东北就有围场105个）的地方不准私垦。因此，同治以前，虽然一些汉族流民也有偷偷定居塞外、关东的，但是，数量还不算多，而且不得不提心吊胆，担心被驱赶回乡。

然而，鸦片战争以前，全国人口已达四亿以上，比雍正时竟增加了十几倍[①]；内地人口越来越稠密[②]，而土地却并没增加，加上贫富分化更趋严重，灾荒连绵（以山西为例，光绪四年——1878年，即饿死500万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饿死100余万人!），因此，人民不得不大规模地背井离乡，奔向人烟较少的禁区。朝廷方面，由于人民连绵不断地起义，打得朝廷手忙脚乱，加之财政困

---

① 雍正八年（1730）2 548万余人，道光三十年（1850）41 440多万人。

② 山东每平方英里（1 609.31496平方公尺）614人，浙江每平方英里657人、江苏每平方英里竟达896人。

难日甚一日，所以也不得不松弛禁锢并企图通过放荒增加田赋收入；而到了光绪后期，强邻压境、边患日烈，也就不得不撤销禁令，“移民实边”。这样，清初以来的封禁政策，就逐渐被人民冲破，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也就随着流民的日益增多而大大加强了。

东北是满族发祥之地，为了保护“龙脉”，独占参、貂之利，并使本地官兵和京旗官兵有随缺地亩、养家的恒产，从康熙七年（1668）废止“辽东招民开垦例”起，到咸丰十一年（1861）准开吉林双城堡（今黑龙江双城县）、舒兰河一带止，193年间，汉族人民的开垦均为“非法”，让京中旗人来此开垦[①]，朝廷也不很坚决。

乾隆二年（1737），有个御史叫舒赫德的奏道：

> ……盛京、宁古塔（指吉林省）、黑龙江三处……沃壤千里，仅为牧场闲田，请移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以实旧都而还淳朴、分京师（八旗）生齿之繁。

廷臣孙嘉淦、张若淮、沈起元也先后上疏，乾隆皇帝都不首肯。乾隆六年（1741），户部侍郎梁诗正也上“八旗屯种疏”，乾隆皇帝才可其奏，后来才准京旗余丁三千人赴拉林、阿勒楚喀（今黑龙江阿城县）屯田。不过，坐吃成性的京旗人丁，往往靠官府发下的屯银买了奴仆或雇了长工代垦，自己则不肯久居，因此，收效甚微。光绪二年（1876），朝廷决定濠河（今泥河）以北、呼兰河以南扩建20营屯，每屯15户，共300户，竟只动员来了10户，而来的10户中（28人），7户还逃跑回京，剩下的3户，也泣诉于黑龙江将军，请求“放回（北京）”。

只有在故乡已无法谋生的汉族流民，才在东北扎根开垦。道光

---

① 最早在雍正元年（1723）。

中叶，在黑龙江呼兰河流域的汉族“民户”，已有5 600户，开垦了27 500多垧土地。而嘉庆时吉林的汉人即有6 000多户了。汉族流民垦荒的积极性很高，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决定部分开放禁令时，呼兰有个叫杨继民的，一次就押领20余万垧荒地！为了财政的需要，光绪六年（1880），朝廷规定了三种奖励移民的办法：每亩地卖价4串钱，买不起的每亩纳租600文；免租税5年，地熟后，每垧只交租税660文；乌苏里江地区免纳租税，每户补助32两安家费。为了鼓励定居，同治五年（1866）开始允许汉族妇女出关，光绪四年（1878）最终废除汉妇出关之禁。

光绪四年（1878）、光绪三十年（1904），吉林垦务局和黑龙江垦务局相继设立，标志着东北已由部分开放时期进入了全部开放时期。而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911），吉、黑地区一共开放荒地6 975 995垧。由于汉族流民的不断激增，清末，仅黑龙江地区即有5 363 400余人，较之乾隆中期，增加了将近90倍！至于辽宁、吉林，则比黑龙江开发建设得还要早得多。

蒙古诸部，因最早归附清朝，因此，清朝赐爵蒙古诸王，极力保护诸王一贯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东三省的蒙古各旗，在汉族流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开垦较早。乾隆五十六年（1791），位于吉林、黑龙江的郭尔罗斯部，十年之内，已有耕地265 648亩；地处黑龙江省西北的依克明安部，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旗内所有牧地（除乌裕尔河沿岸外），已全部开放，蒙古牧民只有180家了。

在辽阔的内、外蒙，由于蒙、汉人民的共同开发，已经形成了农业区、牧业区和半农半牧的三种经济区，牧畜的品种也多样化了（有了驴、骡的饲养）。光绪时期，还用力经营外蒙，允许蒙汉通婚，奖励汉人开垦，规定用汉文写公文，启发蒙民学习。光绪三十二年（1906），云贵总督岑春煊奏请热河、察哈尔、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等地设行省，根据就是汉族流民已很不少；第二年，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寿耆巡视蒙古，喀喇沁王还同意开放。汉族农民

发展了归化、土默特、察哈尔等地的农业，交流了土木建筑（粮仓、土木结构房屋）、渠灌、菜园、果园的技术，还“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内蒙出现了许多市镇，外蒙的王呼勒、额尔德尼昭和库伦，也相当繁荣。直隶的独石口、马厂，为蒙古一等公德鉴所有，德鉴有功于朝廷，所以朝廷一直禁民徙居，但光绪八年（1882），也清丈了土地。

同治以前，汉族人民被禁止流入台湾，朝廷还宣布“台民（平原地区的汉、高山两族人民）私人番地（山区）者亦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日、美侵扰台湾后，两江总督沈葆桢请废前禁，汉人于是得以自由出入台湾。

光绪二年至七年（1876—1881），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向俄索回伊犁之际，奏请改设行省、移实汉人。光绪十年（1884），新疆改设行省，朝廷每年还将“协饷”（补贴）由乾隆时的61万两，增至290多万两。汉人的大量移人，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天山北部的乌鲁木齐河流域也产了稻子，南部的莎车、吐鲁番、巴楚、鄯善和疏勒都产棉，和阗、莎车、疏勒、阿克苏等地还发展了养蚕业，每年各产棉几十万担、丝几千担。天津、北京、两湖、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云南、四川各省汉人，都日益增至新疆，使伊犁有小北京之号，迪化（乌鲁木齐）有小南京之目；娘娘庙和水磨沟的庙会，士女云莅，百货骈集，竞妍斗艳，举城若狂！

至于南巴老林，则开放得更早。嘉庆四年（1799），工部尚书彭元瑞奏：“与其置之空闲，……何若酌置编氓。”嘉庆皇帝害怕流民无处谋生再行暴动，也就同意了。五年之后，深山老林逐渐开垦。道光初年，江西、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各省的流民，寓居这里的，已是好几百万人了。

禁区的突破，是广大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人民吃尽了风餐露宿、流血流汗的苦痛。但广大汉族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血汗没有白流，它建设了边疆，保卫了边疆，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和

各族人民的加速融合。

## 二、汪洋大海中的小岛

###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

道光以后的清朝，活像一个浑身长满了寄生虫的病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吸盘，死死地叮在中国人民的身上，拼命地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极端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道光二十年（1840）起，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止，东、西方列强用军舰和大炮，一步一步地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光绪晚期，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三根绞索——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更是越勒越紧了！

鸦片，自始至终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法宝之一。从道光末叶到清朝末叶，它使中国有几百万人身体直接受害。不择手段而又靠了不平等条约享有不对等贸易特权的外国商人，拼命向中国倾销洋货，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矿产。同治八年（1869），苏伊士运河开通，同治十年（1871），伦敦——上海海底电线建成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商业掠夺大大加强。同一年，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总值100 003 700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竟增加到300 001 498万两。洋货的倾销，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的出超地位：同治十年到光绪十年（1871—1884），中国每年平均只输出7 060万两的货物，光绪十一年到二十一年（1885—1895），每年也只平均输出9 964万两；而西方国家输入中国的洋货总值，则每年平均为7 340万两和100 002 672两。中国的茶、丝出口贸易，越来越受到外国资本家的控制：英商用印度的茶叶，抵制中国的茶叶；日本改进了蚕丝生产的技术，也使中国蚕丝的出口量下降。19世纪70年代，中国茶、丝的出口，占全部出口品的80%，而到90

年代，下降为不到60%；而90年代倾销到中国来的洋货，竟比70年代的增加了100%以上！外国的棉布、棉纱、煤油、钢铁、五金、机械、电器材料、颜料、药品、呢绒充斥了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中国的蛋类、皮毛、猪鬃、山货、桐油、食糖、大豆以及矿石、矿砂，却廉价地被运到外国。经营这种掠夺性贸易的，是外国人经办的大大小小的洋行。这种洋行，到19世纪末已有933个。它们通过这种不对等的贸易，获得的是高额利润。美国的大来洋行，垄断了中国的进口木材，40年以来，获得纯利7亿美元；德国的美最时洋行，也获得了净利2亿元。英国资本家的代理人，60年代起已经营中国内地牧民的驼绒，80年代还跑到归化（呼和浩特）去抢购羊毛。

外国的银行资本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设立最早的外国银行，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同治六年（1867），英国又在上海设立汇丰银行。后来，英国还设了有亨利银行、法国也设立东方汇理银行、德国也设了德华银行、俄国、日本、美国则分别设了华俄道胜银行、正金银行、花旗银行。它们控制着中国的海关行政，还发行纸币、经营外汇、发放短期高利贷款，同时还进行大量的投资。清朝的借外债，开始于同治四年（1865）。到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共借了六次外债，总额约4 000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短短的四年间，清政府又借外债七次，总额达300 007 000万两！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款子并不白借，中国除了付给高额利息之外，还要用海关、盐税、厘金作抵押，还要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修筑铁路、经营铁路、开矿采矿。甲午战后，法国修筑和经营了滇（龙州）越（同登）铁路，夺取了滇、桂、粤的开矿优先权、占有滇省猛乌、乌得二地，开了河口、思茅为商埠；德国修筑和经营了胶济路，英国修筑和经营了九龙铁路和沪杭甬铁路。光绪二十三年（1897）8月28日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7月14日，野心最大的俄国，竟通过所谓“华俄道胜银行”，修筑和经营了从满洲里到乌苏里江及旅顺、大连的全长

2 437公里的“东清（中东）铁路”，在这条横贯纵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沿线，还居然设置了俄国的行政、司法、驻军、巡警机构；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俄国通过这条铁路，占用了东北200 894 垧土地，霸占了沿线的森林、矿山的开采权和内河航行权。它还在沿线建立了松脂厂、火柴杆厂、木材蒸馏厂，一系列的发电厂、面粉厂、榨油厂、糖厂、烟厂以及罗西安洋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秋林洋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把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走。到宣统三年（1911），俄国利用中东路运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北大豆，就有34 089 000 普特[①]之多！

外国的工业资本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命脉。各国银行的工业投资，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年，即已达到700 008 790万元（美金）。其中，英国有200 006 030 万元，占33%；俄国有200 004 650 万元，占31.3%。大量的投资，使各国控制了中国的矿山、工厂、铁路、航运等等。俄国控制了扎赉诺尔煤矿，英国控制了开滦煤矿，日本控制了抚顺煤矿……；英国开办了怡和、老公茂纱厂，德国开办了瑞记纱厂，美国开办了鸿源纱厂，日本也开办了东华纱厂，光绪晚期，日本还控制了“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开办还嫌不够，它们又在中国人开办的厂、矿（如上海裕源纱厂、山东峄县的中兴矿）中，投入股份，以便对中国的新兴工业进行间接操纵。英国的怡和、太古，美国的旗昌等轮船公司，控制了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以俄国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大肆掠夺东北三省之外，还深入到我国的内、外蒙古地区侵略。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在内蒙、外蒙地区，俄、日著名的洋行，即有二十几家之多。宣统元年（1909），英、美的烟草公司，也侵入了内蒙、外蒙。20 世纪初，内蒙的商品153种，而洋货竟占了121 种！其中，俄国商品，增多了22%。在外

---

① 一普特等于16.38 公斤。

蒙地区，仅库伦一地，俄国商人便有 3 600 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俄国侵略者设立了“蒙古金矿公司”，大肆掠夺外蒙的金矿。仅在额尔德尼昭王旗、马贝子旗等 15 处，到宣统三年(1911)，即共掠走黄金 135 000 余两！

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殖民剥削，培植了一批洋奴买办和封建军阀。买办和军阀，靠了帝国主义的后盾，不仅在清朝政府里当了官，而且办了一些厂、矿。清末当了朝廷邮传部尚书的江苏武进人盛宣怀（1844—1916)，就当了一辈子的洋奴。他最初只不过是李鸿章幕下的一个小小的“文案”，但在筹划和经办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和美、英轮船公司打得火热，跟它们多次订立“齐价合同”，又以局产作押借到外债，很快就发了迹。不久，他又建议创办和亲手“总办”了电报局，与丹麦、英国的电报公司签订条约，竟当了海关道的监督。不过，官运亨通的他，不论是办轮船招商局，还是办电报局，都离不开西方殖民者的“开恩”，不敢违背主子们的旨意。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他接办汉阳铁工厂（后改名“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后，又不得不向德国借了 400 万马克的钱来买采煤机器，向日本预支矿石款 300 万日元。他“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首先想到的还是用出卖路权，向外国银行借款！其他一些官僚资本家，离开和帝国主义勾搭，也同样办不成自己的企业。办开平矿的唐廷枢，原是英国怡和洋行的职员，资本家郑关应、徐润，也分别在太古、宝顺等洋行里当过“康伯度”[①]。清末形成的一批军阀，也在各亲一派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办了一些厂、矿。袁世凯的两个得力干将段祺瑞和曹锟，就各自办了山西阳泉广懋、正丰等煤矿和天津恒源纱厂，他们都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袁世凯本人也在开滦煤矿和水泥厂搞投资。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同样遏制它的发展。许多封建官吏大量购置和霸占土地，极力巩固

---

① Comprador，“采购员”，即买办。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有四万亩的良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辉县也置田五千亩，在青岛的一处房产即价值40万两；东北军阀汤玉麟、吴俊陞（外号“吴大舌头”），有地八九万亩；而张作霖、张宗昌等的“裕宁屯垦有限公司”，更领吉林土地、森林、矿山1 320多万亩之多！至于封建的苛捐杂税，那就简直是多如牛毛：什么“户口捐”、“自治捐”、“学堂捐”，什么“印花税”、“硝税”、“渔业税”等等，无处不有，此外，还发行什么“公债”（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袁世凯在直隶一省就强迫发行了480万两）！袁世凯的二哥叫袁世敦，袁世敦的妻弟叫张镇芳。张镇芳在天津搞了个“筹款局”，大肆摧残工商业，拼命搜刮民财，一斤烟、酒也须交税16文，长芦的盐引也每斤加价四文，只这两项，光绪二十九年（1903）就搜刮到150万两！

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摧残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十分的曲折缓慢。为了适合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者的胃口，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后即下令：“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这就是说：中国民商，只能附股于官僚洋务派的企业中，不许自办大企业。因此，直到19世纪80年代，民间工商业者自办的小企业，资本不过几千元，最多也不过几万元。同治十一年到光绪220年（1872—1894）间，中国商办的新式企业，一共只有54个，总共才有500多万元的资本，还不到官办、官督商办或地主开办企业资金的1/3。而且这些企业，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下，还随时有垮台的危险。有个叫胡光墉的丝织业主，在外商压低丝价的竞争下，终于破产关门。

甲午战争之后，部分官僚呼吁振兴，清廷被迫宣布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织等局，广为制造”，民族资本主义才有了一些发展。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间，全国新办企业50多家，资本约有1 200万元；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竟增办到82家，资本1 600万元；到三十二年（1906），更增至136个，

资本达到2 700万元。其中以纺织业的发展最显著：无锡的业勤纱厂、苏州的苏纶纺织厂、杭州的通益公纺织厂和南通的大生纱厂，都是比较大的。缫丝业的发展也很显著：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缫丝厂只有12家；二十四年（1898），增加到20来个；二十九年（1903），又增至24个，丝机8 526架；宣统元年（1909），已有35家，丝机11 058架；而宣统三年（1911），更增加到48家，丝机达13 737架了。此外，面粉、火柴、水泥、烟草、玻璃、机器制造、采煤、冶铁、炼油（煤油），也都纷纷开办起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道：

> 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蚕各厂约30余家。此外，机造之货，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火者，江西亦有用西法养蚕缫丝之请，陕西现已集股开设机器纺纱局……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十年以前即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之货……湖北、湖南两省已均有购机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北现已考得机器制茶、机器造塞门德（水泥）土之法。……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

煤矿方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吉林奶和山德兴煤矿公司、辽宁锦西煤矿成立。机器制造方面，光绪三十三年（1907），汉阳扬子机器公司也成立了。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19世纪50年代即已诞生（主要在通商口岸由外国人开办的船舶维修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工人阶级日益壮大，也使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已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它的力量很弱（1912年，全国的纱锭也才只有484 192枚），因此，和强大的帝、官、封经济相比，它不过像汪洋大海中的小岛。这种情况，也

就铸成了它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

## 三、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 ——改良与革命思想的出现

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进程的开始、加深和完成，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谋求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也就开始、加深了。他们再也不迷信那些“帖括之学”了，而要求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学习西方某些先进东西，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道光末叶以来，第一个放眼世界的人是林则徐。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他还主持编撰了《四洲志》、《华事夷言》，介绍西方国家情况。与林则徐、龚自珍、陶澍都有过密切来往的魏源，在林等所编这些书的基础上，花了40年的时间，又编出一部更大部头的《海国图志》，起初是60卷，后来又辑补了40卷，共计100卷，比较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外国的情况。魏源当过知州，在任期间，曾经改建书院、设立义学、兴办水利、传种牛痘，平时又主张禁烟、变法，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编《海国图志》的目的，为的是“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跟魏源同时，福建官吏徐继畬编了一部《瀛环志略》，也介绍了世界各国情况，并附录了一些从西人所绘地图上直接描绘下来的地图，此书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日人两次翻印。

同治以后，尤其是中法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不只是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着眼于工商业的发展、政治的改良了。这股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为突出。王韬是苏州人，曾去广东做过官，还跟太平天国联系过，后来留学英国；归国后，在香港当过《循球日报》主笔，主持过上海格致书院。他认为只有发展了新式工商业，“民

生”才能富足，“民生既足，国势自张”。他赞扬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精种，主张改革取士、练兵、学校、律例方面的旧制，他还指出官僚们的洋务“新政”，是祸国、害民而不能福民、利民的勾当。经商出身的郑观应，比王韬还要响亮地提出大力效法西方。在他那“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的《盛世危言》① 中，他大声疾呼“变则通”；又说：中国要想自主独立，必须兼采西学，进行变法；必须振兴工商，发展机器生产，用自己机器产品同外国进行“商战”，抵制洋货；必须实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政治。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因此，他主张开议院以通下情。

光绪中后期（19 世纪 80、90 年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开始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来作为鼓吹变法的理论基础了。康有为利用了国学中某些传统的东西，加入了他所能了解到的西方一切近代科学、历史的知识，宣扬世界的本源是“无”（即“气”、“太一”、“太极”，都具有物质性），提出天道就是“变”，世界万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人由猿猴变出”。又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朽；新则通，旧则滞”，因此，“守旧不可，必当变法”。他的这种唯物的、进化论的观点，对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起了推动作用。他又利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托古宣扬“改制”。这些著作，在当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翁同龢看了《新学伪经考》，在光绪二十年（1894）6 月 5 日的日记中，也不得不惊叹道：“（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

19 世纪 80、90 年代②，康有为还写过一本试图把社会改造成“大同”境界的《大同书》。全书分十部分：入世界，观众苦；去

---

① 共五卷，刊印于 1893 年，收录了他自 1862 年以来的著述，刊印前又经他进行了三次增删。此书是他的代表作。

② 有人认为 1884 年即有初稿，到 1884 年至 1887 年间成熟；也有人说成书于 1901 年到 1902 年间。

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各独立；去众界，为天民；去产界，均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书中揭露了中国当时社会中的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投胎之苦、劳苦之苦、贱者（工商业者）之苦、压制之苦、阶级之苦，说："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无公德，无平心"，因此，必须去苦界，至"极乐"。他所幻想的极乐世界里，无众苦，大家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屋里，乘上飞船走路，吃着延年益寿的食物，安乐至极；人人劳动，财产公有，"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懒惰、独尊、堕胎、竞争为四大禁，做工为最崇尚的事业，做工的人也最多，他们做工是用机器和驯兽，一天只做三四小时或一二小时，其余的时间则游乐或读书。在那大同的社会里，没有家族的统治，人们绝对独立、平等地自由结合，男女自由同居，儿童实行"公有"、"公养"、"公教"，老人、残废人实行"公恤"，女人和男人一切平等、婚姻自由、不被囚禁、不被缠足、不被当作奴婢和玩具。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兵、刑之官，没有君王和贵族，没有教皇或教主，政府只是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机关；管理经济、文化的官吏由大家公选，一切大事由大多数人议决。那样的国家没有国界；有创造发明的人受奖；人死后火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似乎比太平天国的小生产的天国理想进了一步，机器大生产，自然有较高的物质基础，而人人劳动、财产公有、政治平等、结合自由等，也进一步表达了人们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专制的憎恨。

不过，上述一切改良派都主张自上而下地改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必须先经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现，《大同书》里还断言白种人比有色人种优越，土地问题也谈得粗糙。对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一是没找到受压迫的阶级根源，二是后来竟添上了在女学未成立以前，女子不能独立。

康有为最初作为一个维新志士登上政治舞台，后来竟变成了一

个保皇党的老顽固，前后判若两人，从中可见中国幼弱的资产阶级和根深蒂固的封建阶级联系的密切。谭嗣同比他要强些。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发表的《仁学》一书，把一直属于伦理学范畴的“仁”，表述成物质性的、无处不在的实体——“通”（“以太”、“电”），说明万物间皆有联系，均在变化、运动，互相转化，很有点唯物辩证法的味道。他虽然也主张改良，但书中却一定程度地表现了对封建主义的憎恶，对革命的一定程度的要求，成了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导。

真正称得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还算严复（1853—1921）。他的基本政治倾向虽然属于改良派，但是，他却通过一系列有选择的翻译[①]，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政治理论、自然科学等，广泛地介绍进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人们提供了突破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加上他的取舍、评论、改造，强调了进化是宇宙中的普遍规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种生物进化、社会进步的思想，激励了许多爱国志士奋斗、“自强”、救亡图存，也唤醒过一些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愚昧信天或空谈夷夏的人，使得“民”气为之一变。



严复像

清朝的进一步腐朽，国难的进一步加深，使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迅速地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锋战士。邹容、陈天华、朱执信、章炳麟、孙中山等，便是这些革命者的杰出代表。而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县人，则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

① 除《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穆勒《名学》。

学说的人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他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如剩余价值学说等），他写道："马克思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莩之齐氓"。他还试图用上述观点来观察、评论中国革命，探求中国贫、富根源等问题，尽管他的观点有着许多小生产者的主观空想。比较有影响的革命者是章炳麟（1869—1936）。章炳麟出身于浙江余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受过良好的家学教育，22岁时死了父亲，不久又受业于朴学大师俞樾，打下了精深的学问基础。甲午战后，投身于救亡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反清斗志更加坚决，割去辫子、穿起西装；不久便与孙中山往来。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论点鲜明、论据充足，是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他的《訄书》[①]，也以西方先进的思想，参以历史、文化、语言、文学、法律、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发挥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还赞扬农民道德最高尚，指出洋奴买办道德最卑劣。他蹲过监狱，但他不屈服，不仅和狱卒对打，绝食七天表示抗议，而且还跟前来探望他的蔡元培谋划、组织了光复会。出狱后，他再次赴日，担任了《民报》的主编。但武昌起义后，他一回国，竟唱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的调子来，这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不彻底性。

清朝衰亡期向西方寻找真理而攀登上高峰的两个人，是洪秀全和孙中山。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把我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反封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它不仅提出了明确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而且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通过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因此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成为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孙中山，则更进一步用西方先进的理论，发挥了唯物论、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世界以太极（以太）为根源，而这

---

① 1899年木刻，1902年重刊。

以太则是物质。他的“以太”说，比谭嗣同彻底。谭嗣同虽然也把以太作为世界的物质根源，但又认为以太是“心力”、是“仁”、是“灵魂”，以太甚至不过是“心力”的“托言”和假借。孙中山则认为以太远远存在于生命产生以前，存在于精神产生以前。他把物质世界的发生、发展分成三个时期：物质进化时期（无生命），物种进化时期（有了生命）和人类进化时期（有了人）。他说：远在人类、生命产生以前，是以太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有了地球以后，才有“生元”（细胞）、生命，有了细胞、生命以后，才有禽兽；人类最初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类”。这种认识的唯物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他又认为细胞具有和人相同的精神意志、求生存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等等，实质上又陷入了唯心论；但是，他又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的国家学说，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勾画出这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宏伟蓝图，并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改良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他的思想与行动，都达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峰。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

## 四、五色杂陈的文学界

——清末小说的大盛

社会危机的加深，改良与革命思想的出现，搅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也沸腾了中国整个的社会科学界。考据之学没落了，华而不实的文风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打开了，清朝高度专制的文化政策松弛了，社会科学方面的新探讨、新尝试、新观点、新成果出现了。史学方面，康有为写出了《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

记》、《法国革命记》、《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法记》，黄遵宪[1]写出了《日本国志》，都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介绍外国的兴衰，借以自警自诫，鼓吹变法维新。梁启超还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打破传统的纪传体例和正统观念，阐明进化的规律。光绪三十年（1904），有个叫夏曾佑的，还采用外国史书的新体例，按章节写了一本《中国古代史》，开了新体例史书的端。文学方面：章炳麟一方面强调小学（文字学）、音韵学的重要，另一方面，又力主文学应当“尚实”，反对空洞的华丽之风。马建忠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文法书《马氏文通》。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黄遵宪发起了诗界革命的运动，提倡通俗的语句、新颖的形式。黄遵宪的《冯将军歌》，歌颂了爱国将领冯子材；《悲平壤》表示了对甲午战败的愤怒；《台湾行》则高歌台湾是中国领土，号召“人人效死”拒割让。他的诗，激荡着深沉震耳的爱国心声，迸发出火山爆发般的爱国热情。宣统元年（1909），同盟会的一些会员组成南社，通过诗歌，大力鼓吹革命。而小说的创作，更出现了熏莸并茂、五色杂陈的局面。其中，以《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为最有名。

《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朴。曾朴是江苏常熟人，创办过“小说林社”，编译过不少新学书籍，对文坛颇著影响。最初，他收到了友人金松岑的四五回小说稿，看过之后，颇为激动，于是便决定修改，并又续写了若干回，取名《孽海花》，主要描写了宫廷的混乱，官吏的贪赃、媚外，文人士子的醉生梦死，指出了清朝的崩溃，预示了革命的到来。原本第二回公开地咒骂科举制度“是历代专制君王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它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

[1] 广东梅县人，曾任驻日本使馆参赞，还当过驻美、英、新加坡的外交官，戊戌变法时署湖南按察使，因参与维新运动被弹劾罢官。

的世仆”。书中，还直接描写了孙中山、史坚如等革命党人。书的艺术性还不错，思想性又高，因此，一二年内就再版了多次，销售了几万册，影响实在不小。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这个人为主线，说他在官家做事，20 年走南闯北中所见的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所闻的肮脏龌龊、卑鄙无耻、腐败无能。官师仕商皆有描述，医卜星相均有涉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广东南海人，青年时即到上海，后又曾去汉口，不久又返回上海，阅历丰富，而且爱国热情很高，曾亲自参加反对美国政府虐待华侨，禁止华人入境的运动，因此，还写过其他许多的小说，有《痛史》（27 回）、《九命奇冤》（36 回）、《瞎骗奇闻》（8 回）、《电术奇谈》（24 回）、《盗侦案》（24 回）、《恨海》（10 回）、《劫余灰》（16 回）、《最近社会龌龊史》（20 回）、《新石头记》（40 回）、《上海游骖录》（10 回）、《发财秘诀》（10 回）、《两晋演义》（23 回）、《糊突世界》（12 回）、《云南野乘》（3 回）以及短篇小说《立宪万岁》、《人镜学社鬼哭传》等，描写的范围相当广阔，对官僚的狠毒、腐朽，八国联军进攻造成的乱况，为时局所铸成的悲剧爱情，异族统治的苦史都涉及了，还大力反对“猪仔运动”、迷信活动。《发财秘诀》则愤怒而突出地谴责了汉奸买办的无耻和狠毒，最后一回借看相人的口骂道：

> 你若要发财，速与阎罗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换上一颗兽心！

和吴趼人一样的另一位高产作家是江苏上元的李伯元。伯元少时文章、诗赋均写得超众，但却累举不第，于是，毅然舍弃仕途，来到上海办《指南报》、《游戏报》和《繁华报》，后又主编《绣像小说》。李伯元生于同治六年（1867），死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活了 39 岁，但却写出了《官场现形记》（64 回，其中

友人续了几回)、《文明小史》(60 回)、《中国现在记》(12 回)、《活地狱》(42 回,吴趼人续过几回)、《海天鸿雪记》(20 回)、《庚子国变弹词》(40 回),还作过一部《醒世缘弹词》(因《绣像小说》停刊而未竟)。《官场现形记》揭露了官吏们的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和倾轧以及对洋人的奴颜婢膝和对百姓的贪酷狠毒。

《文明小史》以同样辛辣的笔触,讥刺了百日维新期间官僚的媚外、新党的投机或阳奉阴违,以及他们跟横行敲诈的洋人一块压榨百姓的恶行。南京制台的小儿子在学堂操场被石头绊倒,头破身死,制台便不仅开除了体操教员,勒令他披麻戴孝,而且,学校生员还得逐日轮流停课探望(小儿子死前)、停课志哀、祭吊送葬(小儿子死后)。书的前几回描述湘西永顺府正考武举时,来了探矿的洋人,饭店伙计打碎了他的洋瓷杯子,地保马上报告府台大人柳继贤,柳大惊失色道:"打碎了景德镇都做不出来的外国人的杯子,这还了得!"立刻押了地保、抓了店小二、停止了武考,亲自到饭店拜访洋人,卑躬屈膝,无所不至,并且担心万状,不知此番交涉,将来如何是了……

清末的此类小说,虽然思想性强于艺术性,写法上也往往有如《儒林外史》,一人俱起,而与一人俱讫,若断若续,但是描写上却有些过于夸张,因此,虽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竟缺少耐人寻味的深哲理。

外国文学的翻译,乾隆五年(1740)前后即已开始。不过,大都零零碎碎,而且只是根据《圣经》中的故事或西洋小说的内容加以改写(如欧文《杂记》之类)。光绪时期,才有长篇(如《昕夕闲谈》,上、下卷共 55 回)。大规模的翻译,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末最突出的小说翻译家是林纾(1852—1924)。林纾是福建省闽县(福州)人,少年时期,父亲就死了,所以家里很穷。但他却很爱读书,壮年时期曾到过台湾,阅历广博,学问渐深。他还善于画画。他更嫉恶如仇。因此,对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很不满,对光绪皇帝深表同情。礼部侍郎郭曾炘荐以经济特科,他坚决

不去，而努力于讲学、著作和翻译。他一生中，翻译的外国小说，共有160多种。英、美、德、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希（腊）、瑞（士）、日（本）的作品，他都翻译过；他所介绍的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美国的欧文、斯陀夫人，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他所译的书，影响最大的有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等。他本人不懂英文，从本子的选择到口译，都靠着别人的帮助。因此，选本和翻译上都有失当之处，加之译文是用的古文，因此，阅读者的范围不能很广，但是他仍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翻译作家，他的译作堪称当时最好的再创作，大开了中国作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眼界。

林纾而外，较著名的译家还有吴梼、陈冷血、包天笑等。吴梼翻译的小说，以日本的为最多。他翻译俄国小说，也比林纾早（林纾所译俄国作品，全在辛亥革命之后）。此外，陈独秀和苏曼殊也合译过外国小说[①]。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也翻译了不少外国的短篇小说，宣统元年（1909）汇集成《域外小说集》出版，不过，十年间才销售出21册。这也说明：用古文翻译的作品，读者的享受面，是何等地受到限制！

## 五、从《老残游记》到《铁云藏龟》

### ——清末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

在清末众多的小说中，有一本篇幅虽然不长，意趣却很渊厚、文字也很生动的小说，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颇受读者的欢迎。这小说便是《老残游记》。

---

① 法国作家嚣俄（雨果）的《悲惨世界》。

《老残游记》最初发表在《绣像小说》上，后来续发于天津的《日日新闻》，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它全书只有20回，写的是一个叫铁英而号老残的人游历山东一带的所见所闻。书中最初也有诋毁义和团、大骂革命党人的话（后删掉），但却痛斥官吏的可恶，如实地描述了祖国山水的可爱。对“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大明湖畔风光的描绘，对奔腾咆哮而又冰封雪锁的黄河的临摹，都很感人。人物的刻画，也能栩栩如生。王小玉唱大鼓的情形，除了肖像和动作的生动描写之外，对她的声音，描写得也很不一般：

> ……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几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

这《老残游记》的作者，叫做刘鹗，字铁云。他是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后到上海行医，不久又做买卖，后来在帝、官、封的“竞争”下黄了摊、亏了本。光绪十四年（1888），因修黄河有功，被以知府任用。在北京时，刘鹗上书朝廷，力言应修铁路、开矿山、兴实业、救垂亡，遭到了守旧派官僚的怨恨。宣统二年（1910），他被发配新疆而死。

刘鹗在文化上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写了《老残游记》，而在于收录甲骨文、研究甲骨文。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甲骨文收录成书、也断定它是殷人文字的人！

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前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把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一带地里翻出的、上面刻有文字（有的字里还涂着黑墨或朱砂）[①] 的龟甲或兽骨，只是当作中药“龙骨”售用。村里还有个剃头匠叫李成的，一生都以购售“龙骨”为业：庙会时摆摊卖（将骨错成细粉，名之为“刀尖药”，医治红伤）；平时也成批地卖给中药铺，每斤才卖制钱六文。年复一年，大批的“龙骨”自然也就散发到了北京。

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个精于铜器铭文的京官（山东福山人）叫王懿荣的，得了疟疾，药单上有一味龙骨，就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去买。买回一看，这“龙骨”上竟有篆字，王于是大为惊讶，马上将达仁堂里所有字迹较清晰的“龙骨”全买下来。这个偶然的机会，使王懿荣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人[②]。王懿荣既已发现这是宝贝，便不惜以每片二两银子的价钱，进一步从山东潍县商人范维卿和赵执斋手里大量购买，到他在第二年秋天死去以前，一共买到了一千四五百片。

王懿荣死后，所藏甲骨文片，小部分赠给天津新书学院，其余

---

① 也有人说甲骨上的文字并非全是刻的，还有用墨、朱写的。

② 也有人说孟定生头一年10月里已怀疑甲骨上是古文字，这一年和王襄二人也收购了不少。

一千多片，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还债，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卖给了刘鹗。刘鹗又从方若的手里买了三百多片，还打发赵执斋跑遍齐、鲁、赵、魏之郊广为采购，又买了三千多片。但他还不满足，又叫三儿子刘大绅到河南买回千余片。这样，刘鹗前后买到的，不下5 000片，这使他成了当时甲骨文片的最大收藏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更将选出的1 058片拓了，汇成为《铁云藏龟》一书（共六册）。甲骨文片轻脆易碎，刘鹗首先把它们汇集成书，实在是一种不朽的事业，他的功劳是不朽的！

但刘鹗的拓印成书，首先是受了罗振玉的撺掇，罗振玉还为该书写了序言。书一印行，便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有个叫孙诒让的人，最早根据《铁云藏龟》写出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契文举例》①。《契文举例》用《说文》和金文互证的方法，开了系统研究甲骨文字的先河，而且科学地对甲骨文进行了分类（分为十章：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

然而，在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上，毕竟还数罗振玉贡献最大。自从"龙骨"被揭穿以后，搜求和购买甲骨文已很不易。一是价钱昂贵（骨之大者，售价一两白银），二是古董商人谎言发现地点在河南汤阴，三是英国教士库寿龄、美国教士方法敛等外国人四处抢购，四是小屯的地主垄断发掘权。有个叫朱绅的地主，竟在地里搭了席棚、安了炉灶叫佃户们日夜发掘。但是，即使如此，罗振玉也不畏难。他叫弟弟子敬、振常和内弟范恒齐等，风尘仆仆，四处搜寻，并最后确知出于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他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搜集到万余片，一跃而成为清末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他更深入研究，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等文章，肯定了甲骨文是殷王室的遗物、小屯村是晚商的都城、是殷王武乙之墟，为进一步研究甲骨文打下了基础。1912年，他拓印的《殷虚书契》（八卷），不仅印得精工，而且收录甲骨2 221片。

---

① 稿是1904年写成，1913年才在上海发现，1914年才付印出版。

清末甲骨文字的研究，虽然还只限于文字学的范围，没能发展到考古和历史的研究上，但是，它的发现和研究，开始使人们觉得："仓颉造书"是无稽之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是我们祖先发明文字很久以后的事情，连战国末年古文、籀文、大篆、小篆也不是我们祖先对文字的原始创造。因此，甲骨文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的研究，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

## 六、"苟无成，毋宁死！"

——冯如和其他自然科学家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只是在清朝后期才落在西方先进国家之后了。然而，广大人民不满于清朝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奋起反抗；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也不甘于这种落伍而受人欺侮的状态，他们也不断地要求"自强"、"雪耻"，奋起直追，赶上和超过西方。

江苏吴县人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道光进士，在詹事府里做过官，后来又出使过广东，亲眼看到了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因此，同治时期他就说道：曾创造过开天辟地以来未有的奇迹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被"小夷"凌辱，实在令人感到羞耻。但是，如果感到羞耻，就应该首先承认自己落后，并认真研究外国为什么小而强，我们国家又因为什么大而弱，而且要迎头赶上。因此，他不但主张变法改革政治，还极力主张"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工艺的"格致至理"等。

清朝的腐朽统治，埋没和摧残了许许多多的科技人才。然而，不少爱国的知识分子，却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了大量的"自强"工作，一些人还做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

浙江海宁的李善兰（1810—1882）和江苏金匮（无锡）的徐

寿（1818—1884）、华蘅芳（1833—1902），都是晚清杰出的数学家。李善兰在同文馆当教习，咸、同时期和外国人一起，合译了不少代数、微积分、物理、天文科学方面的新书，传播了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同治三年（1864），还撰写了《方圆阐幽》一书，阐明了微积分学的初步概念。徐寿除了数学，还精于化学。华蘅芳小的时候就读了不少中、外的数学书，咸丰十一年（1861），他和徐寿一起，被派去安庆军械所造枪炮弹药。第二年，他俩又奉命合制火轮。专业性质的改变，并没有难倒他们。他们广泛查阅科技资料，又进行实物参观，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自造的蒸汽机。这台蒸汽机，汽缸直径才1.7英寸，飞轮每分钟才转240转，但却自力更生地解决了制造轮船的关键。同治二年（1863），他们终于制成了中国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木壳轮船。同治三年（1864），军械所迁到南京，他们终于制成了第一艘可以使用的火轮“黄鹄号”，它身长55尺，逆水时速8公里，顺流时速已达14公里。同治四年（1865）后，华蘅芳还以明白通畅的笔墨，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代数学、三角、微积分、概率论等大量的数学著作和一些地质、海洋方面的著作，自己也撰写了《开方别术》、《开方古义》、《算学笔谈》等数学书，在中、西学术的贯通和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创造精神。


詹天佑

广大爱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一旦得着施展才干的机会，便能做出惊人的事业。有个叫詹天佑（1861—1919）的广东南海人①，同治十二年（1873）

① 一说他是安徽省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人。

才12岁，便考上了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生，17岁就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铁路专业，20岁的时候竟获得了土木工程的学士学位和学业优秀的奖状。然而，回国后，清朝却叫他改了行，派他到福州船政局学驾驶，后来又派他到黄埔教英文，8年之后，詹天佑才所学有所用。不过，不论做什么工作，他都不仅没有荒废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且处处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无畏气概。中法海战中，詹天佑身在被五艘法舰包围的扬威号军舰上，他和扬威号全体爱国官兵一道，与强敌激战了5小时又45分钟。扬威号被击沉后，他仍奋不顾身地抢救战友。光绪十年（1884）8月10日上海《字林西报》上记述道：

> 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威号军舰上的学生五人中，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动人，他临大敌而毫无畏惧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上，还能镇定如常……由水中救起多人……

光绪十四年（1888），詹天佑得到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终于在中国铁路公司工作，负责修筑塘沽到天津的铁路。光绪十八年（1892），英、德、日三国工程师先后承包滦河铁桥（古冶与滦平县——即今滦县之间），因打桩一再失败，总工程师金达（英人）只好找詹天佑承担。詹天佑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使桥基奠定、铁桥修成。十年后（1902），西太后要去祭陵，请外国工程师设计、修筑新易路（河北新城高碑店到易县西陵）。外国工程师听说必须六个月内修成，而且隆冬即动工，不干。结果，詹天佑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即将路修成。新易路，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费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它的修成，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又决定修筑京张铁路。这条铁路起自丰台，经过广安门、西直门、清河、沙河、南口、关沟、居庸关而达于张家口，全长三百多公里。其中，由南口到康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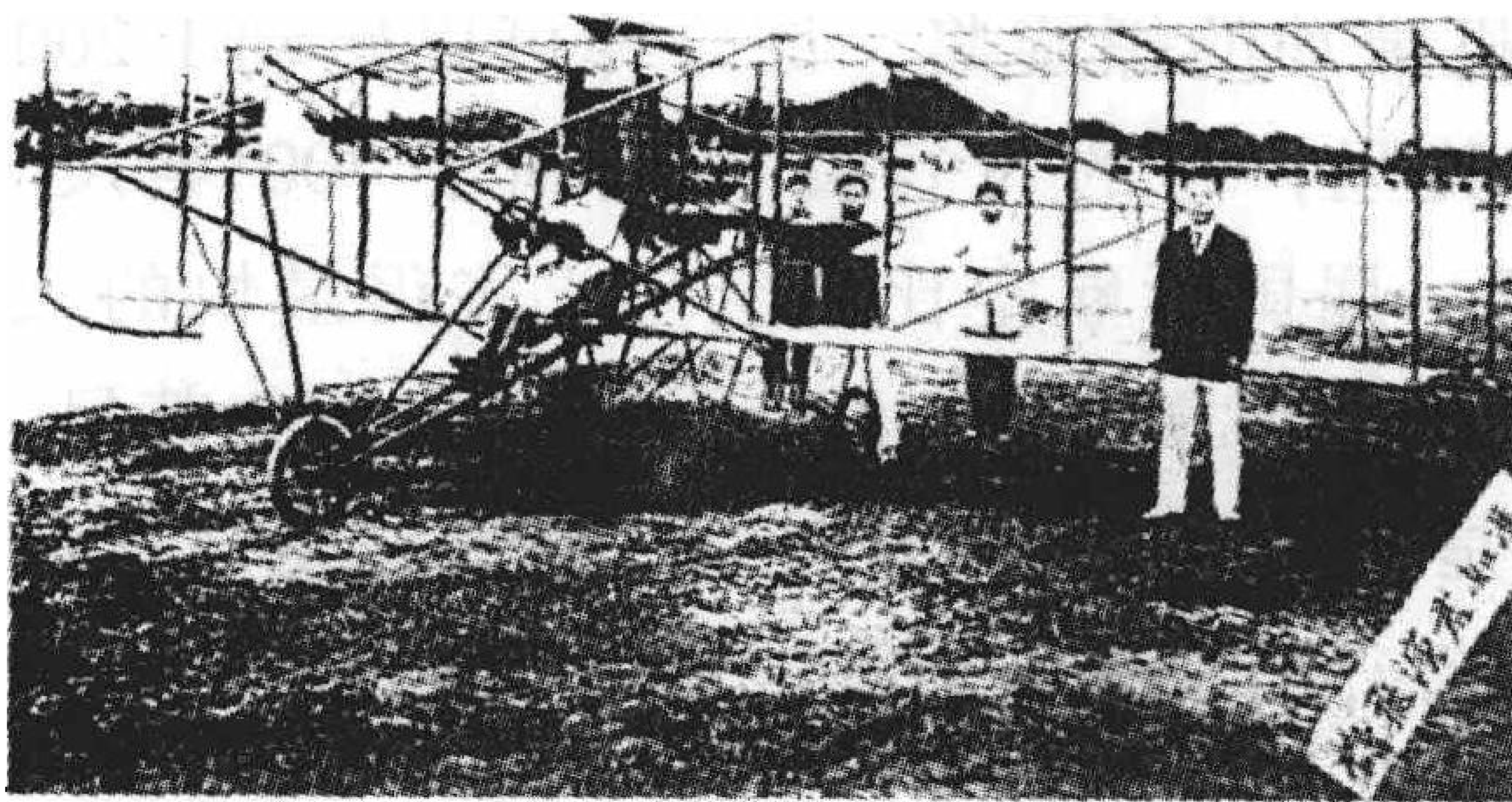
八达岭、居庸关横亘其间，十分险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竟望而生畏，可詹天佑却并不害怕艰险。不过，朝廷派给他的正式技术人员才只两个，而且施工后还调到别处去了。这样一来，一些迷信洋专家的人就议论道：“八达岭开不了，詹天佑是书呆子！”詹天佑听了，更决定给中国人长志气。他依靠工人，刻苦钻研技术，并决心五年的工程四年完成。他身背仪器，亲赴各处勘测，终于制定了在青龙桥下开洞的方案，比原拟由石佛寺西北开洞需凿六千多尺的工程减少了一半。结果，只用八个月的工夫就开通了八达岭的山洞，而京张铁路也只用四年就通了车，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又创了一个大奇迹，一些前去参观的外国专家看了，也不禁特别地钦佩。



京张铁路

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爱国热忱，还从年轻的飞机专家兼飞行家冯如的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出来。

冯如（1883—1912），广东恩平人。他的父亲冯业伦，是个贫苦的农民。父亲节衣缩食，供他念了乡中小学。冯如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小就立下了建设祖国的大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美国三藩市（旧金山）作小贩的舅舅劝他出国学习，父亲和母亲不大同意，16岁的冯如就对父母说：“大丈夫以四海为家……儿行矣，勿以我为念！”为了祖国的富强，他远涉重洋，去到了美国。他白天营生，夜里攻读



冯如和他设计的飞机

英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在纽约工厂里学习机器，并把节约下来的工资买了不少科技书籍，还亲手试造过一些机器。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的消息传到美国，22岁的冯如闻知，气愤到了极点，他说：

造机器难道足以拯救祖国！我听说军用利器什么也比不上飞机。我发誓要身为之倡，掌握这一绝艺，拿来报答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广大爱国华侨，被他的强烈爱国心深深感动了，纷纷凑钱帮助他。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冯如便租了一间房屋，亲手设计和制造起来。他广泛购买、搜集飞机制造方面的资料，并不时观察鸟类的飞翔。宣统元年（1909），他和他的助手，终于制造出了第一架飞机。9月21日，他亲自驾着这架飞机，在美国奥克兰的麦园机场试飞，飞行了2 640英尺的航程，比1903年美国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所制造的飞机多飞了852英尺。冯如获得了成功，但也经历过失败。不过，他胜不骄、败不馁，从飞机上摔下来也不畏惧、更不灰心。宣统二年（1910），他更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这架飞机翼长29.5英尺、宽4.5英尺，由一台30马力的内燃机带动的螺旋桨，每分钟可以转动1 200次，它的时速达到65英里，它的飞行高度达到了700英尺。1909年在法国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航空比赛会上，飞得最快的飞机，时速才只47.2英里；飞得最高的飞机，才只飞到508英尺。因此，冯如的飞机无疑是当时世界上飞得最高、同时又是飞得最快的了。冯如的卓越才能，引起了美国的重视。美国人聘请他当教员，但他一心想的却是祖国。

宣统三年（1911）3月22日，冯如和他的助手们，带着制造飞机的机器和自造的两架飞机回到了广州。11月9日，广东光复，冯如参加了革命军，更积极地制造飞机，以便用更多的飞机为国民

革命军的北伐部队侦察敌情。为了试验所造飞机的性能，1912 年 8 月 25 日，他亲自驾驶着飞机在广州郊区燕塘操场上空飞行，不幸在驾驶过程中用力过猛，飞机坠落，他的头部、胸部和股部全受了重伤，抢救无效，壮烈殉职。

冯如只活了 29 岁，他的爱国赤诚永远长存，他的聪明才智更说明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可赶可追可超！他的崇高理想和光辉实践已被载入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史册，他的“苟无成，毋宁死”的豪情壮语，更将激励着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所有青年！

# 第五章　清代主要民族的风俗习惯

## 一、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汉族是人口最多、开化最早、文化最高的一个成员。汉族古称“华”族或“夏”族，在西汉的武帝、宣帝以后才始称为“汉”族。从汉族的构成成分考察，她并不是本支百世纯粹的文王子孙，而是尽有苗族、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族成分的融合体。如同滚雪球一样，她只是在不断地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融合中成长、壮大。从地域上说，汉族最始发源于汉水下游的夏水、汉中一带，伏羲至殷商时在黄河流域、长江南北，到了汉朝，才遍及全国主要地区。汉朝以后，中国又出现几次民族大融合。而到了清朝，这种融合，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土的空前统一，封禁政策的突破，汉族流民的奔赴边疆，都加速了这种融合。汉族人民与满、蒙等族人民的通婚，与高山族人民的“牵手”（结婚），与苗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等族人民的混居，也不断地丰富和扩大着汉族民族学的面貌（包括着语言和人类学的构成）；而清朝统治者的一些强制性的措施，甚至还改变了汉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如衣着和薙发等）。

但是，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她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在清代，汉族的风俗习惯虽因贫富不同、地区有异而有

一定的差别，但却大致如下：

孝敬父母和长辈以及一般老人，是汉族人民的传统美德。老人在世，兄弟一般不分家；即使分了家，早、晚也必向老人问安；逢年过节（包括老人的寿诞之日），更热烈地拜年或祝贺。赡养老人，被汉族人民视为天经地义；侍奉公、婆，是汉族妇女的传统美德。儿、媳们既然如此可靠（更主要是因为社会福利事业的不发达），因此，社会上便有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有子不久穷”等封建的谚语流行。

婚姻多由父母包办、媒妁说合。男女双方很少有恋爱的结合。富人们讲究“门当户对”，穷人家也有“指腹为亲”的。封建的道德观念，不同程度地禁锢着汉族妇女。老婆婆忍受着老公公的支配，却又严格地支配着自己的儿媳妇。至于童养媳或妾，那更是大富人家公、婆的奴仆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通例，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这样。她们不得念大书，不得进庙烧香、入市吃茶，一切公共场合，她们都很难露面。寡妇很难准予改嫁。姑娘有的还得抱灵牌子成婚、过夫门守节或者自杀以“求名”。正常结婚也不过是“嫁饭”，很少有所谓“伉俪偕和”、旨趣相投可言，正如民谚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饭不嫁汉”。江、浙一带，甚至还有“押妻”的情况。……这一切，说明汉族妇女的地位，是很低下的。这种情况，只是在清末，新的思想有了传播之后，才多少有了一些改变。

丧葬：一般有停尸、守灵、伴尸陪哭的习惯。富人家停尸、守灵的时间长，不喜长哭的还往往雇人（一般是妇女）来陪亲友哭泣。丧服尚白，一般为白袍、白帽，腰扎麻绳。埋葬一般为土葬。富人家有棺有椁，穷人有的只能草裹席埋于荒山野岭。送葬一般由长子执幡引路。丧后，子孙百日不薙头，这又是学的满族的风俗了。总之，丧葬习俗中迷信色彩极浓。

服饰：在清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妇女、儿童、释道、

优伶之类的人仍袭明制宽衣大袖、浅面鞋、长统袜之外，一般人从顺治四年（1647）以后，都薙发垂辫、箭衣小袖了。不过，其中又因官职不同、行业各异而呈现着千差万别。当官的有朝服、礼服、便服的衣着。朝服以花衣作衬，外加套子；便服是长袍、马褂（初为军装，乾隆以后才普及，一般为黑色），小帽、薄底靴，袍子左右开衩。礼服比较复杂：袍子前后开衩，袍的胸部有“补子”，视品级、文武不同所绣图纹又有不同[1]；朝珠项链一般（五品以上才挂）；帽大而有顶戴，顶戴又因品级不同而不同[2]；靴为厚底靴。礼服的颜色，也因场合、典礼性质不同而不同；帽后饰物有蓝、花孔雀翎，官极高才有三眼，一般只一眼。一般士子、商人，不过身穿长袍马褂而已，而且商人的袍褂只能用绢布，不得用绸纱；表示贱人一等。贵妇人穿旗袍，偶尔也穿短衣、褶裙，脚上是绣花鞋一双。儿童的鞋帽，多有绣花。最苦的还是农民。农民穿的是棉织短褂（长工、奴仆夏天则只穿背心），足蹬草鞋、麻鞋（有的终年赤脚），头上既无官绅的暖帽、凉帽（礼帽），又无他们的瓜皮帽（便帽，创于明太祖朱元璋），有的只是草帽或斗笠而已。等级森严的清朝统治制度，形成了人民衣着上的等级制度。

饮食方面：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黄河以北的汉人则以粟、麦、芋、粱为主食。新年之际，南方人还用糯米做“甜酒”、糍粑，配以汤元、香肠和腊肉吃。平时，则无论南方、北方，汉族穷人生活都十分清苦，丰年喝粥、荒年行乞、平年糠菜半年粮者，处处可见。渔夫船户、娼优隶卒的生活，和佃户、长工的生活，水平同样低劣。鸦片战争以后，家庭手工业逐渐破产，农民生活更是以

① 文官绣鸟，武官绣兽，各依品级而绣。文官绣仙鹤、锦鸡、孔雀、云雀、白鹇、鹭鸶、鸂鶒、鹌鹑和练鸟九种；武官依品级绣麒麟、狮子、豹、虎、熊、彪、犀、牛和海马九种。

② 一品红珊瑚，二品花红珊瑚，三品亮蓝宝石，四品暗蓝宝石，五品亮白水晶，六品暗白砗磲素，七、八、九品则是金花或金花银（有纯金的，也有包金的）。

日维艰，破产农民学工学商，徒满之前的待遇不过粗粮糠菜一饱而已。俗谚说“二十四荤三大醉，七百二十顿萝卜干子”，就是对无数徒工生活的写照：每月初二、十六日，多少打点“牙祭”；端午、中秋、新年，多少可以喝到几口酒；平常一日两餐，唯有咸菜而已。汉族的烹调技术十分发达，菜谱即在八百种以上；汉族人民酿的酒，种类也很多。有南酒——如女贞、花雕、绍兴竹叶青等、有烧酒——如高粱烧、麻姑酒等；有药酒——如五加皮、莲花白、茵陈露等；还有果酒、甜酒之类。喝酒之时，总是亲朋满座或红白喜事之期，但富翁们却是想喝就喝的。喝酒时，无论贫富，都喜划拳、行酒令。

住房：南多瓦房，北多草屋，南方人睡床，北方人一般睡炕。富人们一般住四合院，院后附有花园果圃。官在四品以下的，大门与正房不得成一直线；没有功名的，屋脊两端不准塑兽头，即使塑兽头，也不准塑开口兽，只准塑闭口兽。封建等级的权威，在住房上也显示出来。

交通：南多使船，北多用车。船有帆船、乌篷船，车有牛车、马车和独轮车。官员行路，多坐轿子，有四人抬的，也有八人抬的，大官轿上盖着监呢或绿呢。

社会风气：大抵江南繁华之区尚奢，北方尚朴。康熙时，江苏吴县有民谣说：“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绸巾，贫儿打扮富儿形，爹娘冻饿，岂不寒心。”可见，即使并不富裕，也讲究衣着。年节庆典盛会，则有端午的赛龙船、中秋的吃月饼、正月的耍龙灯。花鼓、高跷、庙戏等活动，也丰富着汉族人民的节日娱乐。

## 二、满族和东北的少数民族

满族是清代的统治民族。“从龙入关”的那部分满族，经过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的生息，除了薙发、紧衣等方面还保留着在关外老

家时的风俗习惯外，其余的风俗习惯（包括语言）已基本和汉族没有什么区别。质朴地保存着满族古风、“祖制”的，是留居东北的那一部分。他们不像关内八旗子弟那样奢靡有加、资生无术，却仍有祖宗善射之风，过着农、牧、渔、猎相结合的生活。他们善于养猪，以小块肉粥和手把肉为美食，主食为面食，花样也繁多。“饽饽”（点心）的制作，以蜜供和撒琪玛为最有名，此外还有绿豆糕、花生糕。他们举家和睦，长幼几代不仅同屋，而且同炕或对面炕睡觉。房多平顶，坯砌、垡砌的外墙，年年新抹一次。他们颇能御寒，用兽皮制成的长统、高腰的“靰鞡鞋”，絮进一层经过捶软的乌拉草，穿在脚上，既暖和、又轻便，走在冰层上还从不打滑。他们信奉萨满教，质朴地崇拜着天、地、山、川、鹊、兽等自然神，“萨满”（司祝，有类于巫师）弹弦、拍板、摇鼓、击锣，手里还舞着司刀，嘴里唱着满语祝词①，来试图禳灾、祈福、却病、吊祭。他们院中竖有神杆（称“索罗杆”），它是天的象征；他们堂屋两边（或西屋）供有各种神灵的小型偶像或祖宗匣。他们既祭天于室外，又祭神（祖）于室内，那虔诚之心，远胜于乾隆以后皇室或皇帝本人的祭堂子。他们保留着祖宗的原始好客之风，敬老爱幼而且居丧百日不薙头；他们的妇女也享有比汉族妇女为多的自由——未出嫁的姑娘（“姑奶奶”）可以随便出入庙会、戏园、市肆、茶楼，所有妇女全部无须缠足。

和满族相近或相邻的东北民族，有鄂伦春、鄂温克（索伦）、赫哲、达斡尔和费雅喀等族。

山南山北绿重重，家住凌霄第一峰。
十五女儿能试马，柳荫深处打飞龙②。

---

① 在关里，乾隆以后已变为汉语祝词了。
② 满语“斐迪隆古”，汉名“树鸡”，肉极鲜美。

前人曾这样盛赞勇敢的鄂伦春人。鄂伦春人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是古肃慎人的一支，和鄂温克人同是唐代靺鞨人的直系后裔，相传还建立过“黑水国”。他们原居于西起贝加尔湖、东滨大海（包括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的浩瀚林海中，因此，元代以来被称为“林木中百姓”。“鄂（俄）伦春”一名，第一次正式出现于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一书中。“鄂伦春”，意思是“居住在山岭中的使鹿人”。



鄂伦春人生活器物图

在漫长的岁月中，鄂伦春人把驯鹿作为自己的“森林之舟”，把驯鹿奶和桦树汁当成饮料。他们吃的是兽肉，穿的是兽皮，住的是“仙人柱”（木架帐篷）。但他们儿时即已弯弓跑马，十岁左右即跟大人一起出猎。悬崖峭壁之上，林海雪原之中，他们踏着速超飞禽的滑雪板，戴着马尾编成的眼镜（防止雪盲），挽着非“十石（千斤）”之力莫开的强弓格杀虎豹狼虫，也反抗入侵的沙俄侵略者。他们敬老爱幼，热情好客。鳏寡孤独，从无匮食之虞；“谙达”（清朝国家的收税人）来收贡，他们从不爽期。鄂伦春妇女也都勇决善射，客人一到，她们马上将胸前载儿的摇篮往背后一甩，飞身上马，转瞬之间就射回新鲜雉兔款待。鄂伦春人能歌善舞，还自造了口琴（“崩努克”）。重大节日，他们跳起黑熊搏斗舞、树鸡舞，吹起崩努克，使祖国边陲的深山幽谷，处处充满了生气。

在西起鄂嫩河、北迄外兴安岭、东至牛满江（今布列亚河）的黑龙江南北的广大地区，聚居着达斡尔族。他们是优秀的农业专家，17世纪初，他们已有发达的农业和园艺业，虽然直到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称之为“打虎儿”之后，“达斡尔”一名才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中。

达斡尔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们以农业著名，而农闲时也从

事渔猎活动。他们尤其善于驯马。再烈的马，到了他们的手里，很快就老实而驯服。达斡尔族又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他们是心灵手巧的工匠：他们制造的桦皮车、勒勒车，尽管木轮不太圆，但却特别能载重而且稳当，套上老牛，一个小孩也能赶四五辆。达斡尔族也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客人到家，即使已经叼着烟袋，他们也要请您拿下，装上他们的烟丝再给您递过来。他们聚族而居，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婆媳、姐妹、妯娌之间，总是融洽无间。达斡尔族还是一个爱花的民族：鲜花盛开的季节，不分男女老幼，乌黑的发辫上，全都插有五彩缤纷的繁花。达斡尔族更是一个酷爱自由、忠于祖国的民族，在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中，他们曾付出过巨大的牺牲。

打曲棍球，是达斡尔人的传统游戏。那球，有毡做的、骨做的或木做的；晚上玩时，则用点燃的老树根做。月挂柳梢头，人聚黄昏后，球场内人影闪闪、火球忽忽，球场外老幼围观、欢声雷动，那景象，恐怕只有诗人才能形容！



赫哲人

赫哲族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地区（包括乌苏里江东西两岸）。他们是杰出的驯犬专家。那些高大猛鸷的狗，经过他们的驯养，打貂时能寻踪、嗅洞、追捕。貂进洞了，它就昼夜守在洞口；貂上树了，它能蹲在树下一守十来天；逮貂时，它还知道爱护貂皮，从不把貂皮咬坏。那些经过驯养的狗，冬天可以拉扒犁，

夏天可以拉纤。赫哲人是如此善于驯犬、用犬，故而在清初的文献里，被称为“使犬部”。

赫哲人以渔猎为生。打猎时，蚊虫咬，他们造了“巴力”（防蚊帽）戴；打鱼时，蚊虫咬，他们则点燃“苏木呼”（薰蚊草），放在船头的火盆中。在缺衣少食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吃的是鲑鱼（马哈鱼）肉，穿的是鱼皮衣。不过，他们把鱼皮剥下来，捶制得非常柔软，再用鸭跖草染成天蓝色，缝成衣服，十分美观。

赫哲人喜欢猎熊、捉熊、玩熊。凶猛的黑熊、棕熊，在他们的搏击下不是死亡就当俘虏。他们几乎村村、家家有熊圈，逮了熊，养起来，节日一到，便将它们拦腰捆了，骑在它们的背上，揪住它们的耳朵奔跑游乐。

谦虚和蔼是赫哲人的共同品德，再勇猛的猎手也总如大姑娘般的腼腆，从不炫耀自己的斗争事迹。见了长者，总是“打千”致敬。但对沙俄的侵略，他们曾进行过英勇的反抗。

黑龙江的最下游地区，生活着费雅喀人。费雅喀族的女子，不仅姿质艳丽，而且温柔大方。费雅喀夫妻相敬如宾：丈夫非常尊敬妻子，像奴仆一样地干活；妻子做饭、缝衣，甚至总给丈夫梳头。费雅喀人过着打鱼和采集的生活。吃鱼肉、煎鱼油、穿鱼皮衣。鱼皮衣染得更加绚丽多彩。鱼肉草根粥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而且吃时每人一份，但是客人光临，他们却不嫌麻烦地煎炒烹炸。婴儿降生后哺乳之期，始终被直立在特制的木篮（笼）中。

乌苏里江以东至海，还生息着一种“野人女真”[①]。在莽莽的林海中狩猎。活捉老虎，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那威严巨大的“东北虎”，总是被他们捆了拖出林间。他们不愧为清代的活武松。

辽阔的白山黑水地区是满族的故乡，这里众多的民族是满族的老乡。然而，清朝长期封禁的结果，使具有较高文明的汉族的大量迁入很晚，因而，这些民族始终在极落后、极艰苦的条件下，开发

① 女真语称“野人”为“乌底盖捏儿麻”。

和保卫着祖国东北的边疆，其中的一部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后来竟沦于异族的残酷统治之下了。

## 三、粗犷豪放的蒙古族

长城之外、大漠南北广阔的草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繁衍和融合的场所。远在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生存。公元前3世纪末，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族源、不同发展水平的各部，统一成了匈奴族。公元1世纪末。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留在漠北的十余万户匈奴人，便和迁入这块草原的鲜卑人融合了。公元6世纪，突厥人又入主这块草原，在唐朝中央政权的管辖下，繁多的游牧民族在这里进一步地融合着。而公元7世纪，世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幽深密林里的蒙兀室韦部，在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儿帖赤那的率领下西迁，进入到这块大草原中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一带，卷入了祖国北部各族大融合的漩涡，突厥、回纥统治者不断更迭，蒙古部却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在克鲁伦、土拉、斡难（鄂嫩）河流域水草丰美的地方，她的畜牧业迅速地得到了发展。12世纪时，蒙古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终于形成。

蒙古民族是一个有作为的民族。到南宋开禧二年（1206）成吉思汗即汗位的时候，她很快就领有了东至兴安岭、西括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土地。成吉思汗和他的两个孙子拔都跟旭烈兀，还举行了威震全球的西征，建立过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辽阔的大元帝国。在国内，她曾反抗过辽朝、金朝的统治。南宋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建立元朝，南宋祥兴二年（1279）灭了南宋，统一了全国，对全国进行了将近百年的统治。而在清朝的建立和巩固中，蒙古族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蒙古族的骑兵，一向威名赫赫。主要是因为她是一个游牧民族，一向以射猎、游牧为业，在整个清代也还基本如此，虽然乾隆

以后垦殖逐渐发展，而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经济发生过不小的变化。

蒙古族的游牧牲畜，以羊、马、牛、驼为最多；羊、马、牛、驼中，又以羊为最大量。蒙古马，个子虽然不高，却很强壮、有耐力。辽阔的土地、肥美的草原，给蒙古族的游牧提供了天然的优越条件。每当春回地暖、牧草苏荣的时候，蒙族人民便纷纷套上牛车，载着全家老小，驮着一应什物，赶着马、牛、羊、驼，去到水草丰美的处所牧放畜群。晨曦初露，青葱的原野上便弥漫着畜群；夕阳西下，畜群又在一片满足的"哞哞"声中回到圈内。男人一般只管牧畜，妇女则负责做饭、挤奶和缝纫。康乾时期，这种各司其职、相安成趣、恬淡旷古、悠然自得的牧歌式的生活，到处几乎都可以见到。有个叫卢见曾[①]的进士，在自己的《出塞集·竹枝词》里，就做过生动的描写：

家家来牧叱牛羊，几处山头下夕阳。
鄂博遥看知远近，如飞一骑马蹄忙。

装饰珊瑚辫发垂，羊裘狐帽赛男儿。
弓鞋笑说金莲步，手制新靴嵌绿皮。

这两首诗，把蒙族男女的豪放和聪敏劲给说透了。

长期的游牧生活，使蒙族人民创出了活动住房——"蒙古包"[②]：圆形；周围用十几根柱子固定，再用木棍纵横穿组，形成一堵"围墙"，顶上有木梁如伞，包毡数层防雨雪暑寒，还留有白天可开、晚间可关的天窗；包门南开，垂毡帘以挡风雨；一般直径十多公尺，中设佛龛，龛前住家长，其余男、女，分左、右住下。

---

① 纪昀的亲家。

② 当然也有固定而不移的。房屋最华丽的则是喇嘛寺和王爷府。

蒙古包的内壁，春冬多围毡毯（防寒），毯上罩有花布（富者罩绒毯），夏秋多围布或草帘（防热）。包内地面，或设炕，或铺毡，虽三九严寒，里面仍能温暖如春。这蒙古包，说设就设，说拆就拆，完全根据畜牧的需要而定。

蒙族人民主食为肉，一般为羊肉、牛肉。富者则吃鹿尾、驼峰、山兔、野鸡，还兼吃米、面。亲朋从远方来时，蒙族人民便以吃全羊款待，客人喝奶酒不醉，主人便不算满意。酒酣，主人还往往吹起胡笳、弹起琵琶或马头琴，亦歌亦舞来助酒兴，务使客人尽兴而止。畜奶除了酿成奶酒之外，还被煮成奶茶、做成酸奶子、奶油、奶豆腐、奶果子等等。蒙族人民还用兽皮做成皮袋、皮囊，携装奶茶、奶酒，随时可以举行野餐。

享不尽的毛皮，使蒙古族人民铺的是它，盖的是它，冬天穿的还是它。一般牧民穿光板羊皮大氅或短袄，富人则吊上布面。官员的衣着一如定制，百姓一般是宽领大袖，腰系布带，挂着火石、烟袋、铁箸、食用小刀和木碗之类。蒙族人民的靴子既厚实、又宽大。宽大的靴筒中，既可以多穿棉袜，还可以塞入烟管、烟叶、茶包或小刀。这种衣着，对于终日放牧在外的牧民，实在方便之极！妇女们则不然。她们虽然也是服宽袖阔，裙子却长到拖地的程度，除了环珮、刺绣之类，别无其他。她们的靴子，红皮做成，也有刺绣镶嵌。蒙族少女，都编发辫，结婚之后，才束发髻。

蒙族自元朝重视喇嘛教以后，信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人逐渐减少。到清代，最盛时竟有 1/3 的人信喇嘛教，喇嘛不婚配、不生产，因而，极大地麻痹了人民的精神，也影响了蒙族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清末天主教、东正教的侵入，更摧折了人民的斗志。宗教的信仰，影响到建筑方面，结果是蒙古建筑多汉、藏的宫殿式，当地的喇嘛寺庙和王公府第，给蒙古草原增添了雄伟和壮观。

蒙族人民终年驰骋在大草原，形成了他们粗犷豪放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也反映到他们的娱乐活动中。他们最主要的娱乐活

动，是赛马、驯马、套马和摔跤。他们的大多数人，几乎全是马术精熟、孔武有力。但唱歌、跳舞，也是蒙族人民的特长。一块钳形的木头，中间装上铁丝，拨动铁丝，他们便能弹出许多的音阶；蓝天白云之下，清风明月之中，无际的草原之上，突兀的高山之巅，处处都可以听到他们委婉曲折、激情洋溢的歌声。

## 四、回族和西北的少数民族

回族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只要某一块荒地上，出现了第一家回族拓荒者，其他回民便会接踵而来；只要某一城镇，出现了第一家回民饭馆，同样会立即出现许多回民饭馆、回民商店，随后便出现回民的清真寺等。回族人民既会务农，又善于经商、做工。他们的手工制品十分精巧，他们的饭菜、糕点尤其可口，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他们多经营皮货、香料、膏药或珠宝的生意，对于珠宝的真伪贵贱，他们具有超人的鉴别能力。回族是一个清洁卫生的民族，又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民族。他们自幼学习阿拉伯、波斯的文法和经典，具有一定的天文、历法和建筑的知识。在祖国的历史上，回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政治家（如元朝的赛典赤赡思丁父子、明朝的海瑞）、军事家（如元朝的阿老瓦丁、亦失马因，明初的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冯胜、丁德兴等）、科学家（如元代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明代的历法家黑的儿、阿都剌、迭里弥失等）、思想家（如明代的李贽等）、航海家（如明代的郑和、马欢等）、作家（如元代的诗人萨都剌、马九皋，明代的诗人丁鹤年、金大车、金大舆等）。清代，云南的马继龙、马上捷，浙江的丁澎、丁景鸿、丁潆，都是诗人；江苏的改琦、马世俊还是有名的画家；陕西的马自强，参加了《明世宗实录》的修纂，山东的张端，还是《清太宗实录》的副总裁。

回族人民始终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清初，他们参加过丁国

栋、米喇印的抗清队伍；清中叶，他们又投入苏四十三、田五起义的滚滚洪流；清末，杜文秀、马复初还领导云南回民，掀起了革命的风暴，占领了云南53座城镇，建立了“大理”政权，影响及于川、贵、陕、甘和新疆各省，前后持续了一二十年；渭南的回民，曾和太平军、捻军结合一起反抗清朝腐朽的统治，有首民谣说道：

四月二十三[1]，
“长毛”[2] 到渭南，
先破城，后杀官，
乡勇死了一大滩。

在甲午战争中（如左宝贵）和反抗八国联军的斗争中（如甘军兵士）以及辛亥革命中，广大回民都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战斗。

清朝统治者对回民一再采取分散的政策来瓦解他们的反抗斗争，但结果一方面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觉感，一方面也使他们进一步分布到全国的每一个省份。“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行赍居送，千里不持粮”等，虽然包含有阶级调和的思想，但也显示了回民族内的团结。陕西、甘肃、宁夏、云南，是回民居住最集中的省份。

回民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诵的是《古兰经》。他们在饮食方面的一个重要风俗习惯，就是忌食猪肉，死后经过沐浴才能入土。

和回族风俗习惯差不多的，是居住新疆的维吾尔族。维吾尔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史书上曾称为“回纥”、“回鹘”。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把她写作“回回”，清朝统治者又把她和回族统称为“回部”。维吾尔人隆准、虬髯、深目。他们好缠布于头或戴帽子，因此，有的书上又叫他们为“缠回”。他们一般总穿长统靴。

① 指1862年。
② 指太平军。

衣服，男的右开襟，女的有领无襟（哺乳时当胸开襟），内衬长襦，外加背心，穿起来袅娜生风、鲜艳动人。女人不爱插花，但酷爱手镯、耳环、珠玉饰品，外出则以花巾或纱巾披头罩面。婚前，编数十条辫子；婚后一月，才改成两条，用红丝线扎络。

维吾尔人一般是吃面食，他们所烙的饼，黄而香。吃米饭，则往往用切碎的牛、马、鸡、鸭等肉，和葡萄干、胡萝卜干、杏干一起共煮，熟后用大盘子盛好，全家人围坐炕上抓着吃。

维吾尔人的住房内，喜欢贴上人物、花卉画，房顶也多嵌花板、绘上彩漆。宅旁还喜筑上园林、引来渠水，弄得十分的幽雅。赛马、摔跤、打秋千，是维吾尔人的普遍娱乐活动，而每当夏初桑椹熟了之时，他们更弹起自制琴，铺上罽毯，彻夜聚会，欢歌畅舞不绝！

维吾尔人有发达的灌溉农业，善种小麦，也长于生产瓜果梨桃，著名的哈密瓜，就是他们和哈萨克族人民手下的特产。

哈萨克族主要游牧于新疆的塔城、伊犁河一带。她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族源可以上溯到汉代的乌孙、月氏，唐代的西突厥，元代的乃蛮、克烈。她素以擅长骑射和歌舞而闻名，故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乘挽兼用的伊犁马和体大肉肥的阿勒泰大尾羊，是哈萨克牧民引为骄傲的名产。他们喜食熏肉，但招待客人却更以嫩驹肉丝所灌的马腊肠为上品。客至，铺新布于客前；贵客至，更系牛、马于户外，请客人亲自观察后而屠宰。他们尚黑色，无论男女，多喜穿黑衣、戴黑帽：男人上衣宽大，束着皮带，左悬皮囊、右悬小刀，一年四季都戴着三叶帽或圆帽；女人则穿连衣裙，内衬白衣。男女都是蹬牛皮高跟软靴，钉上铁掌，行走铮铮有声。一般住帐幕，幕内铺五色绒毯，床上多被褥，枕内实以天鹅绒。他们人人善歌舞，精骑术。还有一种民间艺人叫“阿肯”的，不但能弹冬不拉，唱歌，讲故事，而且还能即兴创作故事、诗歌，他们行踪不定，东奔西走，实际上做着总结、整理全族人民的文艺创作的工作。刁羊，是哈萨克族人民最喜欢的一种比赛、娱乐活

动。比赛开始，骑手们像闪电一般驰向前方草地上放着的那只无头羊羔，到了羊羔的所在地，他们便在飞奔的马背上“海底捞月”或“蹬里藏身”，突地伸手将它刁起，并避开众骑的争夺，最先奔向指定的目的地。……

哈萨克人，和回民、维吾尔人一样，也崇奉伊斯兰教，恭诵《古兰经》，忌食猪肉。婚、丧习俗，与他们也大同小异。

天山北部游牧的厄鲁特蒙古各部的风俗习惯，则与内蒙、外蒙的同胞基本相同。

乾隆期间，满族、锡伯、索伦、达斡尔族，也有移垦新疆的。

汉族的移居新疆，早在汉朝之时。但大量移居，还是发生在清朝的同治以后。这些汉人中，以湖南人为最多、陕甘人为次，此外，天津人、山西人、湖北人、河南人、四川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人也很不少。

汉、满、锡、索、达等族人民在开垦新疆土地、交流各地物产、活跃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传播先进的文化方面，都较前代有长足的进步，也说明了：清代，各族人民的融合，又有了新的进展。

## 五、藏族和西南的少数民族

藏族居住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分羌族、洛族两支。“羌”是藏语“北方部落”之意，“洛”是藏语“南方部落”之意。无论是南方部落，还是北方部落，整个藏族的妇女，都特别能干，耕田、砍柴、负重致远、建造房屋、洗衣做饭、纺织裁缝等许多内外劳动，大多由妇女承担。由于笃信喇嘛教，男子多以焚修为事。

清朝统治者对汉、藏人民的往来，限制很多。禁止汉族诗书入藏，严格控制汉、藏贸易。但汉、藏人民的往来，在清朝，却比以前有了加强。汉人到西藏的，也有了增加，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

技术，也输入了更多的藏民日用品。因此，在清代，藏族人民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藏族人民以游牧为主。不过，手工业也比较发达，毛织业中的氆氇、剪绒、细毯、细花布都很精工，特产的藏香尤为汉族人民所喜爱。

藏族人民吃的是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由青稞面、黄油和茶水掺拌而成的糌粑，吃时不用筷子，而用手掬。茶水煮红后，投以黄油和盐，即成奶茶，这是藏族人民的日常饮料，也是迎接客人的佳品。藏族人民还用青稞酿酒喝，青稞酒略有酸味。

藏族人民住的是石砌平顶屋，家畜圈在底层或屋内，屋内窗户很少，屋上有小孔作烟囱之用。富人屋层多，穷人屋层少，特别穷的只在草房或兽皮帐幕（“黑帐房”）中栖身。

藏族人民穿的衣服，也因贫富、身份等不同而有别。一般平民只穿大领无衩之衣，腰带上系着小刀、顺刀、皮袋、火镰、木碗之类的日用品，手上佩戴骨块。班禅、达赖和一切喇嘛，内衣是氆氇坎肩，外穿紫洋绒单衣，外衣之上还交叉地披着帛布条；冬戴黄氆氇羊绒、上尖下大的帽子，夏戴状如竹笠的黄皮帽子；脚登锦靴或皮靴，腰里还缠着细布带子。一般官员，则披发，戴平顶帽，手持佛珠。妇女因贫富不同而分别戴红、绿尖顶小帽或珍珠帽，赤脚、着布靴或皮靴。一般穿小袖短衣（衣上披一小方绒布，有如袈裟）、黑褐色裙。项挂佛珠，耳坠耳环，胸垂珠石环。老年妇女，额上戴绿松石一片。

藏族人民无论男女都能歌善舞，还有用彩色颜料涂面的习惯。他们都信奉喇嘛教。他们非常鄙夷盗贼，而不畏惧艰巨的劳动。藏北草原西部的察卡湖产盐，藏族人民便不畏艰险，纷纷前去背运。

> 虽然不是北方的羚羊，
> 也曾踏着冰雪翻过藏北；
> 虽然不是湖上的大雁，
> 也要跳到水里去取盐。

这首歌谣也充分地反映了他们倔强的民族性格。

藏族而外，祖国西南各省，还聚居着许多种的民族，这些民族各自有着不同的自称。（仅云南一省，不同称谓的“边民”，在清代中期，就有141种之多。从族别来说，也的确是不算少）汉族而外，少数民族以苗族、僮族、瑶族、白族、纳西族、傣族、彝族和景颇、佧佤、土家等族为最著。

“苗”，最初见于《书经》，后在《战国策》、《史记》、《山海经》里也不时出现，但明朝以前的其他史书中竟很少见到，即使偶尔见到，也只作为一个小部落而出现。其实，苗族人数不少，分布的地域也很广，在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她还算比较大的一个。苗族广居于贵州、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各省，而以黔东南和湘西居住得最集中。他们中，有的尚白，有的尚青，有的头缠红布，有的身穿花衣，有的游佃于平原，有的耕种于山间。平原地区的苗民多种稻谷，山区的苗民则多种苞谷（玉蜀黍）。清朝实行改土归流以后，苗民的汉化程度大大加深，但汉族大地主的抢购田园，又迫使无数的苗民退居荒山老岭，过着窨居穴处或构木为巢的半原始生活，部分苗民还养成了生吃鼠雀的习惯。不过，苗族人民很早就善于种植。有的学者还考证说，他们是蚩尤的后裔，而蚩尤则是神农的八世孙，“苗”字本身又从“草”、从“田”，含有“耕田”之意。因此，苗族人民在开发祖国西南山野中的贡献，实在不小。

苗族人民，一般都“椎髻”、穿短衣，赤足而能疾走于荆棘丛中、飞行山峭壁悬崖之上。他们敦厚朴实，好客成风，但又嫉恶如仇、勇决善斗。他们言语不多，感情却很丰富。一片树叶，在他们的嘴里能吹出婉转的歌曲音节；几根竹管，在他们的手中能很快地变成一把芦笙。清风明月之夜，小伙子往往守在姑娘家门口，用笙吹出无尽无边的乐曲，来倾吐自己心中无限无止的爱慕。姑娘一旦被笙乐打动，就毫不做作地走出家门，开始两人的月下谈情。

晓妆斜插木梳新，斑驳花衣紧裹身。
吹动芦笙铃响处，陌头踏月畅怀春。

这诗就是苗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真实写照。

和苗族久居一起的，在鄂西南、湘西北，有土家族。他们和苗族人民一起，经营着漫山遍野的桐子树、茶子树、沐子树，并在山岭上开出层层叠叠的梯田，种着稻、黍、麦、薯、油菜等作物，但穷人糠菜不果腹时，却只好上山“挖蕨打葛”，以葛（蕨根）粑粑（蕨根里所含淀粉）充饥。土家族男人多穿对襟衣、横纽扣，女人多穿袖子短大的左襟衣，无领，周围绣着花边，女裤的裤脚也扎着几道花边。农家换工不计报酬，过年比汉族提前一两天，汉化程度很深。滇黔的苗族青年男女，春天总是赶墟聚会，芦笙和山歌声中互相结下良缘；湘西苗族和土家族人民，正月新春总是龙灯花鼓，人人喜庆。他们的汉化，自五代时已开始，而清朝改土归流之后，几乎人人都能说汉话，中科举的也不乏其人。

主要居住在湖南、广西的瑶族和僮族，人数很不少。瑶族善用鸟毛制毯。他们身穿五彩斑斓的衣服，却经常出入老岭深山，能捉虎豹狼虫。他们还善采草药。他们喜食蛇肉。瑶家妇女讲究椎髻，从这发髻的“美芙蓉”、“望仙怀人”、“浓春散夏”等名，可见她们梳妆的高超技艺。僮人勇敢、倔强、乐施好客、坦白开朗，还善于吸收外族的先进文化，不少僮人竟乐于招汉人为婿。汉人只要会僮话，也就更会受到僮人的盛情款待。有的民谚说：“若会讲僮话，无钱唔使怕（不要怕）。”僮族把能讲僮话的汉人，简直会当作自己的亲人。僮族妇女，喜穿袖式桶裙。据说，这桶裙，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所创制。

山高水长，鱼米之乡；
江外河底，干柴白米。

在物产丰富、风景宜人的苍山、洱海之间，培植着木棉、咖啡、香蕉、菠萝以及奇特的黄豆树的，有白族、纳西族、傣族、彝族、景颇族、佧佤族等许多民族。八世纪中以来，白族就有过精熟的冶铁技术。有个叫浪人诏的，铸剑尤其精利，他铸的剑被称为“浪剑”；宋代时，白族人民培养的良马也很有名，岳家军的战马多是白族提供。白族人民还善于农作，开梯田、复种之外，果树园艺也很发达。他们的想象力丰富，人民创造了不少的神话故事。傣族、彝族等族的住房，多以大竹搭构，下层无墙，圈养牲畜，上层住人，多至三五间，还有凭栏乘凉的露台。住宅前后，翠竹绿树笼罩，一片蓊郁葱茵。傣族、彝族等族，姑娘们活泼聪慧，小伙子坦荡无私。他们爱清洁、讲卫生，洁白的上衣、青色的裙子，哪怕只溅上一点污渍，他们也马上加以洗涤；沐浴，必须天天进行。他们灵巧的双手，能将竹子编成各种各样、细大不捐的家具和生产用具。客来，他们热情地奉上槟榔，一定以客嚼得满嘴殷红为快；节日，他们更自造出各种各样的烟火，那冲天而起的孔明灯，有的甚至可以照耀着他们歌舞到天明。傣族和崩龙族一样，每当汉族的清明节前后，还欢度泼水节。这一天，一大早，男男女女便采来鲜花供佛；午间，将佛像置于院中沐浴，用浴佛之水浇花，然后便抬水游行于村中、街上，互相浇泼，直到水流成渠，才尽兴而休。

## 六、黎族、畲族和高山族

清代的琼州府即海南岛。海南岛和它附近的一些群岛上，生活着许多黎族同胞。他们和汉族人民，从汉朝以来就一直共同开发着祖国南疆这些宝地。黎族人民培植了高大的木棉树，创造过先进的纺织机械和纺织方法。他们毫不保留地教过汉人纺织技术。他们的爱国心，跟火红的木棉花一样鲜红。黎族妇女不但是优秀的纺织专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短发的人群之一。据记载：春秋时代，

她们便已剪短发了！

黎族人民勇敢、淳朴。在清代，他们还有文身的习惯。男、女都文身。女的自两耳至腮，刺三道或五道纹；男人则刺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他们的文身，不是为美，而是生产斗争的需要：和山中的虎豹狼虫、海里的“蛟龙鲸鲵”作斗争。黎族男、女同川而浴，从无怪事发生。喜庆之日，他们吹起口琴、鼻箫，跳起打柴舞、打钱串舞，唱起山歌，无拘无束，十分快乐。

畲族生活在浙江、福建一带，而以浙江的处州府（今丽水县附近）为居住最多。俗祀槃瓠（神犬），祭时用竹箱二：一箱放红布囊，红布囊中包着一个木刻、朱漆而饰以金箔的狗头；另一箱则装着画有本民族故事的画像。他们把狗这一图腾和本民族的英雄故事融合在一起祭祀，说明他们既崇拜祖先，又崇拜自己民族的英雄。畲族是一个辛劳、朴实的民族。畲族男女结婚，女方的妆奁不是金银珍宝，而只是锄头和镰刀。


高山族服饰

高山族[1]在清朝的文献里被称为“番”，他们自己的称谓则有“阿眉斯”（“北方”）“百宛”（祖先最早开辟的地名）等七种名目。他们主要居住在台湾。

清代的高山族，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郑成功光复台湾后，曾大力发展高山族的经济和文化。他的一个部将叫杨英的，看见高山族人民收获水稻用

① 1945年定名。

手拔，便建议发给他们耕牛、犁、耙和其他一些先进农具。住在罗汉门的汉人沈文光，还亲自教高山族儿童汉字。康熙时期，台湾和大陆统一后，汉人更加多起来。康熙二十三年到嘉庆十六年（1684—1811），台湾人口增加了六倍，平均每年增加15 000，自然大部分也是汉人。汉人的大量增加，给高山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后，高山族的服饰已“半如汉制”，很多人也粗通汉语，不少人还参加科举考试了。高山族人民有了进步的农业，学会了冶矿。农闲时，男人编篮采藤，女人捻麻织布，他们还学会了酿酒。

但是，高山族是一个很有特点、很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在很多方面，他们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传统和特色。很多人还保持着文身的习惯：男人刺有熊，豹、人纹，女人在肩、臂和掌中刺有墨花纹。衣着也各式各样：有熊皮、豹皮、鹿皮的，也有布做的；妇女除了裤、裙、衣外，还自肩向腋下斜披着偏衫，有的衣服竟完全用贝壳做成，一件贝衣串联的五彩缤纷的贝壳多达十二三万颗，胸前还要佩上玻璃珠穗，稍一活动便发出交响乐一般的音响。帽子则有朱缨帽和草箍。

为了战胜台风的侵袭，海边的高山族人民，住房用大木作墙，外面还用卵石堆砌。门楣上、柱子上和门槛上，都刻有人物、动物和花卉的图画。房前屋后，种着树木，一年四季，一片葱茏覆盖。

高山族人民，严格地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近亲结婚。婚前，男、女青年，在严格的训导下，都培养出了顽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山区的高山族人民，除了打猎，也种食山芋、白薯和谷物。打猎的方法很巧妙：全族人将鹿逐进草丛，然后顺风三面点火焚烧，只留一面不烧，人们各张弓达弩、高举标枪守候这一面，鹿群一出身边，大家便枪箭齐发。

沿海的高山族人民，多以打鱼为生。他们自制的渔船有独木船，也有完全用小木块拼镶成的、楔以木楔的船。这些船，底部尖窄，劈风斩浪、其速如飞；船身还雕出波浪纹、车轮纹以及人纹，

涂上黑、红二色，十分美观。他们乘坐这种船乘夜出海，船头燃起火炬，引得渔群自投渔网，因此总是丰收。

高山族人民，在高山深谷中架起无数的竹、藤吊桥，可以很快地从这山渡到那山，在平地，他们则以牛车作为载重或交通的工具。

高山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还从音乐方面表露出来。一块长十厘米，宽二三厘米的薄竹片，开上一道细长的小孔，孔的一端镶上极薄的铜舌，一端拴上细线，拉动细线，吹入气流，便发出动人的音律，这便是高山族人民创造的口琴。两根三十七八厘米的竹笛绑在一起，用鼻子一吹气，也会吹出各种不同的音阶，这便是他们创造的鼻笛。一张胡弓，两端系上月桃草纤维制成的弦，拨弄弓弦，便会发出醉人的声响，这又是他们创造的弓琴。高山族人民还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杵乐。月明风清之夜，日月潭的妇女，三三两两聚在石臼旁，手执长杵舂米。长杵一上一下地铿锵，妇女们的歌声也一起一伏地悠扬，声相应和，闻者又怎能不心神激荡？

高山族的人民是富有斗争精神的民族，他们在清朝的统治时期，不仅和汉族人民一起多次掀起过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风暴，而且在和汉族同胞一起反抗荷兰、法国、美国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出现过许多的民族英雄。他们的爱国赤诚，他们的进取之心，是任何反动统治也扼杀和镇压不了的！

# 附录一 晚清大事年表

| 中国纪年 | 公元纪年 | 大事 |
|---|---|---|
| 道光二十年 | 1840 |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
| 道光二十一年 | 1841 | 琦善私签《穿鼻草约》。 |
| 道光二十二年 | 1842 |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
| 道光二十三年 | 1843 |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签订；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
| 道光二十四年 | 1844 | 《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
| 道光三十年（12月） | 1851 |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
| 咸丰三年 | 1853 | 清政府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清军构筑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北伐、西征，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
| 咸丰四年 | 1854 | 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率武装侵略者在黑龙江下游阔吞屯建“马林斯克哨所”。 |
| 咸丰五年 | 1855 | 太平军大败湘军水师于鄱阳湖。 |
| 咸丰六年 | 1856 | 太平军击破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内讧；英舰进攻广州，俄国武装侵略黑龙江下游。 |
| 咸丰七年 | 1857 |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英、法、俄、美联名致书清廷，要求扩大侵略特权；穆拉维约夫亲率侵略军盘踞黑龙江中游。 |

| | | |
|---|---|---|
| 咸丰八年 | 1858 | 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李秀成、陈玉成再破江北大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强迫清朝代表签订《天津条约》，美、俄以"调停人"身份也诱使清朝代表签订《天津条约》；穆拉维约夫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
| 咸丰九年 | 1859 | 洪仁玕到天京主持朝政，发布《资政新篇》；英、法联军再犯大沽，为清军大败。 |
| 咸丰十年 | 1860 | 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大败"洋枪队"，进向上海；英、法联军占北塘、攻大沽、入天津、攻通州，抢、焚圆明园，在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俄使亦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
| (12月) | 1861 | 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 咸丰十一年 | 1861 |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咸丰死于热河，慈禧发动北京政变；清军攻陷安庆；李秀成率军再克杭州；曾国藩办安庆军械所；清廷部分开禁东北。 |
| 同治元年 | 1862 | 李秀成率太平军再次攻近上海，打败洋枪队和英、法、俄侵略军；庐州失陷；陈玉成中奸计被俘，英勇就义；中法混合军"常捷军"编成，"洋枪队"改名"常胜军"，俄人盗采漠河金矿。 |
| 同治二年 | 1863 | 石达开自投清营被杀；清政府设同文馆。 |
| 同治三年 | 1864 | 洪秀全病逝，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基本失败；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 |
| 同治四年 | 1865 | 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太平军余部赖文光部与捻军击毙僧格林沁、全歼僧部于曹州；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总局"。清政府开始借外债。 |

| | | |
|---|---|---|
| 同治五年 | 1866 | 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清廷始许汉族妇女出关垦荒。 |
| 同治六年 | 1867 | 崇厚设“天津机器局”；阿古柏侵占南疆，悍然成立“哲德沙尔国”，自称为汗。 |
| 同治十年 | 1871 | 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修好条约》及《通商章程》。 |
| 同治十一年 | 1872 | 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清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出洋。慈禧决定重修圆明园，同治十三年(1874)被迫停止。 |
| 同治十三年 | 1874 | 日、美合力侵扰台湾，清政府与日订立“台事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离台湾，清方赔款50万两。 |
| 光绪元年 | 1875 | 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政府决定建立南洋、北洋和粤洋水师。 |
| 光绪二年 | 1876 |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 |
| 光绪三年 | 1877 | 阿古柏在清军打击下服毒而死。 |
| 光绪四年 | 1878 | 清军尽复南疆；开平矿务局正式出煤；朝廷解除汉妇出关之禁，设立吉林垦务局。 |
| 光绪五年 | 1879 | 日本强占琉球，改名“冲绳县”；崇厚在俄国逼迫下擅订《里瓦吉亚条约》。 |
| 光绪六年 | 1880 | 崇厚被革职，曾纪泽使俄；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开始修建旅顺、大连军港；兰州机器织呢局开工。 |
| 光绪七年 | 1881 | 曾纪泽与俄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 |
| 光绪八年 | 1882 | 清政府与俄国订立《伊犁条约》和《喀什噶尔界约》。 |
| 光绪九年 | 1883 | 清政府与俄国订立《科塔界约》和《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法军在越南山西进攻中国军队。 |

| | | |
|---|---|---|
| 光绪十年 | 1884 | 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俄人在漠河金矿僭设“极尔吐加共和国”；新疆改建行省。 |
| 光绪十一年 | 1885 | 冯子材等大败法军，取得“谅山大捷”；李鸿章与日大臣伊藤博文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朝鲜有事中日两国均可派兵前往；李又与法使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台湾改建行省；设海军衙门。 |
| 光绪十二年 | 1886 | 光绪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收复漠河金矿，设“漠河金矿局”。 |
| 光绪十四年 | 1888 | 康有为首次上书主张变法；北洋海军建成。 |
| 光绪十六年 | 1890 | 汉阳铁工厂开办。 |
| 光绪十九年 | 1893 | 汉阳铁工厂建成。 |
| 光绪二十年 | 1894 |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建立兴中会。 |
| 光绪二十一年 | 1895 |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俄、德、法“干涉还辽”；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中日签订《辽南条约》；“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 |
| 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孙中山伦敦蒙难。 |
| 光绪二十三年 | 1897 | 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俄军强占旅顺、大连并开始修中东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刊行，谭嗣同《仁学》问世。 |
| 光绪二十四年 | 1898 |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后，英亦强迫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九龙（不包括九龙城）及大鹏湾等处租给英国，为期 99 年。百日维新，后党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义和团在山东勃兴。 |

| | | |
|---|---|---|
| 光绪二十五年 | 1899 | 美国照会英、俄、德、日、意、法等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袁世凯去山东镇压义和团；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
| 光绪二十六年 | 1900 | 义和团进入直隶、京津；慈禧太后利用与出卖义和团；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俄国发动海兰泡事变，强占我江东64屯地区，并出兵侵占东北；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八国联军蹂躏津、京。 |
| 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 出使俄、奥大臣杨儒拒绝在俄军强迫盛京将军增祺订立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拒绝了俄国侵占东三省领土的野心；慈禧太后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随后又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诏“自责”，声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奕劻、李鸿章遵旨与俄、英、美、德、法、意、奥、日、荷、比、西11国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 |
| 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返回北京；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直隶、河南、湖南等地人民举行起义。 |
| 光绪二十九年 | 1903 | 上海、武汉、北京等地爱国群众、学生和日本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英、美、日等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通商行船条约》；朝廷诏设“练兵处”；《铁云藏龟》印成。 |
| 光绪三十年 | 1904 | 日俄战争爆发，东北人民深受其害，朝廷竟宣布严守“局外中立”；华兴会、光复会成立；武昌科学补习所成立；英军攻陷拉萨；设黑龙江垦务局。 |

| | | |
|---|---|---|
|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 | 同盟会组成；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对中国的东北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附约十三款；因美国虐待华工，各地爆发反美运动。 |
| 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 日知会在武昌成立；朝廷改商部为“农工商部”，订《奖励工商章程》，宣布“预备立宪”；朱执信第一个介绍马克思。 |
| 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 东北改建行省；徐锡麟、秋瑾反清牺牲，同盟会潮州、惠州 钦州、廉州、镇南关起义失败；共进会成立。 |
| 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 汉冶萍公司组成；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连日死，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 |
| (12 月) | 1909 | 袁世凯落职回籍。 |
| 宣统元年 | 1909 | 16 省谘议局相继成立，代表聚会上海，决定联合请愿；共进会成立于汉口，武昌设分机关；京张铁路通车。 |
| 宣统二年 | 1910 | 长沙抢米风潮爆发；设立湖北商办粤汉川铁路公司；清廷与美财团签订《美国借款草合同》。 |
| 宣统三年 | 1911 | 文学社在武昌成立；清廷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权“收归国有”，准备将路权卖给外国；保路运动掀起；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各省宣布独立；17 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东山再起，清帝于次年二月十二日颁诏“逊位”。 |

# 附录二　清朝帝系表

| 顺序 | 名字 | 属系排行 | 年号 | 在位时间 | 即位年龄 | 享年 | 庙号 | 谥号 | 陵寝地 | 自命别号 |
|---|---|---|---|---|---|---|---|---|---|---|
| 1 | 努尔哈赤 | 显祖塔失长子 | 天命 | 11 年<br>（1616—1626） | 57 岁 | 68 岁<br>（1559—1626） | 太祖 | 武皇帝 | 福　陵<br>（沈阳东郊） | “大金汗王” |
| 2 | 皇太极 | 努尔哈赤第八子 | 天聪<br>崇德 | 17 年<br>（1627—1635）<br>（1636—1643） | 36 岁 | 52 岁<br>（1592—1643） | 太宗 | 文皇帝 | 昭　陵<br>（沈阳北郊） | |
| 3 | 福　临 | 皇太极第九子 | 顺治 | 18 年<br>（1644—1661） | 6 岁 | 24 岁<br>（1638—1661） | 世祖 | 章皇帝 | 孝　陵<br>（河北遵化） | |
| 4 | 玄　烨 | 福临第三子 | 康熙 | 61 年<br>（1662—1722） | 8 岁 | 69 岁<br>（1654—1722） | 圣祖 | 仁皇帝 | 景　陵<br>（河北遵化） | |
| 5 | 胤　禛 | 玄烨第四子 | 雍正 | 13 年<br>（1723—1735） | 45 岁 | 58 岁<br>（1678—1735） | 世宗 | 宪皇帝 | 泰　陵<br>（河北易县） | |
| 6 | 弘　历 | 胤禛第四子 | 乾隆 | 60 年<br>（1736—1795） | 25 岁 | 89 岁<br>（1711—1799） | 高宗 | 纯皇帝 | 裕　陵<br>（河北遵化） | “十全老人” |

（续表）

| | | | | | | | | | | |
|---|---|---|---|---|---|---|---|---|---|---|
| 7 | 颙　琰 | 弘历第十五子 | 嘉庆 | 25 年（1796—1820） | 37 岁 | 61 岁（1760—1820） | 仁宗 | 睿皇帝 | 昌　陵（河北易县） | |
| 8 | 旻　宁 | 颙琰第二子 | 道光 | 30 年（1821—1850） | 39 岁 | 69 岁（1782—1850） | 宣宗 | 成皇帝 | 慕　陵（河北易县） | |
| 9 | 奕　詝 | 旻宁第四子 | 咸丰 | 11 年（1851—1861） | 20 岁 | 31 岁（1831—1861） | 文宗 | 显皇帝 | 定　陵（河北遵化） | “且乐道人” |
| 10 | 载　淳 | 奕詝独子 | 同治 | 13 年（1862—1874） | 6 岁 | 19 岁（1856—1875） | 穆宗 | 毅皇帝 | 惠　陵（河北遵化） | |
| 11 | 载　湉 | 醇亲王奕譞次子载淳从弟、文宗嗣子 | 光绪 | 34 年（1875—1903） | 4 岁 | 38 岁（1871—1908） | 德宗 | 景皇帝 | 崇　陵（河北易县） | |
| 12 | 溥　仪 | 醇亲王奕譞之孙，监国摄政王载沣之子 | 宣统 | 3 年（1909—1911） | 3 岁 | 61 岁（1906—1967） | | | | |

# 后　记

1981年冬，北京出版社约我写《清朝史话》，我既感到兴奋，又唯恐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不允许。果然当北京出版社向我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出约稿公函后，一位副院长和历史研究所所长便把我叫到所长室，说："全国那么多专家都没有写，你能写好吗？写了也不会出版。你的任务即本职工作是研究黑龙江地方史，因此，不给你安排时间。"这一席话，非但没泯灭我写作此书的意愿，相反，倒激起了我的挑战激情。

于是，在白天坐班研究地方史下班之后，一回到家，便投入到此书的写作。九平方米的家，夫人王志芬做饭、辅导孩子学习之后，便和孩子们横躺在双人床上，而我则在他们的头边支上那张小小的"靠边站"（圆饭桌），在微弱的台灯下，应着她们的鼾声呓语，几乎天天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整整半年，志芬日见消瘦，晞如、笙安也谨小慎微，然而，他们终于成全了我的此书初稿的完成。从头到尾浏览一遍，我觉得这本由我全家共同努力而草就的书，虽不算什么精品，却也看得过去。有关清史的一些重要的资料，有关清朝后期（即1840—1911）的一些重大史实也基本全面准确。已故导师郑天挺先生的深刻指点，北京出版社闻性真同志、田耕同志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写作意图

也得到了体现和融人。志芬除了做尽家务，看管子女，借还图书、资料之外，还多方寻找本书需用的插图。

现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又约请我参加《中国读本》丛书的编撰工作，这使我倍感欣慰，这是对我过去的写作与付出的充分肯定和认可，使我的这部作品在20年后以新的面目再一次呈献给广大读者。遗憾的是，夫人志芬卧病在床，我又精力有限，无力对本书做出详细的修正。错误、缺点因而在所难免，还盼海内外同仁多多赐正。

夏家餕

2006年10月26日于夫人志芬病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晚清史话
作者＝夏家餕著
页数＝１４９
ＳＳ号＝１２４４１５１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０